

From Lenin to Stalin

从列宁到斯大林

——俄罗斯革命轶史——

维克多·塞尔日著
郑超麟译

世界革命不是理想
而是历史的必然。

托洛茨基



From Lenin to Stalin

从列宁到斯大林

维克多·塞尔日著，郑超麟译

先知在 1917 校对

校对者说明

1、本中译本原译名为《俄罗斯革命轶史》，由郑超麟（化名：林伊文）翻译，新东书局 1941 年 10 月出版。

2、校对者根据纽约先锋出版社 1937 年出版的英译本（拉尔夫·曼海姆由法文翻译）对原中译本进行校对。

3、对原中译本的人名、地名均根据英译本改用现今统一译法，并添加注释以供读者参考。

4、因原中译本系公开出版物，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对涉及中国革命的文字有所删节，现根据英译本进行了补正。

2025 年 7 月

目录

1917年3月，或没有头脑的革命	- 1 -
革命有了头脑	- 5 -
革命的第二个头脑	- 10 -
诬蔑，这毒物!	- 14 -
走向政权	- 16 -
1917年11月7日的胜利	- 20 -
伟大的几年	- 26 -
第三国际	- 33 -
新经济政策与反对派	- 42 -
季诺维也夫	- 46 -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	- 49 -
中央委员会的激烈争论	- 54 -
失败，放逐，悔过	- 58 -
从列宁到斯大林	- 65 -
工业化和集体化	- 71 -
被放逐者的生活	- 77 -
回忆	- 83 -
被迫害的女性	- 87 -
恐怖与经济复兴	- 90 -
“天才领袖的伟大”	- 92 -
谋杀	- 94 -
两份文件	- 109 -
顶礼膜拜	- 114 -
恐惧	- 120 -
老人与第四国际	- 123 -

设在西班牙的圈套	- 126 -
真理有助于社会主义	- 131 -

1917年3月，或没有头脑的革命

俄国革命的第一个时期，现在我觉得，是受着列宁及其伙伴们的公平正直支配的。就为了这个缘故，我们才四面八方从世界各地奔赴于这个革命。1917年初，我们在西班牙和几个战士讨论俄国革命的问题，这些战士那时已经计划占领巴塞罗那，并在那里组织一个新公社了（这年7月某日，我们曾把这公社的纲领张贴出来）。萨尔瓦多·塞吉^①，他是“全国劳工联合会”创立人之一，两年后被人暗杀了，我曾把他写进我的小说《我们的力量之诞生》里去，写得尽可能地像他，——他询问我关于布尔什维主义，那时布尔什维主义同时惹起世人最大的忧虑和最大的希望。我们那时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我们从那远远传来的辗转失真的列宁言论中已经辨别出一种希有的直率了。

“布尔什维主义，”我说，“就是言行相一致。列宁的可贵之处，一言蔽之，就是要实现他的政纲……土地给农民，工厂给工人，政权给劳动的人。这几点，人们是时常谈起的，但从未曾想过由理论进于实行。列宁似乎正在实行……”

“那些无信仰心的狡狴的社会主义者，”塞吉反驳我的话说，“能实行他们的政纲吗？这是自古以来未曾见过的……”

我解释说，这是可以在俄国见到的。除非是新旧大陆舆论界的无知和昏愤，才会设想俄国革命能停止于不彻底的民主政治；实际上，一种严重的贫困，加上一种严重的压迫，已经将一切根本问题：土地、和平、政权，——提出到俄国人民的面前了。一种不得不然的逻辑，推动千万人行动起来；但为什么目的，用什么手段，他们却需要一个明白的意识。他们自己能明白吗？问题就在这里。群众并非每在紧急关头都会得到几个人，能毫无错误地表示他们的利益、他们的意愿和那埋藏在他们内部的力量。有教

^① 萨尔瓦多·塞吉 (Salvador Seguí, 1887-1923), 1887年出生于西班牙莱里达, 少年时期即接触无政府主义思想, 并参与劳工运动。担任“全国劳工联合会”秘书长, 先后组织与领导了巴塞罗那多次大规模罢工, 迫使政府实行八小时工作制。1923年3月被右翼武装团伙暗杀, 丧礼超10万工人送葬。——校对者注

养的阶级，即有产阶级，是有充足的代表人、有充足的自觉的领导者 and 良好的仆役的；必要时也会毫不迟疑地向下层人民中提取这类人才……贫穷的阶级是缺乏人才的，这也是贫穷阶级命运的悲惨因数之一。1871年巴黎公社，力量薄弱，内部分裂，暗中摸索着而奋斗，而当时唯一的头脑，也许能够为公社派指示道路的——布朗基^①，却坐在托罗要塞地牢内冥想着，一筹莫展。德国的工人阶级，1932年，倘若有个卢森堡的坚强理智和一个李卜克内西的革命热情，我们能看见它让社会民主党带着一步退一步，让共产党带着耍无聊的把戏，而终于不经一战即投降于新起的纳粹党之前吗？

有这样一个时候，民众只需要一个人和几个人……我说：一个和几个，因为这一个人将是等于零的，倘若没有若干行动的伙伴来扶助他，他们信仰他，他也信任他们。这就叫作党。一个党，一个意识，一个意志，——历史就做成功了。^②但社会若没有这些结晶的原素，则什么都做不成功的，改革要流产的，人们要长久在无出路的圈子内旋转，好多的血都是要白流的。1848年，全欧洲的革命都流产了。距今不久，还发生所谓螞蟥式的“神秘主义”（借用一个时髦的然而空洞的名词）：这里计划的神秘，那里是领袖和暴力行动的神秘。计划始终是计划，而领袖收缩了，暴力行动变成了咖啡店吵架……

俄国革命初期，就其内部需要说，是庞大的；就其畏首畏尾，吞吞吐吐说，又是凄惨可怜的。彼得格勒纱厂工人罢工不到一个星期就把专制政体推翻了，但在罢工正要开始的那一天，布尔什维克党首都某区委员会反对罢工。军队倒戈参加暴动，因之帝国终于崩溃，但在军队倒戈前一日，那个委员会又在忧惧不安，考虑是否该劝工人们复工……各党派的革命分子，一生都花在准备革命上头，此时却不明白革命就在眼前，时针转动了，指向胜利了。他们在群众中活动，随着各时各刻的灵感。已经没有了帝国，

^① 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 (Louis-Auguste Blanqui, 1805-1881)，1805年出生于法国阿尔卑斯省。1830年七月革命和1848年二月革命的参加者。1839年5月12日起义的组织者，同年被判处死刑，后改为无期徒刑。1870年巴黎10月31日起义的领导人。1871年巴黎公社时期虽被囚禁而未能直接领导公社，但其思想深刻影响了公社。他的一生中有36年在狱中度过。1881年逝世于巴黎，享年75岁。——校对者注

^② 严格说来，总工会也会有这个作用，同盟、阵线或联合，亦然，虽然成分不匀一是其薄弱的的一个原因。现实比言辞更是应当受重视的。西班牙的“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同盟”从来不肯称为一个政党，但实实在在是一个政党。

没有了政府，没有了皇帝。七十多岁的内务大臣，颤动着嘴巴，漫步于陶立德宫走廊，随手拉住他认识的一个社会党人的袖子。

“先生，你有什么需要？”

“是我，普罗托波波夫^①，……我请你叫人把我抓起来……”

在那时，资产阶级，就政治意义说，也已经等于零了；在俄国，资产阶级本就没有多少人，而且由于它的传统，它是与国家大事距离很远的。在这时候，在2月间（俄国旧历2月，即西历3月），第一个工兵会议中，即在国会侧厅仓卒组成的第一个苏维埃中，倘若有个列宁，有个托洛茨基，有个明见的精神，加上大动乱时代应有的非常的胆略，能看出当时真实的局势，因此推出相应的方略，那么俄国就可以省去一次革命了。一切都是由苏维埃政权开始的。那时没有其他的政权。十五万武装的人，全部卫戍军，以及半百万以上的工人，除了听自己的代表会议的话以外，不肯服从其他的命令……不过，为他们做代言人的，只有三大党的社会主义者：社会革命党（事实上宁可称为社会激进党）、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派和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派，——三者都是稳健的，换一句话说，都是怯懦的，都不能在精神上操纵事变。

时机虽然严重，但政权的竞夺好像在演滑稽戏。所有这些社会主义者所关心的，只有一件事：即把政权推让出去。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最伶俐的政治家——米留可夫^②，2月27日下午2时，当一切都已成熟，旧制度之崩溃已成不可救药的时候，还认为要组织临时政府“现在还嫌太早”，因为人们不知道事情能成什么样子。等着吧，打听一下吧。资产阶级便如此在动乱之前推让政权了。3月1日，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已经成立，邀请米留可夫来组织一个政府，甚至不要他接受什么政纲。那些社会主义者只要

^① 亚历山大·德米特里耶维奇·普罗托波波夫（Александр Дмитриевич Протопопов，1866-1918），1866年出生于下诺夫哥罗德省的贵族家庭，曾在沙俄近卫军服役，后转入地方行政系统。1905年后当选国家杜马议员。1914年任杜马副主席。1916年6月任内政大臣。1917年在镇压二月革命的行动落后，被逮捕。1918年10月27日被处决。——校对者注

^②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米留可夫（Павел Николаевич Милоков，1859-1943），1859年出生于莫斯科的贵族家庭，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历史系，专攻俄国历史与文化。1905年组建立宪民主党，主张君主立宪、议会民主、土地改革，代表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利益。二月革命后，任临时政府外交部长，因其坚持继续战争引发抗议，被迫辞职。十月革命后，参加白军运动。1920年逃往国外，继续参与反苏活动。1943年死于法国。——校对者注

能把政权推让出去就好了，所以仅仅保留一个宣传自由权，——不错，在俄国和西伯利亚，这确是一件前所未有的东西……

“可以做民众和时代的好模范的慷慨行为：那些社会主义者手里拿着全部政权，别人能否自由宣传须完全依靠他们定夺的，然而他们反而把政权拱手让给‘阶级敌人’，只以敌人允许他们自由宣传做交换条件！罗将柯^①不敢到电报局去，他对齐赫泽和苏汉诺夫^②说：‘你们有政权在手，你们可以把我们全部逮捕起来！’齐赫泽^③和苏汉诺夫^④回答他说：‘把政权拿去吧，但不要为了宣传而逮捕我们。’……苏汉诺夫还害怕资产阶级为了这些条件不肯接受政权，于是他提出一个带恐吓的哀的美敦书：‘只有我们才能压得住那些极端分子……现在只有一条出路，就是你们接受我们的条件……’换一句话说：你们接受这个纲领吧，反正这个纲领也是你们的。我们则替你们管束那些把政权交给我们的群众。——这些可怜的自然力的制服者！”^⑤

那些自由派接受了这个温和的压迫，就让步了，组成了临时政府。他们还希望将政权推让给君主政制，只以施行宪法为条件。他们企图救护皇朝。这真是贬价无人要的政权！——尼古拉二世让位给米哈伊尔大公，大公让位给一个遥遥无期的立宪会议……

^① 米哈伊尔·弗拉基米洛维奇·罗将柯(Михаил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Родзянко, 1859-1924)，俄国十月党领袖，贵族。1911年进入国家杜马，1912年任第四届杜马主席，主张君主立宪制改革。二月革命期间，试图说服尼古拉二世退位以挽救君主制，但未成功，出任临时政府总理。十月革命后，参加白军运动。1920年逃往国外，继续参与反苏活动。1924年死于南斯拉夫。——校对者注

^② 罗将柯是稳健的自由派资产阶级一个领袖；齐赫泽和苏汉诺夫是稳健的社会主义者、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

^③ 尼古拉·谢苗诺维奇·齐赫泽(Николай Семёнович Чхеидзе, 1864-1926)，俄国孟什维克领袖。早年参与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后加入孟什维克派。1907年当选第三届国家杜马代表，为孟什维克在杜马中的领袖之一。二月革命后，任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在临时政府与苏维埃间扮演调和角色，主张与临时政府合作，反对布尔什维克党。十月革命后，于1918年参与建立外高加索民主联邦共和国，任总统。1921年红军占领格鲁吉亚后流亡法国，1926年在巴黎自杀。——校对者注

^④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苏汉诺夫(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 Суханов, 1882-1940)，俄国孟什维克领袖。1903年参加俄国社会革命党。1905年参加莫斯科起义，后被捕并被流放。1913年宣布退出社会革命党。一战期间持国际主义立场。二月革命后任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并参加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十月革命后在经济部门任职，曾任第一劳动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30年7月被捕，1940年6月29日被杀害。——校对者注

^⑤ 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法文版)第1卷第251页。苏汉诺夫的回忆录，关于此次交涉有详细的记载。苏汉诺夫夫人，1931年在莫斯科被判十年徒刑，因为他组织了一个社会主义派。

革命有了头脑

俄国革命就是这样成就的：初时好像没有一个人帮助它。这给予我们一个大教训，即是：这类事变是不能人工催促而成的。唯有盲目的人才会计设想，当历史的必然性正在进行之时，人们能够赞成或反对。那些知道辨认事变要领的人，此时所能做的，就只有替事变服务，为的从中获取最大的利益；他们愈能够与事实的不得不然的进程同流，而从中发现进程的规律，则所实行的也就愈多。唯有这些人才是革命者，不管平时的性格如何，也许是儒雅的书生，天天躲在图书馆里的。到了那时可以看见他们离开图书馆，搬移石头堆在街道障碍物上面，或者贡献意见给区委员会……

列宁未回到俄国之前，革命是停滞不进的。

“1917年是世界大战的第四年。一千个日子以来，欧洲所有大国，国内壮丁都穿起了军服。整个大陆青年人的精华，整整一代的青年人，都被歼灭殆尽了。三千万人动员相杀。这是大炮逞威风的时代。

“火线贯穿了整个欧洲，从北海到亚得里亚海，从波罗的海到地中海。这是鲜血淋漓的战线，每天都要死成千上万战士。壕沟的战争，地雷、坦克车、飞机、毒气、潜水艇的战争，使人厌气的谣言诤语的战争。在前方，士兵死在本国的军法和敌国的炮火之间；在后方，人们拿士兵的流血来做买卖，来做无聊的宣传。

“1917年，在法国，是克里孟梭^①主义之年，是尼维尔将军^②之年，是4月16日的总攻击，打通‘达姆大道’之年。弗兰德和凡尔登两地无效果的会战，坎布雷的坦克大战。塞尔维亚、法兰西北部、比利时、波兰，完全成了坟墓，德国向英国宣布无限制的

^① 乔治·克里孟梭 (Georges Clemenceau, 1841-1929)，1841年生于法国旺代省，自幼受激进共和思想影响。早年学医，曾赴美国行医并接触民主思想，1870年回国后投身政治。1871年当选巴黎市议员，1876年进入国民议会，主张政教分离、征收累进所得税。1898年揭露军方反犹阴谋，推动德雷福斯平反。1906-1909年任总理兼内政部长，镇压工人罢工，继续延续帝国主义政策。1917-1919年任总理兼陆军部长，期间发动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战后主持了巴黎和会。1920年总统选举失利后退出政坛。——校对者注

^② 罗贝尔·乔治·尼维尔 (Robert Georges Nivelle, 1856-1924)，法国陆军将领。1878年任炮兵军官，先后参与多场法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国家的侵略战争。一战爆发后，于1916年12月被任命为西线法军总司令。1917年4月发动“尼维尔攻势”，宣称48小时内突破德军防线，造成己方35万人死亡而收效甚微，引发前线军队哗变，旋即被革职。后调任北非殖民地驻军司令，逐渐淡出军事核心。——校对者注

潜艇战争：商船被炸沉，中立国人民被覆没。海里充塞了死人。

“人们在马其顿作战，在美索不达米亚作战，在巴勒斯坦作战，在满生荆棘的非洲僻地作战。美国参加战争。黑人的军队，印度人、澳大利亚人、加拿大人、葡萄牙人的军队：各种各族的血流为一潭，散发出同一种恶臭。美国人则带着参战国剩余的黄金离去了。

“意大利人的战线在卡波雷托被粉碎，德奥联军进占皮亚韦，齐柏林飞艇轰炸伦敦，哥达^①轰炸巴黎，哥达轰炸威尼斯，法国飞机轰炸斯图加特。阅兵，授勋。

“在双方的后方，大炮和军火制造家大发其财；戒严，出版检查，老人和妇女的忧虑，重大贫困，过度奢侈，面包票，煤炭票，一切人类生活都受愚蠢和仇恨所支配。英国迫害那些有良心的抗议者，法国迫害那些失败主义者，到处迫害国际主义者。教会、政党、知识分子，无论在中欧帝国方面，或者协约国方面，都宣传彻底战争；主战派社会主义者加入了神圣联盟……

“所有的技术都用来毁灭人类的活力和文明的成绩。那些在火药中耗费的财富，若是以合理方法使用起来，借用乌托邦派的话说，是充分足够使改造过的社会中人人都能快乐生活的……

“这就是资本帝国主义间瓜分世界的大战之第四年的状况……”^②

突然，一个帝国塌台的响声，在这个黑暗年头，宛如晴天霹雳，盖过了大炮的声音。俄国民众要求：和平给一切人，土地给农民，工厂给工人。全国民众都有武装，因为是战争发给了他们。俄国人死在战场上的，比其他各国都多，也比其他各国更受压迫，更加贫困。那么他们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他们知道要做什么事吗？知道能做什么事吗？

1917年4月3日，列宁在彼得格勒的芬兰车站下车。同他一路，还有季诺维也夫及其他的人。尼古拉·列宁，本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差不多是一个无人认识的人。他这年四十七岁，早已经从事了三十年的革命活动。少年时，就有一个绞刑架的黑影遮掩在他的生命之上：亚历

^① 由哥达公司研发的德军重型轰炸机。——校对者注

^② 维克多·塞尔日：《列宁》，1917年，第3页及第4页。

山大三世^①的刽子手绞死了他的哥哥^②。二十三岁时，他在圣彼得堡（1893年）成立一个组织，这是俄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团体之一。他在西伯利亚充军好几年。1903年，他在俄国工人运动的领袖中崭露头角，被人视为苛刻的学理家（由于创办《火花报》和分裂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为布尔什维克即革命的多数派和孟什维克即机会主义的少数派）。亡命在伦敦、巴黎、瑞士、芬兰、克拉科夫，他始终不停止不间断地工作；党外没有多少人认识他，他从事着他的骄傲自承的“职业”——无产阶级的理论家、宣传家和组织家，总而言之，革命家的职业。他的不可屈挠的党，以一种无限制的信任心围绕着他；这党，可说是他组织的，是他锻炼的，社会主义国际中的人喜欢称这党的人为“狂热派”。在一次革命中（1905年），他曾灵活地指挥过这个党。人们讨论他，讨论他的关于唯物论哲学和关于经济学的著作：这是一位学者。社会党国际大会的记录提到过他的活动；那些新闻记者却没有注意到他。1907年在斯图加特开大会^③时，他拥护罗莎·卢森堡，但好多人去注目爱尔威^④，却没有人看见列宁。但1914年8月，在最可耻的背叛风潮之中，社会主义、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名流，大多数都突然转去拥护战争了，大家都以为工人运动已经完蛋了，因为去附和发昏的爱国主义去了，此时唯有列宁确信未来属于我们，开始一砖一石地立下第三国际的基础。在齐美尔瓦尔德会议^⑤时（1915

^① 亚历山大三世（Александр III, 1845-1894），俄国第十三位皇帝，1881年3月13日-1894年11月1日在位。——校对者注

^② 亚历山大·伊里奇·乌里扬诺夫（Александр Ильич Ульянов, 1866-1887），俄国民意党人。1883年进入圣彼得堡大学学习自然科学。1886年参与学生秘密小组，并加入民意党，计划刺杀亚历山大三世以激发民众革命。1887年3月因密探渗透，全体成员在行动前被捕。在法庭上拒绝辩护，发表演讲谴责专制制度：“恐怖手段是专制压迫下人民的唯一回答！”被法院判处绞刑。同年5月8日英勇就义。——校对者注

^③ 即第二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于1907年8月18日在德国斯图加特召开，出席大会的有二十五个国家的八百八十四名代表。大会的主要议题是军国主义和国际冲突、殖民地、党与工会的关系等问题。大会决议案指出战争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只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才能最后消除战争；社会民主党人不仅要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而且要尽快结束已经发生的战争，并利用战争引起的政治、经济危机来唤醒民众，加速资本主义统治的崩溃。大会通过了《国际代表大会和国际局章程》，这是第二国际建立以来制定的第一个章程。——校对者注

^④ 古斯塔夫·爱尔威（Gustave Hervé, 1871-1944），早年加入法国社会党，主编《社会战争报》，持激进反军国主义立场。一战爆发后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改报名为《胜利报》，宣扬神圣爱国战争。俄国十月革命后，反对布尔什维克及俄国革命，鼓吹列强武装干预苏俄。30年代后鼓吹国家社会主义，主张强人统治，赞扬墨索里尼与希特勒政权。1940年法国战败后，拥护维希政权。1944年巴黎解放前夕死于贫病交加。——校对者注

^⑤ 即国际社会党第一次代表会议，于1915年9月5日在瑞士齐美尔瓦尔德召开，出席大会的有十一个国家的三十八名代表。会议中心议题是讨论对待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态度问题。列宁代表左派提出的决议草案阐明战争的帝国主义实质，揭露社会沙文主义者的背叛行径，提出无产阶级的策略路线，强调支持和推进一切革命行动，努力把帝国主义

年)，一些国际主义者不禁惊骇起来，听到他平心静气地谈论着革命。

这个人，在这个大战年头，站稳脚步，从他在苏黎世的亡命寓所走出来，要带着一种明朗的意识和一种坚强的魄力来指导近代第一个社会革命。六个月后，他成了“最受全世界仇恨，又最受全世界敬爱的人”。

在这文明黯淡之中，他带给无产阶级一个新的生活观：唯有胜利。

他说：“战争的目的，就是受财政寡头统治的诸大强国要重行分配世界。”

他说：“要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

他说：“要组织一个新的社会主义国际，亦即是革命行动的国际。”

他看得很清楚可能做的限度；但这个可能性，他是要尽量利用的。他不宣告在俄国实行社会主义，而只说要为农民利益没收大地主土地，要工人监督工厂，要一种劳动者民主专政，工人阶级在其中占有领导权。

他刚走下火车，就问他的同党同志说：

“为什么不去夺取政权呢？”

立刻，他就在他的《四月提纲》^①上写下了夺取政权的纲领。人家说他疯了，人家骂他发昏。他狡猾地微笑着，坐在旧日沙皇某情人邸宅内一张漂亮的写字台前面，仍旧低着头写作着。那些老资格的战士责骂他，《真理报》攻击他，但人们意外地发现，原来街道、工厂和营房里的人倾耳听他的话。——一点不错！他的整个天才就是在于知道说出这些人心里要说但自己不知道说的话，以前没有一个政客，没有一个革命者知道替他们说这些话。

战争变为被压迫阶级反对压迫者的国内战争，变为剥夺资本家阶级的战争，变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争取实现社会主义的战争。大会最后通过了托洛茨基起草的宣言，宣布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谴责社会沙文主义和“保卫祖国”的口号，指出争取和平的斗争必须同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联系起来。——校对者注

^① 《四月提纲》即《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最初发表于1917年4月7日（20日）《真理报》第26号。列宁在这个提纲中确立了布尔什维克党以夺取政权为革命最终目的，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直接转变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跳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校对者注

在三个星期之内，无需什么斗争，党内大多数已经拥护他了。再没有什么同稳健派携手来稳定一个代议制共和国的问题了。

“党要一个更民主的工农共和国，在这政制下，警察和常备军将被废除，而代之以人民武装。”^{①②}

党要“人民自主”，即是说：官吏由人民选举和罢免，立法权和行政权同操于工兵代表会议（苏维埃）之手，“各民族都有权利组成自治的国家”，“银行、托拉斯、卡特尔收归国有”，“没收土地随即交付于组成苏维埃的农民”，——一种普遍的和平，这应当是“劳动者为对抗一切资本家而作的一种和平”。

这政纲里面，没有一点是不可实行的；相反，这时不实行这个政纲，反而是困难的和危险的。但要成功这个，就必须用武力，必须大胆，必须打破思想惰性，必须同利害关系决裂。好多人依赖战争为生活的，而且俄国受它的同盟国所束缚。有产阶级害怕丧失一切，将要起来反抗的；他们的力量无论如何薄弱，仍会有惊人的动作。必须接受这个斗争。在这革命时代，列宁有了革命的勇气和革命的智慧。

^① 1917年4月24日至26日党的会议中，列宁关于政纲的演说。

^② 列宁的原话为：“要求建立无产阶级-农民民主共和国（也就是一种没有警察、没有常备军、没有特权官吏的国家类型）。”（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9卷第404页）——校对者注

革命的第二个头脑

当一种观念存在于一个时代的空气中时，即是说，当使某一观念诞生和生存的普遍条件已经实现时，这一时代的人就开始预感到它，所以它常常同时出现于几个人思想之内。一个时代的真理就是如此出现的。在科学上如此，在政治上也是如此，——从某几方面说，政治也是一种科学，同时又是一种艺术。达尔文和华莱士差不多是同时发现物竞天择公律的，新兴的资本主义社会本就供给他们以这公律的最好典型。焦耳和迈耶差不多同时发现能量守恒定律。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时得到关于近代社会基础同样结论，他们两人以二十五年长久而可钦佩的智力合作，创立下科学的社会主义。俄国革命就要在行动中（但是受很坚强的思想滋养起来的一种行动）实现一种同样惊人的合作：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合作。

托洛茨基，1917年被法国驱逐出国（一种挑唆的结果，命令是马尔维^①签字，茹尔·盖得^②是当时的总长），又被西班牙认为不稳分子而驱逐出国，只好流亡到纽约，在那里活动了一个时候，然后去往加拿大，为的是返回俄国去。他连同他的妻子和他的孩子们，被关在一个集中营里，终于因彼得格勒苏维埃的要求，才得恢复自由。他是5月5日回到俄国首都，他上岸时第一次演说，就是主张夺取政权。他的演说家、政论家和组织家的才能，从此时起，时常使他盖过列宁之上；列宁初见是不如他动人的。列宁是个和悦可亲的人，不爱出风头，外貌是平凡的；他同平常人在一处，并不引起人注意；他说话是非常简单的；吸引听众的，并不是他的词句，而是他的论证。他写文章绝不留心形式，只将他要说的话写出就完了，绝不添加点什么。他的一生从来未曾对文学女神让步过。托洛茨基，则无论

^① 路易-让·马尔维 (Louis-Jean Malvy, 1875-1949), 1898年加入激进社会党, 主张世俗化、反教权和社会改革。1906年当选国民议会议员。1914年8月任内政部长, 因立场温和和被指控其叛国, 于1917年8月被迫辞职。1918年被以“危害国家安全”罪起诉, 判处5年流放。1924年法国左翼联盟胜利后恢复政治权利, 重返政坛。——校对者注

^② 茹尔·盖得 (Jules Guesde, 1845-1922), 早年参与共和派活动, 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后流亡瑞士和意大利, 接触马克思主义, 思想转向马克思主义。1876年回国后创办《平等报》, 系统宣传马克思主义。1876年参与组建法国工人党。1889年7月参与组建第二国际, 被选入大会主席团。之后, 受饶勒斯改良主义影响, 逐渐放弃革命斗争策略, 以议会斗争代替阶级斗争。一战爆发后, 堕落为社会沙文主义者, 并参加资产阶级政府, 任不管部长。列宁评价其为: “在1914年8月背叛社会主义以前是国际社会主义最出色的领袖。”——校对者注

到什么地方都触人眼目。他的头发，他的头部姿势，他的蓝灰色的强烈眼光，不知含有一种什么威严的和吸引人的东西。在演说台上，他的语音带点金属之声，他的话一句一句地像枪弹一样直射出来。他要变成这个革命的最超越的演说家。他的文笔更含有一种妥实的艺术。但最重要的，还在于这个时刻恰是他的一生所等待的，所预见的，所祈求的。在社会民主党中，他是不断革命论的理论家，即他确信：一个革命，在未曾完成其工作以前，是不能也不肯止息的，因此是一个国际的革命。

他懂得多国语言，熟悉世界情事，这是俄国革命家中最西欧化的。然而列宁有一点无可否认地胜过他：列宁有一个党。这个党自1903年以来有了十四年斗争和艰苦工作的历史了。我们刚才看见，列宁回国以后，这个党改变了精神和政纲可以说它走到了好久以来托洛茨基所怀抱的观念。于是托洛茨基和他的朋友们加入了这个党。当时的文书，一连好多年，都是将两个人的名字合在一起说的；这两个人其实只有一个思想和一个行动，就是传达几百万人的思想和行动。这是革命的两颗头脑，民众的爱戴、敌人的仇恨都是集中在他们身上。高尔基每天在他的《新生活报》上攻击这两个可痛恨的捣乱分子：

“列宁、托洛茨基和他们的党徒，已经吞下政权毒素了；他们对于言论自由，对于个人和对于全体权利所持的可耻态度，可为明证；民主运动就是为这些权利而奋斗的……”

“列宁和他的党徒，自以为什么罪恶都可以做的……”

“列宁并非一个万能的法师，而是一个无聊的江湖术士，既不要脸，又不爱惜无产阶级的生命……”

“弗拉基米尔·列宁输入社会主义制度到俄国来……是迫不及待的从泥泞中走过。列宁、托洛茨基和一切跟随他们走向现实之破产去的人，显然是确信：为了那丢脸的权力，可以牵着俄国人的鼻子走的……”^①

以上都是出于1917年高尔基的手笔。

社会革命党，在内战初起时想要暗杀布尔什维主义的首脑时候，就是

^① 见苏瓦林：《斯大林传》第184页和第185页所征引的。

属于于这两个人。他们对列宁开枪，打伤了他；那些恐怖主义者也在一个车站伺候，要炸毁托洛茨基乘坐的列车，但这列车偶然走另一条道路。当时的文书和著作都是把这两颗头脑的合作安置在大事件的内心或顶点的。雅克·萨杜尔^①的《布尔什维克革命笔记》，约翰·里德^②的《震撼世界的十天》和吉尔波^③的《列宁真相》，是关于这时代最可宝贵的记载。1923年，安德烈·莫里哲^④从莫斯科回来著的一本书，还题名叫作《在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国家中》。雅克·萨杜尔写给阿尔伯特·托马斯^⑤的信内说（1917年11月13日）：“托洛茨基操纵着暴动，他就是暴动的钢铁灵魂，而列宁则是暴动的理论家。”^⑥

临时政府于1917年6月举行全线总攻击，这是出于协约国的请求，意在缓和西线的战事，——不幸大败特败。俄国的冲锋大队给炮火轰碎了，大部分军队瓦解了。整团整师都在烈日之下融化了，打军棍和枪毙等刑罚（以前就靠这些刑罚维持的）都无济于事了。士兵带着枪和子弹回到后方来，叫喊着该停战了。彼得格勒的卫戍军和工厂工人，受了无政府党的激动，都涌上街头。这是违反布尔什维克党人的意志的。布尔什维克党人认

^① 雅克·努马·萨杜尔 (Jacques Numa Sadoul, 1881-1956), 1881年生于法国蒙彼利埃, 法律专业出身, 后入法军服役。1917年被派往俄国, 任法国军事代表团成员, 负责协约国与俄军的联络工作。十月革命后, 受布尔什维克主义影响, 呼吁法国工人支持俄国革命, 公开批评法国政府对苏俄的干涉政策。1918年被法国政府以“叛国罪”缺席判处死刑。此后参加法国共产主义小组。1924年正式加入苏联国籍, 在红军中担任顾问。1956年在莫斯科逝世。——校对者注

^② 约翰·里德 (John Reed, 1887-1920), 1887年生于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市, 哈佛大学毕业, 学生时代即展现激进思想。一战期间, 以特派记者身份赴欧洲, 揭露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罪恶, 被法庭以叛国罪起诉。1917年9月访问俄国, 以记者身份亲历彼得格勒武装起义, 据此出版报告文学集《震撼世界的十天》, 受到列宁的赞扬与推荐。1919年参与组建美国共产主义劳工党 (后并入美国共产党), 因宣传共产主义在美国多次被捕, 之后秘密前往苏联参与共产国际工作。1920年在莫斯科感染斑疹伤寒逝世, 享年32岁。——校对者注

^③ 亨利·吉尔波 (Henri Guillebaux, 1885-1938), 1885年生于法国沙泰勒罗, 青年时代投身文学, 受象征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影响。1913年创办文学杂志《逆流》, 参与达达主义运动。1914年拒绝参军, 流亡瑞士, 与罗曼·罗兰合作创办反战刊物《明日》, 之后思想转向共产主义。1919年赴俄国参加共产国际活动, 推动布尔什维克主义在法国的传播, 被法国政府缺席判处死刑。后因受苏联党内斗争影响, 感到幻灭, 于1932年回国。1938年在巴黎逝世。——校对者注

^④ 安德烈·莫里哲 (André Morizet, 1876-1942), 1876年生于法国涅夫勒, 毕业于巴黎政治学院, 律师出身。1900年代加入法国社会党, 属饶勒斯派, 主张市政社会主义。1919年当选布洛涅-比扬古市长, 推动工人住房与社会福利改革, 鼓吹阶级调和。1940年法国战败后, 与维希政权合作, 保留市长职位。1942年死于心脏病。——校对者注

^⑤ 阿尔伯特·托马斯 (Albert Thomas, 1878-1932), 1878年生于法国塞纳-马恩省, 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 历史学者出身。1904年加入法国社会党, 为改良派领袖, 主张通过议会斗争实现社会改革。一战爆发后, 沦为社会沙文主义者, 任法国军需部部长。1919年参与设计国际劳工组织, 任首任局长。1932年死于尿毒症。——校对者注

^⑥ 见《布尔什维克革命笔记》第76页。

为夺取政权的机会还未成熟。

克伦斯基^①还有忠实的哥萨克骑兵可供指挥，人数足够压平暴动之用。第二天，布尔什维克党就被宣布取缔。列宁和季诺维也夫躲藏在芬兰海边一座茅草屋里；列宁就在那里写就了他的《国家与革命》。托洛茨基则让人捕去，冒着被私杀或枪毙的危险，为的两人中至少有一个人高高负起自己的责任。于是敌人们发明了最大的毒物，最有效的毒物，来对付他们，几乎残害了他们，几乎残害了正在兴起的革命。

^① 亚历山大·费奥多洛维奇·克伦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Фёдорович Керенский，1881-1970），1881年生于俄国辛比尔斯克，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法律系。1912年当选第四届国家杜马议员，加入“劳动团”。二月革命中成为彼得格勒苏维埃副主席，之后担任临时政府司法部长。5月任陆海军部长，试图维持军队纪律并继续帝国主义战争。7月任总理兼陆军部长，镇压布尔什维克党。十月革命期间试图调兵镇压未果，化装成水兵逃出彼得格勒；组织少量军队反攻，但迅速失败。1918年经法国流亡美国，从事境外反苏活动。1970年死于美国纽约。——校对者注

诬蔑，这毒物！

7月4日（1917年）夜间，一种诡谲的谣言在苏维埃机关走廊内弥漫着。——你知道什么新闻吗？是的，列宁和托洛茨基卖国的证据已经发现了。一些确实无疑的文件，从德国参谋部弄来的，就要公布了。一些已经译出的电报。一些签了字的收条。他们收了好几百万马克呢！

全世界报纸用大字标出：布尔什维克党人是德国收买的密探！

阴谋之线牵引到斯德哥尔摩去，在那里有一个德国侦探机关。克伦斯基认为已经有了“非常严重的证据”。人们公布一封信，据说是某处邮局检查出来的，信内一位德国男爵“庆贺布尔什维克党人，为着他们的行动”，而且预先见到“柏林的人将要欢喜的”。人们记起了，列宁、季诺维也夫及其他二十几个俄国社会主义者，当初是坐在“铅皮车箱”内，经过德国回到俄国来的（在途中，列宁拒绝见客，尤其不肯见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他说：“若是李卜克内西来，则极愿相见！”）。自由派部长米留可夫说起了德国黄金在俄国革命中的作用。开始进行侦查了。结果虽然不起诉，历史也不容许其结束的。俄国从前反间谍活动机关的一个探员，指教我们说：“那些侦探，在访案时候，常常自己伪造证据”，但接着，出人意外的，他证明出：不仅布尔什维克党人是卖国的，连反对布尔什维克的人也是卖国的。照他的意见，只有反间谍活动机关的探员不卖国，但他们的时间都耗费在伪造卖国证据上面……

这位乌斯季诺夫先生^①写道：

“反间谍活动机关的报告，关于列宁过去活动，关于他与德国参谋部的关系，关于他收受德国黄金的事实，——都是实实在在的，应当立刻处他死刑。”

克伦斯基并没有照这话做，因为他自己就是“人所共知的”卖国贼。

^① 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乌斯季诺夫（Владими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Устинов，1880？-？），1917年任临时政府军事反间谍局高级探员。7月主导调查“布尔什维克通德案”，宣称发现列宁、托洛茨基接受德国资金的“证据”。据美国记者阿尔伯特·威廉斯记录，乌斯季诺夫曾私下承认部分文件系伪造。十月革命后，流亡西欧。——校对者注

我重提这些事实，乃是因为诬蔑，这毒物，有一种奇异的命运透过俄国革命，而我们看见它今日又在俄国以同样方式复活起来了。1917年，德国黄金的神话不久就销声敛迹了；在社会斗争的可歌可泣的几年中，诬蔑无所施其技；直到十年之后，1927-1928年间，它才又出现，而且从那时起，它就飞扬跋扈以至令人骇怪了。

走向政权

1917年9月，科尔尼洛夫将军^①的叛变惨淡收场了，于是形势彻底扭转。现实是比那些依据“双面侦探”机关所伪造的证据而编造的诬蔑人的神话更加有力的；现实指示出：谁是革命的，谁是空谈的，谁是演滑稽戏的，谁是反革命的。克伦斯基政府露出真面目来了：原来是摇摆于两种可能的专政中间的一个傀儡。要么是那些将军，他们在反动方面是唯一能明见的，而且操有武力，——在社会不安定期，哪怕一个副官也估量得出强权对于有钱人有什么价值，——或者他们明天再开始这个把戏而获得成功，使革命走向波拿巴主义；要么是工人、士兵、农民、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党，用暴力手段夺得政权，除此之外别无方法。在军事独裁和无产阶级专政之外，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

列宁和托洛茨基看得很清楚，他们提议、催促、命令并进行夺取政权。前者以党的领袖身份，打破了障碍，终于说服了党；后者以彼得格勒苏维埃的领袖身份，在苏维埃中组织一个革命军事委员会，分发武器给工人，运动革命的卫戍军不服从临时政府并不离开首都。这事实上已经是暴动了。

这两个人，面对面时，往往带点忧虑互相望着。他们太迫切自觉得缺一不可了。

“我们两人，”一天，列宁问托洛茨基说，“若是被杀了，你觉得布哈林和斯维尔德洛夫担负得了这责任吗？”

从前，我曾以如下一段文字描写过这两个人在1919年的状况，现在我觉得没有一点需要修正的：

“专家们出去了。两人还留在‘最高会议’中间，这会议，就它的忧愁面目说，就它的铺满了专业数字的纸张说，确实极像一个亏空极大的企业的经理部会议。负的方面：

^① 拉夫尔·科尔尼洛夫(Лавр Корнилов, 1870-1918), 1870年生于西伯利亚的哥萨克家庭, 毕业于米哈伊洛夫炮兵学院和总参谋部学院, 先后参加了日俄战争及第一次世界大战。1917年3月担任彼得格勒军区司令, 6月任临时政府武装力量最高统帅。8月底企图发动政变推翻临时政府, 建立军事独裁以“拯救俄国”, 但政变刚开始就被工人阶级粉碎了。十月革命后, 组织白军负隅顽抗, 于1918年4月被红军击毙。——校对者注

布达佩斯的白色恐怖，汉堡的失败，柏林的消沉，巴黎的消沉，让·龙格^①的犹豫，奥廖尔的丧失，图拉的受威胁。负的方面：我们这里什么都没有，我们正从贫困、黑暗和不断失败之中走出来。正的方面：意大利来的电报，都灵地方的罢工，西伯利亚森林区游击队的战功，华盛顿和东京间的敌对，塞拉蒂^②和皮埃尔·布里松^③写的论文。正的方面：无产阶级的觉悟、意志与鲜血。还有正的方面：肉体受了战伤的文明之惊人的衰落。从宣传角度看，被芬兰白色恐怖屠杀的一万一千人也可算入正的方面去……

“在这顷刻，在群众的静寂和辛劳当中，辩论取决于这两颗头脑。这就是到处悬挂大家已经厌见的两幅肖像：在人家中，在办公室中，在俱乐部中，在报纸中，在阿谀人的照相馆玻璃窗中，在公共建筑物的大门中。有一次，在煤矿收归国有大成功之后，这两个人兴致极佳，曾用嘲笑的口气论及这个肖像崇拜说：‘不知道消费了多少肖像哩！你说，你不以为太过火了？’——‘这是人心拥戴的反面，我的朋友，这是那些投机分子，那些蠢才，故意夸大的。’他们两人都是善于讽刺的，但性格不同：一个是和悦可亲的人，光秃的宽阔的额头，两颊微耸，鼻子很大，胡髭微带赭色，显出健康、朴素和机警。时常爱笑，笑时眼睛缩小，充满了绿色的火花。这时他的大额头有点凸出，嘴巴张大，现出一种愉快的表情，看见他的人会觉得有点亚洲人的相貌夹杂在这个欧洲人的相貌之中。——另一个，则是犹太人，有时现出雄鹰一般的丑陋在那生着有力两层的嘴角皱纹之中，眼光里露出一种锐利的聪明，一种人类领导者的头部姿势，一种内心的确信，浅见的人也许以为是旧式的骄傲，而且在他的笑中又好像戴着一个梅菲斯特^④的面具，因为这个人还能感到那种青年人的快乐，在他们看来，整个生命正待他们去占取的。他们嘲笑他们自己的肖像。一个说：‘但愿我们能多活几时，阻止这些肖像的复印！’另一

^① 让·龙格 (Jean Longuet, 1876-1938), 1876 年生于英国伦敦, 为马克思的外孙。1890 年代移居法国, 加入法国社会党, 属饶勒斯派。一战期间, 沦为社会沙文主义者。1915 年参加齐美尔瓦尔德会议, 但反对暴力革命路线。1920 年图尔代表大会上, 反对社会党加入共产党, 主张保留民主社会主义传统。1930 年代呼吁左翼联合对抗极右翼, 支持人民阵线。1938 年病逝于法国巴黎。——校对者注

^② 贾辛托·梅诺蒂·塞拉蒂 (Giacinto Menotti Serrati, 1874-1926), 1872 年生于意大利热那亚, 工人家庭出身, 早年参加工会运动。1890 年代加入意大利社会党, 属激进派, 反对改良主义。一战期间积极参加齐美尔瓦尔德运动, 主张“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十月革命后率社会党参加共产国际。1919-1920 年“红色两年”运动期间, 组织工人占领工厂运动, 但反对武装起义。1921 年领导社会党左翼多数派, 拒绝接受共产国际“二十一条”, 少数派退出成立意大利共产党。1924 年率社会党左翼与意共合并。1926 年在米兰突发心脏病去世。——校对者注

^③ 皮埃尔·布里松 (Pierre Brizon, 1878-1923), 1878 年生于法国阿列省, 曾担任教师, 后投身社会主义运动。1914 年当选国民议会议员, 8 月法国社会党决议支持政府参战, 公开投票反对战争拨款。1915 年参与齐美尔瓦尔德会议, 但反对暴力革命路线, 主张和平主义。1920 年图尔代表大会上, 反对社会党加入共产党。1923 年病逝于蒙吕松。——校对者注

^④ 梅菲斯特 (Mephistopheles), 歌德《浮士德》中的恶魔的名称。在俄国白银时代的文学作品常用“梅菲斯特”象征革命者的双重性 (革命者既自诩为历史正义的祭司, 又不得不采用魔鬼的破坏手段), 此处亦然。——校对者注

个说：“但愿我们能多活几时，免得被人家奉为神明！”他们明白，非依靠在最古老的岩石上是不能翻转世界的。”^①

这两个人，并不是自从有了“统领”、“加齐”、“元首”、苏维埃式的“伟大领袖”等称呼以后那种意义下的领袖。他们的受人拥戴，并不是人为的或强迫的，而是自成的，由于他们应得的信任。人家公然议论他们的言行。不仅如此，人家还反驳他们。若是敌人，他们就一面耸肩，一面回答；若是劳动者，他们就平心解释，人家也常常使得他们的主张只有少数人赞成。这是同志中的两个人，那些有危险性的蠢才要把他们抬高于同志或党之上，是要受他们严厉责骂的。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无时无刻不是过着一种集体的生活。党内辩论着，种种倾向不时发生又不时消灭。而且，在国内，反对派分子——这是不可同反革命派分子混为一谈的——不停地公然活动着，在整个国内战争时期，即是说直到1921年。到了1925-1926年，反对派分子才完全看不见了，而且正因为这个缘故，一切党内生活完全消灭了。列宁当初曾邀请他的老政敌、孟什维克领袖马尔托夫^②和唐恩^③，来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辩论。无政府主义者是这个委员会中一部分。左派社会革命党初时参加政权至好几个月长久。他们只因企图暴动，而且1918年7月间在莫斯科街上乱轰大炮，才被驱逐出政府以外。没有人想到为一个至高无上的国家而拼命的，人们是为一个新的自由，而奋斗，而死。布尔什维主义向群众和世界宣告一个前所未有的自由劳动者民主制，而得到胜利。斯维尔德洛夫起草的第一个苏维埃宪法，宣布保证劳动者一切自由。譬如说，当时绝不是想在暴动胜利之后取消出版自由，

^① 维克多·塞尔日：《被征服的城》。我这本书是在列宁格勒写的，之所以没有写下这两人名宇，主要是怕“黑局”不肯放过我的稿子。

^② 尤里·奥西波维奇·马尔托夫（Юлий Осипович Мартов，1873-1923），1873年生于君士坦丁堡。大学期间开始投身革命运动，1890年代在圣彼得堡参与马克思主义小组，与列宁共同创建“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900年同列宁一起创办《火星报》，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为孟什维克派。1905年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回国，他反对孟什维克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十月革命后，他支持红军，但反对布尔什维克的许多措施。1920年流亡德国，创办《社会主义通报》，成为孟什维克流亡者的理论阵地。1923年4月因肺结核病逝于德国施马尔根多夫。——校对者注

^③ 费奥多尔·伊里奇·唐恩（Фёдор Ильич Дан，1871-1947），早年曾参加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先后三次被捕被流放。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为孟什维克派。二月革命爆发后回到彼得格勒，曾任彼得格勒苏维埃执委会委员和副主席。反对十月革命。1921年被捕，1922年被驱逐出国后，长期领导孟什维克流亡分子的活动。1933年流亡法国，1940年流亡美国。1947年1月22日在纽约逝世。——校对者注

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对于出版物之垄断”。为此缘故，必须禁止反动的出版物，这些东西本是诬蔑造谣的行家。但是，托洛茨基也说：“每个公民团体有自由使用印刷机关和纸张的权利。”列宁有个计划，规定每个公民团体，有一万或一万五千劳动者拥护的，若是愿意，则有权出版一份日报。

1917年11月7日^①的胜利

应该时时刻刻提醒一件事，即是：关于俄国革命所用的字眼，如领袖、党、苏维埃、群众等，现在都完全改变意义了，一般说来，都变成与希望和胜利那几个伟大年头所用的刚刚相反的意义了。必须细心改造过初期全部历史，而且还不止此哩！在十月暴动时候，所谓领袖不过是最前列的，说话最有人听的，最够资格的战士而已；所谓布尔什维克党不过是最能表示群众感情的政治组织而已，它的行动之受人拥戴和有实效，便是由此而来的。

在紧急关头那几天，这个行动，我们试借助若干罕见的稿件，描写一个轮廓。

布哈林在1922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叙述：

“……这是在彼得堡，当民主会议时候：你试想像冬宫，还有在那里的克伦斯基，——他刚从莫斯科回来，他在莫斯科召集一个不幸的政府会议，莫斯科工人用总罢工来迎接他，甚至“首都酒店”的仆役也拒绝服侍那些代表老爷……这里先说一说此时我们党内的一件秘密事。列宁藏起来了，克伦斯基召集的民主会议快要开会的时候，我们的中央委员会举行会议。我们的策略是很明白的，在群众中鼓动和宣传，准备那即要爆发的暴动。我刚走进会场时，米柳亭^②即赶到我面前来，告诉我：‘收到一封信，布哈林同志，一封短信。’

“信中说：‘你们如果不立刻遣派布尔什维克党人到工厂中去，你们如果不包围和逮捕民主会议那些恶棍，那你们就是混蛋和叛徒。’全信都是用这口气写的，而且充满了恐吓。我们大家都惊讶了一声‘啊这！’从没有人这样粗暴提出问题。大家不知道怎样才好。

^① 即俄国旧历10月25日。

^② 弗拉基米尔·巴甫洛维奇·米柳亭（Владимир Павлович Милотин，1884-1937），1884年生于俄国库尔斯克省，毕业于莫斯科大学经济系，学生时代参与革命运动。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属布尔什维克，但常摇摆于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之间。先后八次被捕，五次入狱，两次流放。二月革命后任萨拉托夫苏维埃主席。1917年7月任彼得格勒苏维埃副主席、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十月革命后任农业人民委员，推动《土地法令》实施。之后支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左翼联合政府”主张，辞去职务，但不久即承认错误，撤回申请，之后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经济部长。1918年任最高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副主席。1928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37年7月被捕，同年10月29日被杀害。——校对者注

以后终于成立个决议，这恐怕是党史上仅有的一次：中央委员会一致决议焚毁列宁的一封信。这事情没有公开出来，那时我们是站在列宁的右边；你们知道，列宁并非每次都教人慎重和见机的，他能够向左跳跃，——而且错误……我们否决他的要求，因为我们以为夺取莫斯科和彼得格勒两地政权，并解散民主会议，固然毫无疑问可以成功的，但在俄国其他地方则我们的地位未能巩固。但我在民主会议中看见一幕小小的戏，很能够表示群众的精神状态。克伦斯基演说之后，托洛茨基上台发言。克伦斯基一伙人有好多水兵围绕着，那是克伦斯基调来保护会场防止布尔什维克什么攻击的。我看见托洛茨基说完了话，从演说台上下来，于是我们都到那些水兵群中去，他们挥动枪上刺刀问托洛茨基：‘使用这家伙的时候，是不是快到了。’临时政府的薄弱队伍已经给我们争取过来了。”

这是9月中旬，即暴动前六星期发生的事情。暴动发生于苏维埃第二次大会开幕之日，在彼得格勒的胜利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在莫斯科的，则颇艰苦。其他好多地方已经自发的暴动起来而且胜利了，譬如在喀山和在塔什干，那里的苏维埃和军队没有等待上头的训令。好久以来，喀琅施塔得和波罗的海舰队就已自由行动了。喀琅施塔得很受布尔什维克和无政府主义者影响；舰队则服从党的指挥。

安东诺夫-奥弗申柯^①，现在是苏联驻巴塞罗那的总领事，他曾以如下的话叙述攻占冬宫的情形：

“我坐着汽车驰向参谋部去。我们穿过百万街我们的岗位；冬宫周围零乱的枪声，好多军人投降过来了。黑暗。步枪与机关枪的声音。沿着街道，一群的海陆士兵和赤卫军奔赴宫门去，接着又退回来了，傍着墙边退，当一些躲在柴堆障碍物背后的志愿兵开枪时候。最后，大炮沉重地响了。响而又响。这是涅瓦河对岸彼得堡炮台在说话。‘不可以叫他们投降吗？’丘德诺夫斯基^②提议说，他刚率领巴甫洛夫团的人走来，他仍像平

^① 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大洛维奇·安东诺夫-奥弗申柯（Владими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Антонов-Овсенко，1883-1938），1883年生于乌克兰切尔尼夫夫，少年时期受激进思想影响。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属孟什维克。1905年革命期间曾领导波兰和克里米亚的起义。革命失败后被捕，被判处二十年苦役。1910年越狱后流亡法国。一战爆发后加入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期间参与彼得格勒武装起义，亲率赤卫队攻占了冬宫。内战期间在南俄和乌克兰等地指挥红军作战。1923年参加“左派反对派”，1927年开除党籍，1928年悔过。1936年任驻巴塞罗那总领事。1937年底被捕，1938年2月10日被杀害。——校对者注

^② 格里戈里·伊萨科维奇·丘德诺夫斯基（Григорий Исаакович Чудновский，1890-1918），1905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属孟什维克。1910年被捕并被流放，1913年逃到法国，之后逃到美国。一战期间，积极参加齐美尔瓦尔德运动。二月革命后，和托洛茨基一同返回俄国，加入“区联派”。十月革命期间参与彼得格勒武装起义，亲率赤卫队逮捕了临时

时那样勇敢而多话的。我答应了。大炮的声音是有效力的。娘子军投降了。她们啼哭着说：她们再不敢了！军官学校投降了。那些志愿兵把枪一束一束架在人行道上，走开去，有人护送他们。丘德诺夫斯基要还他们的枪，但我不肯。其他的志愿兵还抵抗了一个钟头。从一个狭隘的螺旋形楼梯攻击他们，是很困难的。他们好多次迫得群众后退。但他们终于屈服了，叫人告诉我们说他们不抵抗了。我同丘德诺夫斯基上楼去，到皇官居室之内。残余的障碍物，床垫、兵器、毛被、面包屑等，狼藉满地。一群异样装束的人跟在我们背后。我们攻进各层楼房，志愿兵投降了。我们忽然来到一个宽大的厅堂，一队青年人横着长枪守着一个门。他们迟疑了一会。我们走近临时政府这最后的卫队跟前去，我和丘德诺夫斯基；他们呆得同木鸡一样。我们很不忍心夺去他们手里的枪。‘临时政府在这里吗？’‘在这里，’一个志愿兵很结巴地说，接着低声告诉我：‘我是你们这方面的。’旧俄最后的资产阶级政府就在这里了。这十三个人，——因为克伦斯基早晨已经逃走了，为的去‘求救兵’，——围坐一张桌子，吓得面无人色。我们将他们逮捕起来。大家要当场把他们活剐了，但我们派一队人护送他们到彼得保罗要塞的监牢内去。”

距离几百公尺，停泊在涅瓦河中的巡洋舰阿芙乐尔号，上面有些革命党人正等待对冬宫开炮的命令，他们已经放过几响空炮了。

“我们正待发出最后的命令，这个命令一实行，那些‘民主的’总长和那冬宫都要没有命的。我们决定等待一刻钟，本能上觉得局势会改变的。果然不错。最后几分钟快过去了，忽然从冬宫那来了一个信差：‘冬宫已攻下来了！’我们快活了，这次是双重的快活，因为我们正要开炮，而这个不知名的水兵却是冬宫的救星，——当时没有想到问他的名字。

“我立刻和一个同志坐汽车到斯莫尔尼去。汽车是水兵们弄来给我们的。在此地经过的资本家和官僚乘坐的汽车，给他们扣下五辆来。

“彼得堡的街道，是平静而寂寥的，丝毫没有暴动的痕迹。一些革命的士兵在十字街道上烤火，他们并不留难来往的汽车。我们还看见灯光明亮的电车，装满了乘客。总而言之，没有一点革命的痕迹。在斯莫尔尼，大会代表们刚刚散会，初步讨论过苏维埃共和国政权机关，这个共和国是如奇迹般瞬息间造成的。一切都尘埃落定。我回到船上，倒头就睡了。

“第二天，我们决定洗清一点空气，并且把我们的革命刺刀展现给资产阶级杂种看

政府部长。国内战争期间，负责指挥乌克兰地区的战争。1917年12月被白军俘虏，判处死刑，基辅解放后被解救。1918年4月8日在与德军的作战中被包围，开枪自杀，壮烈牺牲。——校对者注

看。水兵巡逻队出发到中心区去，奉令解散密聚的群众。巡逻队确有平定奋昂空气的效力。他们常常带回来武器，如手枪、佩刀、步枪，以至于炸弹，作为缴获品；他们也捕得嫌疑分子：军官、醉汉、举止阔绰的资产阶级先生、冲锋队的士兵。我们非常宽厚地待遇他们：问了几句口供，就放走了。若是士兵，我们就劝他们快点穿起裙子来，这一切都是大声笑着做的。我们拿罐头给醉汉吃，然后就送他们在一间大房子睡觉。如此款待这类主顾，不久就传开了，我们的船上很快充满了醉汉。于是水兵们想出了另一种待遇方法，这在秋天是很难受的：即是将他们浸入河水中去，他们立刻苏醒了，而我们也很快摆脱了他们。”^①

雅克·萨杜尔在10月26日（即11月8日）写给法国国会议员阿尔伯特·托马斯的信，这样说：

“我的好友：——这是暴动的日子。今天早晨，我到大使馆去的时候，看见人家从莫伊卡河捞起图曼诺夫^②的尸首，他是陆军次长，昨夜士兵们逮捕了他，用刺刀戳死他。人家开玩笑，把他的尸首摆成滑稽的姿势，安置在一架矮车之上，送到无名待领的停尸所去。

“消息是有利于布尔什维克党人的。冬官先受炮击，后被劫掠了。一切艺术品、织毯、家具、图画等，都被残暴地捣毁了。保卫冬官的娘子军，成了俘虏，据说被人送到一个军营强奸去。其中好多是资产阶级少妇。临时政府大多数阁员都被捕了，克伦斯基在逃。军队落入于革命党人之手。”

萨杜尔这里说的抢劫冬宫的事情，不是真实的。无疑有些士兵未曾受到战败者应享的待遇。但一般说来，差不多没有什么过火的事情，同一信中又说：

“我又会见革命党的伟大领袖。我结识了列宁和托洛茨基。……早晨一点钟休息的时候，我和托洛茨基谈话许久，过几分钟他就要被选为部长——确切地说是外交人民委员。

“第一，我问他对于暴动的意见？”

^① 弗列洛夫斯基的回忆录。

^② 格奥尔基·尼古拉耶维奇·图曼诺夫（Георгий Николаевич Туманов，1880-1917），1880年出生于高加索捷列克州的贵族世家，毕业于第比利斯士官学校、康斯坦丁炮兵学院、尼古拉总参谋学院。一战期间，任职于总参谋部。1917年5月任陆军部副部长。同年10月25日被水兵逮捕后处死。——校对者注

“他说：‘每次革命都是有它的命运的，成败不能预料，但成功的可能性很多。暴动经过极细心的准备。组织普遍了全俄国境，成立了一千多个委员会，军队从此差不多全部运动过来了。农民群众将为大地主土地之没收所引诱。有这两种分子拥护，运动一定能成功的。只需一扫帚，便可扫除那些当权的庸人与懦夫。’”^①

在莫斯科，巷战持续了六天之久，发生了一些骇人的事情，譬如克里姆林宫兵工厂工人被那些“民主秩序”的捍卫者所屠杀。暴动发生之前日，穆拉洛夫^②就去研究暴动的技术问题，——这位农学家是布尔什维克党的一个杰出英雄。早在2月，他就带领几个士兵去占领公共机关了，旧都帝制政权就是这样塌台的。他写道：

“我在寻觅一本小册子，书名为《巷战策略》。那是我党在1905年出版的。但我找不到这书，我原先的在某次检查时遗失了。所以我只能凭记忆行事，并设法和认识的军官谈论这个问题。”

穆拉洛夫打仗好像一个魔鬼。当苏维埃战士觉得一切都完了的时候：

“……炮兵开来同我们的步兵联络了，我们又振作起来。我忘记了那时有几门炮，但我们的炮兵首领弗拉基米尔·斯米尔诺夫^③大概还记得的。”

于是我去查看斯米尔诺夫的著作，我找到了有一页极生动的描写，关于这件事情：

“当我走去通知那些士兵，说我们已受包围，而革命委员会要我们撤退时候（那是

^① 见萨杜尔的《布尔什维克革命笔记》第五七至五九页。

^②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穆拉洛夫（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Муралов，1877-1937），1899年参加马克思主义小组。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属布尔什维克。1905年参加莫斯科十二月武装起义。二月革命期间，组织莫斯科苏维埃士兵部。十月革命期间，任莫斯科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和革命司令部成员。1918年任莫斯科军区司令。1919年3月任第二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19年7月任东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1年3月任莫斯科军区司令。1924年5月任北高加索军区司令。1923年参加“左派反对派”。1927年被开除党籍，1928年被流放。1935年12月和1936年1月两次致信斯大林悔过，无果。1936年4月被捕，审讯中受到严刑拷打，但拒绝认罪。1937年2月1日被杀害。——校对者注

^③ 弗拉基米尔·米哈伊洛维奇·斯米尔诺夫（Владимир Михайлович Смирнов，1887-1937），190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属布尔什维克。二月革命后在莫斯科工作，负责编辑党报。十月革命期间，参与莫斯科武装起义。十月革命后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18年初为布哈林“左派共产主义”集团。国内战争期间，参加“军事反对派”集团，之后又参加“民主集中派”集团。1921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23年加入“左派反对派”。1926年被开除出党，不久悔过并恢复党籍。1927年12月再次被开除出党。1937年5月26日被杀害。——校对者注

在夜间，他们疲倦得要死，正在睡觉)，他们满不在乎地回答我说‘我们不走！’

“第二天，我们在一点上采取攻势，有相当成功，鼓起了我们的勇气；又第二天，我们的一队人占据了斯特拉斯特纳亚修道院的塔楼，那里本有志愿兵带着一架机关枪把守的。这天夜里，我奉令同两个同志到霍登卡炮兵旅去，携来二三门大炮，安了一门在斯特拉斯特纳亚广场上，为的轰击前总督的邸宅。只消几炮，就把一队学生军打得落花流水了。当他们被解往苏维埃去的时候，我们费了许多力气才说服护送的士兵勿把他们杀死。革命委员会于是决定发起总攻击，我奉命去请求第五十五兵团来增援。我们坐在一辆红十字会的车内，门窗都紧闭着。在路上，我们给士官生捕住了，押往亚历山大中学去。人家搜查我们。五十五团一个青年军官认出了我，一把抓住我的领口，嘴里喊道：这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应该立刻枪毙。我在那里过了一夜或两夜。后来有一天晚上轰了一响大炮，他们把我们大约八十至一百个俘虏放出来，由军官和学生护送到克里姆林官去。护送队长特鲁别茨科伊亲王叫士兵：‘俘虏若敢回头看，就尽管用刺刀戳进后背。’到了克里姆林官，军官们辱骂我们。其中一个喊道：‘我们不是给这些贱民杀死，就是杀死这些贱民！’我在五十六团军营过夜。晚上听到震耳的一声：我们的炮兵在麻雀山上轰击克里姆林官……第二天，人们又放我们出来，约有四十人；我们想一定是去枪毙的，但到了尼古拉塔楼门，人们就叫我们在步哨前面走过，出去了。在圣瓦西里教堂前面的赤卫队，举枪对我们瞄准，我们向他们大声喊：我们是红军。以后我就到区苏维埃去。人们要我休息一下。我跑回家去，我已有半个月没进家门了。我吃了饭，就到设在扎莫斯克沃雷奇耶的参谋部去……”

这事情距今有十九年了。穆拉洛夫和斯米尔诺夫都还活着，我写这几行字时，很感动地想着他们。^①这两个人在1927年都宣布拥护反对派而反对斯大林。这两个人都被开除了，被捕了。弗拉基米尔·斯米尔诺夫关了五年，刚放出牢狱到了流放地没有几天，又被捕了，又判五年徒刑，什么罪名呢？——没有公布。他在苏兹达尔监狱中差不多成了瞎子。他现在在哪里呢？尼古拉·穆拉洛夫做了莫斯科军区司令好久。人们把他充军到塔拉森林里去。在流放地，他重操农学家旧业，差不多八年之久；最近人家又把他逮捕起来了，被控参与某个离奇阴谋，犯有什么叛国、阴谋、勾结希特勒等大罪名，他一定是逃不出刽子手之手的了。

^① 本书出版之后一个月，即1937年2月，穆拉洛夫被斯大林枪毙了。那一案十七人中，他是唯一未写悔过书的。斯米尔诺夫仍不知下落。与季诺维也夫同时被杀的伊万·斯米尔诺夫是另一个人。——译者按

伟大的几年

伟大的几年便从此开始了。我这里且不描写胜败交替悲喜互变的种种情形。我只限于勾勒几个关键节点和整体轮廓就够了。夺取政权之翌日，政府各部都是空无一人的；公务员、专家、企业经理、老板和资本家们，发现了一种为自己利益的罢工——怠工。工人组成的赤卫队，背着枪，到各部重要的公务员家里寻人，把他们关了好几个，其余的也就情愿去办公了……这个斗争，最初几个月却没有什过火，也没有什恐怖。彼得格勒及其近郊，酝酿一个反革命阴谋，但很容易就被托洛茨基破获了，上校穆拉维约夫^①协助他，——穆拉维约夫后来也因叛变被杀了。差不多没有逮捕一个人，已逮捕的不久也放走了，譬如哥萨克骑兵队长克拉斯诺夫^②和反犹太人运动领袖普里什克维奇^③，——克拉斯诺夫就利用这个机会到顿河区域去开启国内战争。列宁和他的政府同僚，并未准备将大生产全部收归国有，而是要实行一种很切实的工人监督，并逐步扩大社会主义国家在混合托拉斯中的参与，同时为资本家保留一个位置。

第一个待决的问题，就是战争问题。士兵们是不要战争的。“他们举起脚来表决，他们走开了。”列宁嘲笑同那些要他继续战争——不错，这次是革命的战争——的人这样说。苏维埃提议全面和平，但唯有中欧的帝

^① 米哈伊尔·阿尔特米耶维奇·穆拉维约夫（Михаил Артемьевич Муравьев, 1880-1918），1907年加入社会革命党。1917年加入左派社会革命党。十月革命期间任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彼得格勒军区总司令。国内战争期间曾任东线司令、南部战线参谋长。1918年7月在辛比尔斯克发动叛乱，不久即被击毙。——校对者注

^② 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克拉斯诺夫（Пётр Николаевич Краснов, 1869-1947），1869年出生于圣彼得堡哥萨克贵族家庭，毕业于巴甫洛夫斯克军事学校。十月革命期间，受克伦斯基命令率军进攻彼得格勒，试图夺回政权，失败被俘。获释后逃往顿河地区，于1918年5月担任顿河哥萨克军政府首领，建立反布尔什维克政权。1919年被红军粉碎后，逃亡国外，从事境外反苏活动。二战期间协助德国纳粹政权组建哥萨克志愿部队，任德国哥萨克部队总司令。1945年5月在奥地利向英军投降，之后移交苏联。1947年1月以“叛国罪”被处决。——校对者注

^③ 弗拉基米尔·米特罗法诺维奇·普里什克维奇（Владимир Митрофанович Пуришкевич, 1870-1920），1870年出生于比萨拉比亚省的贵族家庭，毕业于敖德萨大学历史系，后进入政府任职。参与组建“俄罗斯人民联盟”，组织针对犹太人、革命者的迫害活动。1905-1917年担任国家杜马议员，为“黑色百人团”主要领袖。1915年因党内分歧退出“俄罗斯人民联盟”，自建“大天使米哈伊尔联盟”。1916年12月参与谋杀拉斯普京的宫廷阴谋，被流放至前线。二月革命后激烈反对临时政府，试图组织保皇派抵抗，未果。十月革命后被捕，获释后逃往南方加入邓尼金白卫军，勾结外国武装干涉者，反对苏维埃政权。1920年因斑疹伤寒暴卒于新罗西斯克。——校对者注

国答应谈判。杜鹤宁^①司令拒绝向敌国提议停战，然后被水兵活活打死了（从此之后，“送你到杜鹤宁司令部去”成了一种流行的说法，意思是送你去见阎王……）。中欧诸国原则上答应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但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会中，切尔宁伯爵^②、冯·库尔曼^③和霍夫曼将军^④，竟强迫托洛茨基和越飞^⑤答应割让广大的领土，美其名曰“解放”。于是他们退出谈判，并向各国人民发出呼吁。苏维埃停止了战争，同时拒绝签署这个屈辱的条约。托洛茨基就是主张这一解决方法的，为着试探德国革命的可能性；他判断敌国从社会基础上已无力对俄国革命发动进攻了。他的想法错了。奥地利确是如此，但威廉二世^⑥一味蛮干。在德国进兵之下，列宁建议中央委员会签署另一更苛刻的条约，因此牺牲了芬兰和乌克兰的革命。他说：“让去一点地盘，为的多赢一点时间。”索柯里尼柯夫^⑦，中央

^①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杜鹤宁（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Духонин，1876-1917），1876年生于斯摩棱斯克省的贵族军官家庭，毕业于沙俄总参军事学院。1914年任西南方面军作战处长。1916年任西方面军参谋长。二月革命后支持临时政府，被任命为西南方面军参谋长。1917年9月任总参谋长，11月在克伦斯基逃走，被任命为最高总司令。十月革命期间拒绝执行人民委员会命令，被解除职务并被捕。在押解过程中，被愤怒的水兵拖出车厢打死。——校对者注

^② 奥托卡尔·冯·切尔宁伯爵（Ottokar Graf Czernin，1872-1932），1872年生于奥地利贵族家庭。1895年任职于奥匈外交部，曾任驻英、德、罗等国使节。1916年12月任奥匈外交大臣，作为奥匈代表参加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谈。1918年4月因西克斯塔塔信件事件辞职，退出政坛。1932年死于维也纳。——校对者注

^③ 里夏德·冯·库尔曼（Richard von Kühlmann，1873-1948），1873年生于奥斯曼帝国君士坦丁堡。1899年任职于德国外交部，曾任驻英、荷、奥斯曼等国使节。1917年8月任德国外交大臣，作为德方首席谈判代表参加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谈。1918年因发表反对德国军方言论被解职，退出政坛。1948年死于加尔米施-帕滕基兴。——校对者注

^④ 马克斯·霍夫曼（Max Hoffmann，1869-1927），1869年生于普鲁士霍姆堡，1898年毕业于普鲁士军事学院。一战爆发时任德军第八集团军副参谋长，1916年任东线德军总参谋长，作为德国代表参加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谈。战后退役。1927年死于巴特赖兴哈尔。——校对者注

^⑤ 阿道夫·阿布拉莫维奇·越飞（Адольф Абрамович Иоффе，1883-1927），1903年参加社会民主党，积极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6年5月流亡德国。1912年回国后被捕，流放西伯利亚。二月革命爆发后返回彼得格勒，8月同“区联派”一起转入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期间任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参与彼得格勒武装起义。1918年作为苏俄代表出席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谈。1923年参加“左派反对派”。1927年因病情加重且不堪忍受迫害而自杀。——校对者注

^⑥ 威廉二世（Wilhelm II von Deutschland，1859-1941），德意志帝国末代皇帝，1888年6月15日-1918年11月在位。——校对者注

^⑦ 格里戈里·雅科夫列维奇·索柯里尼柯夫（Григорий Яковлевич Сокольников，1888-1939），1888年生于波兰罗兹的犹太医生家庭。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参与莫斯科十二月武装起义，后多次被捕流放。1909年逃亡海外，结识列宁。1917年回国，任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参与彼得格勒武装起义。国内战争期间，先后担任第八集团军司令员、突厥斯坦方面军司令员等职。1923年7月任财政人民委员，组织执行新经济政策。1924年参加“新反对派”，1926年垮台，先后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石油辛迪加主席、第一副林业人民委员等职。1936年7月被开除党籍并逮捕，判处十年徒刑。1939年5月21日在狱中被谋杀。——校对者注

委员，连看都懒得看，就签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

协约国认为这一单独媾和是“卖友”，虽然列宁和托洛茨基曾表示愿意接受英法的援助以保卫这新生的共和国。“接受帝国主义强盗的武器”，列宁在一张纸头上潦草地写道。在俄国内部，中产阶级强烈的民族感情也受了刺激，给国内战争以滋养料。国内战争爆发于南方，在那里组织了一些小规模民族军，称为“白卫军”，它们汇集在反革命的旗帜之下；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经过伏尔加区域向西伯利亚撤退，这事也给协约国利用去，协同社会革命党来推翻苏维埃。在各大城市中，军官们的阴谋接踵而起。某次白党暴动，曾有一个时候占据了雅罗斯拉夫尔。1918年夏季，是很可怕的。饥荒、彼得格勒的霍乱、阴谋、暗杀、参加政权的社会革命党人的暴动。芬妮·卡普兰^①在某次工厂会议散会出来的时候，射了几枪在列宁胸膛内（列宁坚持不要枪毙她；虽然对外宣布她已枪毙了，但我有理由相信她并未曾枪毙，以后好多年她还活着）。于是宣告实行红色恐怖了；这一部分也是人民委员会方面推动，以合法化和控制各地自发的恐怖行为。把反革命者作为人质，军官、资产阶级分子，杀了好几百人。俄国革命也有它的“九月天”^②，它的富基耶-坦维尔^③，它的卡里耶^④，它的约瑟夫·列邦^⑤，尤其是它的富歇^⑥，——而富歇们的前途尤其光明^⑦。相距一

^① 芬妮·叶菲莫夫娜·卡普兰（Фани Ефимовна Каплан，1890-1918），1905年革命期间加入了无政府主义派，后被流放。流放期间加入社会革命党，二月革命后获释。1918年因反对十月革命及布列斯特和约，遂于8月30日刺杀列宁，当场被捕。同年9月3日被秘密处决。——校对者注

^② 指法国九月屠杀事件。1792年9月，在外国及保王党军队的威胁下，巴黎市民认为保王党囚犯将里应外合，于是自发对监狱内的保王党囚犯展开屠杀，被处决者包括教士、贵族、瑞士卫队战俘以及妓女、小偷等。——校对者注

^③ 安托万·康坦·富基耶-坦维尔（Antoine Quentin Fouquier-Tinville，1747-1795），1793年3月担任巴黎革命法庭的首席检察官，负责起诉吉伦特派、丹东派、埃贝尔派等各派系人物，曾主导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审判。热月政变后被捕，1795年5月被处决。——校对者注

^④ 让-巴蒂斯特·卡里耶（Jean-Baptiste Carrier，1756-1794），1790年参加雅各宾和科德利埃俱乐部。1792年当选为国民公会代表。1793年8月任公共安全委员会布列塔尼特派员，10月任南特派员。期间组建革命委员会系统化处决反革命分子，并将反革命分子沉于卢瓦尔河，史称“南特派刑”。热月政变后被捕，1794年12月被处决。——校对者注

^⑤ 约瑟夫·列邦（Joseph Lebon，1765-1795），1792年当选为阿拉斯市长和国民公会代表，曾设立特别法庭，处决数百人。热月政变后被捕，1795年10月被处决。——校对者注

^⑥ 约瑟夫·富歇（Joseph Fouché，1759-1820），1792年当选为国民公会代表。1793年任公共安全委员会里昂特派员，组织对保王党囚犯的大规模处决。1794年参与热月反动，推翻雅各宾政权。1799年后投靠拿破仑，担任警务大臣。1815年拿破仑下台后，投靠波旁王朝，不久以“弑君罪”被逐出法国。1820年死于里雅斯特。——校对者注

百二十五年，在不同的两个国家内，同样的历史状况发生同样的影响，并产生出同样的效果，这就是：将革命的一切精力集中在一条近于无望的出路上。

初期的红色队伍时常遇敌即败，喀山失守了，那是伏尔加河的锁钥。托洛茨基、伊万·斯米尔诺夫^①，还有一队战士乘坐专列，正当这大失败之时赶到。他们仅带着专列的人单独在斯维亚日斯克打了一仗，取得了一个决定性的胜利。第二天，托洛茨基亲乘炮艇攻克喀山港，在那里把白军小舰队一把火烧掉了。

命运转过来了。军心振奋起来了。托洛茨基签发了如下命令：

“工农红军士兵并非流氓，也不是懦夫。他们要为劳动民众的自由和幸福而奋斗。

倘若他们放弃阵地或战斗不力，那就是指挥员和政委之过错。

“我宣布：如果一支部队放弃了阵地，就先枪毙政委，后枪毙指挥官。

“勇敢的士兵，将论功行赏，而升为指挥官。

“那些懦夫，那些叛徒，那些投机分子，是逃不了我的子弹的——我以红军的名义对此负责。”

好多革命者反对用这种方式行事和说话，列宁却是非常赞成的。无论如何，失败的狂潮停止了，喀山夺回来了；红军从一无所有中成立起来，一天比一天强大，几乎是每战必胜，不论西方强国怎样在技术上帮助白军。

旧日的有产阶级，由于发动国内战争，而丧失一切：因为斗争自有其逻辑的。城市因为饥荒，不得不实行限制食粮和向农村征粮，因而激起农民反抗。经济渐渐成为应付战争之需要了，大生产收归国有终于扩大为一切生产收归国有了。有些企业领袖自己要求收归国有，否则就无法生存。

^① 这些都是法兰西大革命的故事。——译者按

^① 伊万·尼基季奇·斯米尔诺夫（Иван Никитич Смирнов，1881-1936），1881年生于俄国农民家庭，早年参与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899年参加革命工作，1899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属布尔什维克。先后六次被捕，两次流放，在狱中总共关押了约六年。二月革命后，组织托木斯克士兵代表苏维埃。国内战争期间，先后担任第五集团军、东部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等职，参与了剿灭高尔察克的战斗。1919年8月任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1921年12月任中央西北局书记、彼得格勒省党委书记。1922年9月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23年参加“左派反对派”。1927年12月被开除出党。1928年被判流放。1929年悔过。1931年7月利用出差机会，恢复了同托洛茨基的联系，商议成立广泛的地下左派反对派组织。1933年1月再次被捕。1936年8月25日被杀害。——校对者注

1919年秋季，海军上将高尔察克^①的白军统治了西伯利亚；乌克兰成立“最高政府”，由邓尼金将军^②指挥着，准备进攻莫斯科；在北方，借助英国军队的支持，也成立了一个略带社会主义色彩的政府，以老柴可夫斯基^③为主席，他是最初反对帝制的老战士；尤登尼奇将军^④准备占领彼得格勒，在那里人们饿死在街上，在那里倒毙的马匹堆积在大歌剧院门口……苏维埃只剩有莫斯科区了，而那里也是岌岌可危的。

但是，一个月后，奇迹发生了。尤登尼奇就在彼得格勒城下战败了，那是托洛茨基亲自来防守的。邓尼金在奥廖尔北边吃了一个败仗，完结了他的统治；他的军队背后受窘于马赫诺^⑤的黑军，于是土崩瓦解了，最后在新罗西斯克仓皇上船逃命。伊万·斯米尔诺夫领导的一支红军，在乌拉尔山打退了白军，同时红色游击队也在广大的西伯利亚进行无情的运动战。再过几个月，海军上将高尔察克也被顾全自己性命的协约国军官交出来，一天夜里，月光下，在伊尔库茨克郊外被枪决，同死的还有他的一个泪流满面的部长。人们在安加拉河冰上戳一个洞，将他们的尸首丢下去。

1920年，英国兵从阿尔汉格尔斯克撤退了，法国兵前一年也从敦德

^① 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高尔察克（Алекса́ндр Васи́льевич Колча́к，1874-1920），1874年生于圣彼得堡贵族家庭，毕业于海军武备学校。一战期间先后任波罗的海舰队水雷总队队长、黑海舰队司令。二月革命后，流亡出国。十月革命后，回国出任“西伯利亚政府”陆海军部部长，随即发动政变，建立军事独裁政权，自封为“全俄最高执政”。1919年底红军反攻，白军节节败退。1920年1月被捷克军团逮捕移交红军，2月7日被处决。——校对者注

^② 安东·伊万诺维奇·邓尼金（Антон Иванович Деникин，1872-1947），1872年生于波兰华沙，毕业于基辅步兵士官学校和总参学院。二月革命后，任临时政府最高统帅参谋长、西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司令，科尔尼洛夫叛乱后被捕。十月革命后，越狱逃往俄国南部，在北高加索地区组织白卫军活动。1918年在协约国扶持下担任“南俄武装力量”总司令，率领白卫军由南北上，但被红军与黑军联合击溃。之后率部退入克里米亚，被迫将指挥权交给弗兰格尔。1920年底流亡英国，后定居法国。1947年死于美国密歇根。——校对者注

^③ 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柴可夫斯基（Николай Васи́льевич Чайковский，1850-1926），1850年生于维亚特卡省的贵族家庭。1869年参加民粹派运动，加入“柴可夫斯基小组”。1874年流亡出国。1904年加入社会革命党。二月革命后，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委员，支持临时政府。组建“拯救祖国与革命委员会”，反对十月革命。1918年成立“北方临时政府”，任主席，获英法干涉军支持。白军瓦解后流亡西欧，继续从事反苏活动。1926年死于伦敦。——校对者注

^④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尤登尼奇（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 Юденич，1862-1933），1862年生于莫斯科的军事贵族家庭，毕业于亚历山大军事学院、总参学院。一战期间，任高加索方面军总司令。二月革命后被解职。十月革命后，出任白卫军西北集团军司令，两次率部进犯彼得格勒。同年11月被红军击溃，其残部退到爱沙尼亚后被解除武装。1920年流亡英国。1933年死于法国尼斯。——校对者注

^⑤ 涅斯托尔·伊万诺维奇·马赫诺（Нестор Ива́нович Махно́，1888-1934），1888年生于乌克兰赫松的农民家庭。早年参加无政府共产主义者团体，参与袭击地主和官员。二月革命后，返回家乡组建农民武装。国内战争期间曾指挥黑军协同红军抵抗白军。1921年黑军被红军粉碎后，流亡国外。1934年因肺结核死于巴黎。——校对者注

萨撤退了；一个革命委员会，以伊万·斯米尔诺夫为主席，组织苏维埃西伯利亚；“契卡”——即“非常委员会”，施行恐怖的机关——的首领捷尔任斯基^①提议废除死刑，获得通过，恰在此时，旧日波兰社会党的恐怖主义者约瑟·毕苏斯基^②，认为用他的军队占领基辅的时机到了。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将要开会的时候，波兰人攻占了基辅。不过那时红军差不多有二百万人。俄国正盼望着和平。在这侵略之前，民族情绪如此强烈，以至旧俄的将军如波利瓦诺夫^③和布鲁西洛夫^④也号召旧军官们拿起武器来。托洛茨基的专列在前方奔驰。波兰人被逐出基辅，退回本国了。列宁立刻制定出一个进攻华沙的计划，要使波兰苏维埃化，以此来撕毁《凡尔赛条约》，他不久之前才攻击这和约要产生不祥后果的。一个波兰革命委员会成立了，有马尔赫列夫斯基^⑤和捷尔任斯基参加，图哈切夫斯基^⑥和斯米尔加^⑦率领第六军向华沙突进，不管托洛茨基如何反对，——托洛茨基认

^① 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Фёликс Эдмундович Дзержинский，1877-1926），1877年生于波兰维尔纳省的破落小贵族家庭。1899年参加波兰王国与立陶宛社会民主工党。曾多次被捕，1912年被捕后一直被关押到二月革命才获释。获释后积极参加布尔什维克活动，并参与了彼得格勒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1917年12月担任肃反委员会主席。1921年任交通人民委员。1924年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26年7月因突发心脏病逝世。——校对者注

^② 约瑟·克莱门斯·毕苏斯基（Józef Klemens Piłsudski，1867-1935），1867年生于立陶宛扎乌莱的贵族家庭。早年参加革命运动。1887年因间谍谋杀沙皇被捕，被判流放。一战期间组建波兰军团，依附奥匈帝国对抗沙俄。波兰独立后任国家元首，1923年下野。1926年5月发动军事政变，建立军事独裁。1935年死于肝癌。——校对者注

^③ 阿列克谢·安德烈耶维奇·波利瓦诺夫（Алексей Андреевич Поливанов，1855-1920），1855年生于卡卢加的贵族家庭，毕业于尼古拉总参学院。1905年担任总参谋长。1915年6月担任陆军大臣，意图挽救俄军溃败局面，最后被解职。二月革命后，被临时政府任命为军事委员会顾问。1920年2月参加红军，协助托洛茨基进行军队整编和训练、组建红军参谋体系。1920年任军事立法委员会主席，同年9月死于伤寒。——校对者注

^④ 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布鲁西洛夫（Алексей Алексеевич Брусилов，1853-1926），1853年生于第比利斯的贵族军官家庭，毕业于骑兵军官学校。1916年任西南方面军司令，发动“布鲁西洛夫攻势”，大获成功。二月革命后，支持临时政府继续战争，担任俄军最高总司令，发动“克伦斯基攻势”遭到惨败，被解职。在其子被白军杀害后，于1920年参加红军，任骑兵总监。1924年退役，任革命军事委员会特别顾问。1926年3月病逝于莫斯科。——校对者注

^⑤ 尤里安·巴尔塔扎·约瑟夫·马尔赫列夫斯基（Julian Baltazar Józef Marchlewski，1866-1925），1866年生于波兰弗沃茨瓦韦克的知识分子家庭。1892年参与组建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1907年被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候补中央委员。1920年任波兰临时革命委员会主席。1922年任国际赤色援助会主席。1925年3月因心脏病于意大利内尔维逝世。——校对者注

^⑥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图哈切夫斯基（Михаил Николаевич Тухачевский，1893-1937），1893年生于斯摩棱斯克省的贵族家庭，毕业于亚历山大军事学院。1914年7月被派往前线，因作战勇敢六次受奖。1915年被德军俘虏，1917年逃脱。国内战争爆发后参加红军，因军事才能被托洛茨基破格提拔，先后被派往东线、南线、西线指挥，战功赫赫。国内战争后，历任红军军事学院院长、西部军区司令、总参谋长、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装备部长、副国防人民委员等职，推动红军现代化，构建大纵深作战理论。1937年5月被捕。1937年6月11日被杀害。——校对者注

^⑦ 伊万·杰尼索维奇·斯米尔加（Иван Тенисович Смилга，1892-1937），1892年生于拉脱维亚库尔的农民家庭。190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属布尔什维克。1915年被捕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二月革命后获释，当选为中央委员。

为这个大规模的作战是过于冒险了。波兰的工人和农民没有起来，这又再次证明：革命是无法用刺刀输出的。毕苏斯基得到魏刚的赞助，在华沙打了一个胜仗。俄国失掉了一个与德国相邻的疆界，德国也失掉了一个革命的机运。

这几次大规模的努力，将国内紧张局势推向顶点。整个体系都建立在党的纪律下、城市的计划配给和农村的征粮之上。1920年底和1921年初，农民的暴动使人觉得征粮的恶影响。最严重的，是坦波夫区的农民暴动，农民军达到八万人，受旧日小学教员名叫安东诺夫^①的指挥。在乌克兰，马赫诺围着古利艾波列地区建立一个无政府主义政权。布尔什维克党内的反对派倾向大大增长起来，不满意于党的中央集权制。喀琅施塔得的水兵们也起来暴动了。

以上种种事变，我是很接近地经历着的。我认为，毫无疑问，及时采取一些办法可以容易补救许多的恶现象。喀琅施塔得事件也比较容易调解，容易免除革命内部无必要的屠杀。当前的危险使得中央委员会铁面无情，而这危险，老实说，是足以致死命的。俄国精疲力竭了，若是失败，将没有力量再起革命。人们看得很清楚，随着喀琅施塔得水兵们走来的，将是一些完全不同的人物，将是一些农民暴动的领导者。1921年3月用大炮解决了喀琅施塔得事件之后，列宁明白了应当改变道路，于是提议实行新经济政策。征粮停止了，谷物可以自由买卖了，向外国资本家让步了，小商业、手工业甚至私人小企业也容许存在了。

不到一年之后，国家没有了战事，脱离了饥荒，愈合了创伤，又以满怀信心的眼光望向未来了。

1917年任芬兰陆海军工人执行委员会主席，芬兰革命失败后回国。1919年任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指挥土耳其斯坦战线。1923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23年参加“左派反对派”，1927年被开除党籍。1928年被流放。1930年悔过。1934年再次被开除出党。1935年1月被捕并被判处十年徒刑。1938年春被押解回莫斯科，遭受严刑拷打而拒绝认罪，于同年3月12日被杀害。——校对者注

^① 亚历山大·斯捷潘诺维奇·安东诺夫（Александр Степанович Антонов，1889-1922），1889年生于坦波夫的农民家庭。早年参加社会革命党，1909年2月因参与掠夺行动，被判处二十年徒刑。二月革命后获释，返回坦波夫，成为当地社会革命党领导人。1918年参加左派社会革命党。1919年联合邓尼金白军，组织农民游击队发动叛乱，并攻占坦波夫。1921年5月图哈切夫斯基奉列宁命令担任军事总司令，负责清剿安东诺夫农民游击队。1922年6月被红军击毙。——校对者注

第三国际

1919年，共产国际在莫斯科成立。两个法国人参加它的第一次会议，一个以通敌罪被判了死刑的，另一个正待被判死刑：亨利·吉尔波和雅克·萨杜尔。德国人埃贝莱因^①，奉斯巴达克党的命令来此要求延期成立国际，因为罗莎·卢森堡和他的朋友们认为时机尚未成熟（此时罗莎刚在柏林与卡尔·李卜克内西同时被杀害了）。一个土耳其人苏布希^②代表他的国家，——不久之后，凯末尔派就把他谋杀了……

如今，我是初成立的共产国际早期行政人员中，唯一幸存的。季诺维也夫从彼得格勒第二区调我来国际办事，我本在第二区担任几种职务。那天晚上，听过我讲课的民兵护送我穿过那漆黑的街道，为着免得人家抢去我身上带的一磅黑面包。我在斯莫尔尼学院一间空阔的居室内，遇见一个清瘦的高个子，看不出多大年纪，身上穿一件褪色的士兵短衫；——我则偶然穿着一套很漂亮的奥地利军官制服：那时衣服是很不易得的。他有一个高额头，戴着眼镜，有点苦行僧的情态，极端严肃之中又含有点笑意。他自己介绍说：

“弗拉基米尔·马津（利希滕施塔特）^③，老牌最高纲领派，在施吕瑟尔堡的牢里蹲了十年。你呢？”

^① 马克斯·阿尔伯特·胡戈·埃贝莱因（Max Albert Hugo Eberlein, 1887-1941），1906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一战期间，积极参加齐美尔瓦尔德运动，参与组建独立社会民主党和斯巴达克联盟。1918年11月参与组建德国共产党。1919年1月参与柏林工人武装起义，失败后流亡苏联，出席共产国际一大。1928年因支持布兰德勒而被开除出德共政治局与中央委员会。1933年流亡法国，致力于人民阵线政策，1935年被当局驱逐出境，避往苏联。1937年7月被捕，1939年被判刑15年，1941年10月16日被杀害。——校对者注

^② 穆斯塔法·苏布希（Mustafa Subhi, 1883-1921），早年曾参与青年土耳其党活动，1911年与该党高层产生分歧，1914年被迫逃往克里米亚。一战爆发后，被俄当局逮捕。在被囚禁期间，接触到了布尔什维主义思想，转变为共产主义者。十月革命后，组织克里米亚鞑靼人及土耳其人参加红军。1918年7月发起召集第一次土耳其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同年11月发起召集第一次穆斯林共产主义者代表大会。1919年3月出席共产国际一大。1920年9月10日在巴库组建土耳其共产党，任中央委员会主席。1921年1月被凯末尔当局暗杀。——校对者注

^③ 弗拉基米尔·奥西波维奇·利希滕施塔特（Владимир Осипович Лихтенштадт, 1882-1919），早年参加民意党。1905年参加社会革命党，负责制造炸弹。1906年参与爆破斯托雷平别墅及弗纳尼巷掠夺事件，同年10月被捕，判处徒刑，后改判为无期徒刑。二月革命后获释，加入孟什维克党。十月革命后，参加共产国际工作，编辑《共产国际》月刊。1919年6月加入布尔什维克党，8月参加红军，任第七军第六师政委。1919年10月15日在彼得格勒保卫战中牺牲。——校对者注

“在三个国家过了十三年战士生活，五年徒刑，十九个月监禁，等等……。”

这意味着我们可以一起工作。我们是当权的；而在最近的暴风雨后新生的那些“革命家”，此时已填满了办公室，他们会在下次暴风雨出现时转而反对我们。他们每人都索要一份权力，一份特殊的口粮、鲑鱼和烟草，一有机会便坐汽车。我们的“资历对照”，可见并不是多余的。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此时不过名义上存在罢了。季诺维也夫包办了一切，有时请教列宁，但更多是与拉狄克、布哈林商议，他们两人偶尔现身我们的办公室。我和马津两人身兼数职：是顾问，是差遣，是秘书，是编辑，是印刷工，是组织者，是指导者，又是其他许多“委员会成员”，等等。有些场景荒诞悲凉，譬如有一次季诺维也夫叫我到他家去（我们的住处相离很近，是由同一挺机关枪所防卫的），很迅速地对我说：

“英国兵大概明天要登陆，我们也许会完蛋，但仍须做点工作。你懂得英文，请你给我起草几张传单……”

“但是，格里戈里·叶夫谢耶维奇，我的英文并不好……”

“啊？不幸得很，——但是没有关系。就你所知道的写去就好。有个英国人关在‘契卡’牢内，我为了他麻烦得要死，我们可以叫他来帮你润色……。”

马津是一位道德崇高、才智超群的人，是我一生遇见的最完美的人中之一。1906年炸毁斯托雷平^①别墅那批恐怖分子中，他是最后的幸存者；革命把他从施吕瑟尔堡的苦役中解放出来，他在那里与奥尔忠尼启则^②同室居住。他今天安息于列宁格勒练兵场的大花岗石之下——他为保卫这座

^① 彼得·阿尔卡季耶维奇·斯托雷平（Пётр Аркадьевич Столыпин，1862-1911），1906年任俄国首相兼内政部长。任内大肆镇压革命活动，于1907年发动“六三政变”，解散第二届国家杜马，开始了“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同时开展土地改革，推行土地私有制。1911年9月被暗杀。——校对者注

^② 格里戈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奥尔忠尼启则（Григорий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Орджоникидзе，1886-1937），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外高加索地区从事革命活动，数次逮捕和流放。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十月革命期间，参与彼得格勒武装起义。国内战争期间，任俄共高加索地区主席。1922年因推行“自治化计划”表现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受到病中的列宁怒斥。1926年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工农检察院人民委员。1930年11月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重工业人民委员。对“镇压”持否定态度。1937年2月17日自杀身亡。——校对者注

城市而牺牲了。他对我说过：“我们既已掌握他人生死大权，就必须以身作则。”他确实践行了誓言。在牢里，他曾写了一本关于歌德的巨著。

共产国际初期充满了勇敢的亲爱的精神。人们生活在无限的希望中。革命的浪潮在全欧洲怒吼着。曼努伊尔斯基^①从法国回来，他并不明白他在那里所见的，他对我们说：复员就是表示革命开始了，——他拿某场示威运动作证据，这场运动确是他在法国所见的最盛大的。里德尔（他已经死了，我可以说出他的名字），从意大利归来，则没有那般乐观；他说：在意大利，革命只存在于灵与物中，但没有找到人。唯有一个人敢断定革命是可能的，就是无政府主义者马拉泰斯塔^②。社会主义者害怕革命。墨索里尼和他的一伙，则愿为革命服务，可以接受他们吗？萨布林^③——后来在保加利亚牺牲了——则很有把握地说：“我们什么时候愿意，就什么时候取得政权！”在慕尼黑，在布达佩斯，苏维埃取得了政权。贝特尔海姆博士^④想在维也纳做一个冒险，但人们赶紧阻拦了他。

死者也和生者夹杂在一起。列维涅^⑤在慕尼黑被杀害了。蒂博尔·萨穆利^⑥，我们刚在莫斯科听了他的演说，也在逃出匈牙利的时候自杀了；红

^① 德米特里·扎哈洛维奇·曼努伊尔斯基（Дмитрий Захарович Мануйльский，1883-1959），1883年出生于乌克兰波尔塔瓦。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属孟什维克。1906年被捕，1907年流亡国外。1917年5月回国，参加“区联派”。1920年任乌克兰苏维埃农业人民委员、乌共中央委员会书记。1928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书记处书记。1944年任乌克兰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兼外交部长，此后任苏联驻联合国代表。1959年2月病逝于莫斯科。——校对者注

^② 埃里科·马拉泰斯塔（Errico Malatesta，1853-1932），1853年出生于意大利南部坎帕尼亚。14岁因抗议君主制被捕，开启革命生涯。1871年后，受巴枯宁直接影响，彻底转向无政府主义。1887年参与组织贝内文托起义。1881年参与伦敦无政府主义国际。一生多次被捕，坚强不屈。1932年7月因支气管炎病逝。——校对者注

^③ 尼古拉·萨布林（Николай Шаблин，1881-1925），一战期间加入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紧密派）。1919年参与创立保加利亚共产党。1920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兼南方局委员。1923年任保共中央机关报《工人事业报》编辑。1925年初被捕，4月18日英勇就义。——校对者注

^④ 贝特尔海姆·埃尔诺（Bettelheim Ernő，1889-1959），1905年加入匈牙利社会民主党。1919年5月冒充第三国际特派员赴维也纳，指挥奥地利共产党仓促发动起义，遭到惨烈失败，受到共产国际的怒斥。1927年前往苏联，在共产国际出版社担任翻译工作。1948年返回匈牙利。1959年在布达佩斯去世。——校对者注

^⑤ 欧根·列维涅（Eugen Leviné，1883-1919），1883年出生于俄国圣彼得堡。1905年参与俄国革命，先后两次被捕，后逃回德国。1914年应征入伍，后参加独立社民党。1918年参与组建斯巴达克斯同盟，负责莱茵兰地区的组织工作。1919年4月领导巴伐利亚苏维埃政权，巴伐利亚苏维埃被颠覆后被捕，同年7月5日在狱中就义。——校对者注

^⑥ 蒂博尔·萨穆利（Tibor Szamuely，1890-1919），1913年加入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属党内左翼。一战期间应征入伍，后被俘虏，在囚禁期间接触并接受布尔什维主义。十月革命后，同库恩·贝拉一起在匈牙利战停中组建共产主义团体。1918年参与组建斯巴达克斯同盟。1919年3月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任军事人民委员，推行“红色恐怖”反击干涉军和白卫军。1919年8月匈牙利苏维埃被颠覆后试图流亡奥地利，在被边防军被捕前开枪自杀。——校对者注

色匈牙利，不仅是失败，而且受了老克里孟梭的欺骗，他说服了库恩·贝拉^①停止一个有胜利把握的总攻击……科尔文^②被绞死在布达佩斯。穆纳^③从捷克斯洛伐克来，说那里一切都要爆炸了。库恩·贝拉从维也纳来，然后到克里米亚主持了一场大屠杀，这是俄国革命中最残酷的和最无谓的屠杀；他被列宁在一次会议中连骂了二十声“蠢才”，为着他在柏林暴动中的无能企图……芬兰人拉希亚^④秘密地越过国境来来往往，不久之后他就给自己党内同志枪毙了。美国人约翰·里德，体格健壮，性格开朗，刚从芬兰监狱中放出来……他1920年死在莫斯科。

以后胜利了，跟着就大大地发展，我的意思是说：共产国际大走红运了，好多人奔赴于它，觉得它成了一种势力。俄国人于是当心防止政客、投机家和冒险家混进来，遂有加入国际二十一条之规定；为此条件，法国社会党在图尔大会上分裂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在哈雷大会上分裂了，意大利社会党在利沃诺大会分裂了。人们看见，出现在克里姆林宫的，革命者之中夹杂有政治家与政客。昨日还高呼神圣爱国的马赛尔·加香^⑤——

^① 库恩·贝拉 (Kun Béla, 1886-1939), 1902年参加匈牙利社会民主党。一战期间应征入伍，被俄军俘虏。191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在匈牙利战俘中组建共产主义团体。1918年11月建立匈牙利共产党，任中央主席。1919年3月宣布接管政权，成立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出任外交人民委员。匈牙利苏维埃被颠覆后逃往奥地利。1920年8月赴苏俄，任南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4年10月秘密抵达维也纳，重建匈共。1928年4月被捕，获释后返回苏联，任职于共产国际。1937年6月被捕，1939年11月30日被杀害。——校对者注

^② 奥托·科尔文 (Otto Korvin, 1894-1919), 1894年出生于奥匈帝国特兰西瓦尼亚。早年曾参加无政府主义组织。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转向共产主义。1918年11月参与建立匈牙利共产党。1919年3月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商业部部长、内政政治部部长、革命法庭检察长。匈牙利苏维埃被颠覆后，组织地下活动，不久被捕，于1919年12月28日在狱中就义。——校对者注

^③ 阿洛伊斯·穆纳 (Alois Muna, 1886-1943), 1886年出生于奥匈帝国波希米亚。青年时期投身工人运动，加入捷共社会民主党左翼。一战期间应征入伍，1915年被俄军俘虏。回国后，参与组建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1922年任捷共中央总书记。1929年在党内斗争中失势，被指控为“右倾机会主义”开除出党，之后组建捷共列宁主义反对派。1930年后回归社会民主党。——校对者注

^④ 埃诺·阿布拉莫维奇·拉希亚 (Eino Abramovich Rahja, 1885-1936), 1885年出生于芬兰维堡。1903年加入芬兰社会民主党，后转向布尔什维克，曾参加俄国1905年革命。十月革命期间，护送列宁至斯莫尔尼宫，参与彼得格勒武装起义。1918年芬兰革命期间任芬兰赤卫队总司令。在芬兰苏维埃被颠覆后，流亡苏联。1918年在红军中担任指挥官，曾任彼得格勒军区军事委员。1925年参加“新反对派”。1927年被芬共开除党籍。1935年被开除军籍并被捕，之后被判处死刑。1936年4月26日在狱中因病辞世。——校对者注

^⑤ 马赛尔·加香 (Cachin Marcel, 1869-1958), 1869年出生于法国布列塔尼。早年加入法国社会党。一战期间沦为社会沙文主义者，鼓吹神圣战争。十月革命后访问苏联，宣布支持苏维埃政权。1920年10月参与组建法国共产党，此后长期担任法共中央委员和政治局成员。1935年参与创建法国人民阵线，当选参议员。二战后，任立宪议会和国民会议员。1958年死于巴黎。——校对者注

根本上他始终是爱国主义者——突然宣布皈依于战斗的国际主义了。吕·奥·佛罗萨尔^①陪伴他，带着极优雅的态度。博尔迪加^②有着眩惑人的才智，一有机会便要指斥列宁的机会主义，但到了晚上，他便领着一队人唱着歌，在各代表旅馆游来串去。印度人罗易^③来寻找理论和军火，以为在印度鼓动之用，不过他似乎在一位墨西哥女子的怀抱里找到了幸福，那女子同他一样细长，同他一样美丽，有着一头光亮的金黄色头发。美国人弗雷纳^④似乎是一个密探。匈牙利人卢德尼扬斯基^⑤不久就背叛了（人家告诉我说：他现在被囚禁于索洛维茨基岛上）。在意大利人中，有老拉扎里^⑥、塞拉蒂、安吉莉卡·巴拉巴诺娃^⑦，代表意大利社会主义的传统；有青年特拉西尼^⑧，

^① 吕多维克-奥斯卡·佛罗萨尔 (Ludovic-Oscar Frossard, 1889-1946)，1889年出生于法国上索恩。早年加入法国社会党，属于党内左翼。一战期间持和平主义立场，反对法国参战。1918年任工人国际法国支部总书记。1920年10月参与组建法国共产党，当选为总书记。1923年后因意见分歧退出共产党，回归社会党。1936年在人民阵线政府中担任公共工程部长。二战期间，加入维希政府。1946年病逝于巴黎。——校对者注

^② 阿马德奥·博尔迪加 (Amadeo Bordiga, 1889-1970)，1889年出生于意大利那不勒斯。1910年加入意大利社会党，属党内左翼。1921年1月参与组建意大利共产党，当选为总书记。1923年2月被捕，不久获释。1926年因拒绝服从共产国际的“布尔什维克化”政策，被开除党籍。同年12月被捕，1931年获释，后流亡法国，脱离政党活动。二战后，参与指导意大利委员会共产主义派的活动。1970年逝世于福尔米亚。——校对者注

^③ 马纳德拉·纳特·罗易 (Manabendra Nath Roy, 1887-1954)，1887年出生于印度孟加拉的婆罗门家庭。早年投身印度民族独立运动，加入“朱甘塔尔党”。1915年因“印度-德国阴谋案”被迫流亡海外。1917年抵达墨西哥，结识当地社会主义者，逐渐转向马克思主义，参与组建墨西哥共产党。1920年前往苏联，参加共产国际活动。1929年12月因支持布哈林而被共产国际开除，组建印度共产党反对派。1936年回国后不久被捕，出狱后宣布放弃共产主义思想，转而宣扬“新人道主义”。1954年逝世于德干。——校对者注

^④ 路易斯·弗雷纳 (Louis Fraina, 1892-1953)，1892年出生于意大利西西里，幼年随家庭移民美国纽约。早年曾加入美国社会党，属党内左翼。1919年参与组建美国共产主义劳工党，后并入美国共产党，当选为临时主席。1920年受到间谍指控，之后指控虽被驳回，但并未完全消除。1923年回国，宣布退出美共。麦卡锡主义时期遭到迫害，1953年在政治迫害压力下因脑溢血去世。——校对者注

^⑤ 安德烈·卢德尼扬斯基 (Endre Rudnyánszky, 1885-?)，早年加入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属党内左翼。一战时应征入伍，被俄军俘虏。1917年接受布尔什维克主义，参与组建在俄匈牙利共产主义小组。1918年任外国共产主义组织联合会主席。1920年共产国际二大上，当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及主席团委员。1921年携带共产国际资金忽然失踪，1926年返回苏联，被判十五年徒刑。后事不明。——校对者注

^⑥ 康斯坦丁诺·拉扎里 (Costantino Lazzari, 1857-1927)，1857年出生于意大利曼托瓦。1882年发起成立意大利工人党。1895年发起成立意大利社会党。1912年任社会党中央总书记。一战期间持和平主义立场。1922年率社会党左派开除了屠拉梯领导的改良主义者。1924年未跟随塞拉蒂加入意共。1927年逝世于罗马。——校对者注

^⑦ 安吉莉卡·巴拉巴诺娃 (Angelica Balabanoff, 1878-1965)，1878年出生于乌克兰切尔尼戈夫。青年时期受民粹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影响，投身革命运动。之后流亡西欧，参加意大利社会党和意大利社会民主党活动。十月革命后赴俄国，1919年担任共产国际总书记。1921年后与列宁及布尔什维克主义决裂，返回意大利。墨索里尼上台后流亡瑞士、美国。1947年返回意大利，加入意大利社会民主党。1965年逝世于罗马。——校对者注

^⑧ 恩贝托·艾利亚·特拉西尼 (Umberto Elia Terracini, 1895-1983)，1921年参与组建意大利共产党。1926年被意大利政府逮捕并判刑二十二年。1939年因反对苏德密约而被意共开除，1943年被解救后重新入党。1946年当选立法院会议

代表《新秩序》报。在英国人中，有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①、加拉赫^②、后来的纽博尔德^③。在荷兰人中，有怀恩科普^④、斯内夫利特^⑤。在法国人中，有思想家和诗人雷蒙德·列斐伏尔^⑥，冥想着“革命或死亡”；有无政府主义者贝托^⑦，一个强壮的小伙子；有维尔盖特^⑧，五金工人；有罗斯默^⑨，不作声，爱工作，人们一开始便觉得他有着绝对的忠诚和正直；费

副议长，次年任议长。曾代表意共参加1962、64年总统选举。——校对者注

^① 艾斯特·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 (Estelle Sylvia Pankhurst, 1882-1960), 1882年出生于英国曼彻斯特。1906年参加妇女社会政治联盟, 1914年退出。之后成立了东伦敦妇女参政权联合会。一战期间反对战争, 并逐步转向共产主义。1920年6月组建共产党, 后该党与英共合并。1921年9月因反对党内集权化而退党。三十年代后逐渐脱离共产主义运动。晚年移居埃塞俄比亚, 成为塞拉西的政治顾问。1960年在亚的斯亚贝巴逝世。——校对者注

^② 威廉·加拉赫 (William Gallacher, 1881-1965), 1881年出生于苏格兰佩斯利。早年曾参加英国独立工党、英国社会民主联盟。1911年加入不列颠社会党。1915年发动克莱德机器工人罢工。1920年参与组建英国共产党, 并出席共产国际二大。1925年因“煽动叛乱”入狱。1935年任下议院议员。1943年任英共执委会主席。1956年任英共主席。——校对者注

^③ 约翰·特纳·沃尔顿·纽博尔德 (John Turner Walton Newbold, 1888-1943), 1888年出生于英国兰开夏。1908年加入费边社。1910年加入独立工党。1917年加入英国社会党, 属党内左翼。1921年加入英国共产党。1924年因意见分歧退党, 回归独立工党。晚年转向社会民主主义, 于1943年2月去世。——校对者注

^④ 戴维·约瑟夫·怀恩科普 (David Jozef Wijnkoop, 1876-1941), 早年参加荷兰社会民主工人党, 属党内左翼。1909年退出并组建荷兰社会民主党, 任党中央主席。1918年将荷兰社会民主党改名为荷兰共产党, 加入第三国际。1925年任众议院议员。1926年因派系冲突被开除党籍, 1930年悔过重新入党。1941年5月7日死于心脏病。——校对者注

^⑤ 亨德利库斯·斯内夫利特 (Hendricus Sneevliet, 1883-1942), 1876年出生于荷兰阿姆斯特丹。早年参加荷兰社会民主工人党, 属党内左翼。1913年赴爪哇参与组建印尼社会民主联盟。1918年被殖民当局驱逐出境。1920年7月出席共产国际二大, 1921年被派赴中国, 参与组建中国共产党。1923年指挥中共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1927年因支持托洛茨基而与共产国际决裂。1929年组建革命社会主义工人党, 一度接近第四国际。德军占领荷兰后, 组建地下抵抗组织马克思-列宁-卢森堡阵线。1942年4月被捕, 英勇就义。——校对者注

^⑥ 雷蒙德·列斐伏尔 (Raymond Lefebvre, 1891-1920), 1891年出生于法国巴黎。早年为新闻记者, 曾参加一战。1916年因伤退役, 之后参加工人国际法国支部。一战后, 组建“共和国退伍军人协会”。1919年参加法国“拥护第三国际委员会”。1920年赴俄国参加共产国际二大, 会后归国途中, 因风暴在海上遇难。——校对者注

^⑦ 路易斯·贝托 (Louis Bertho, 1889-1920), 早年参加法国挖掘工会, 为法国无政府-共产主义联合会成员, 多次被捕。1916年参加齐美尔瓦尔德联盟。1920年代表法国工会参加共产国际二大, 会后归国途中, 因风暴在海上遇难。——校对者注

^⑧ 马塞尔·维尔盖特 (Marcel Vergeat, 1891-1920), 早年参加塞纳河革命青年团, 多次被捕。1916年为国际和平行动委员会执委委员和青年工团主义者联盟领导人, 支持齐美尔瓦尔德联盟。1920年代表法国工会参加共产国际二大, 会后归国途中, 因风暴在海上遇难。——校对者注

^⑨ 阿尔弗雷德·罗斯默 (Alfred Rosmer, 1877-1964), 1877年生于纽约 (父母为法国移民), 幼年返法, 青年时期投身工团主义运动。一战期间, 积极参加齐美尔瓦尔德运动。1920年参与组建法国共产党, 参加共产国际运动。1924年因支持托洛茨基而被开除党籍。1932年宣布退出政治活动。1964年逝世于克雷泰伊。——校对者注

尔南·洛里奥^①，四十八岁，战争年代的革命战士；鲍里斯·苏瓦林^②，尖刻而专横的，带着桀骜不驯的态度，不断地提出些为难的问题。在德国人中，有保罗·列维^③，样子像一个青年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安吉尔·佩斯塔尼亚^④，代表着西班牙“全国劳工联合会”。稍后，有一天，加泰罗尼亚一个小学教员，带着严肃的面孔，来到莫斯科，他就是华金·毛林^⑤。和他在一起的另一个带着金丝眼镜的爱笑的小伙子，就是安德烈乌·宁^⑥。武约·武约维奇^⑦才二十五岁，已经是个老“革命职业家”了，勇敢而伶俐，很轻松地跨越全欧一切国境。

在国际主席台上的俄国人，有简单朴素的列宁；有身体挺得很直，穿

^① 费尔南·洛里奥 (Fernand Lorient, 1870-1932)，1901年参加法国社会党，1905年参加工人国际法国支部。1906年参与创建法国总工会旗下的教师联合会，1912年担任教师联合会全国司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持反战立场，参加了齐美尔瓦尔德左派。1920年参与创建法国共产党，并当选为执委会委员。1928年参加左派反对派而被开除出党。1932年10月12日因白血病逝世。——校对者注

^② 鲍里斯·苏瓦林 (Boris Souvarine, 1895-1984)，早年参加法国社会主义运动。1916年参加工人国际法国支部，1920年参与组建法国共产党，后任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1924年参加“左派反对派”，被开除党籍。1929年后与托洛茨基决裂。——校对者注

^③ 保尔·列维 (Paul Levi, 1883-1930)，1906年参加德国社民党，同年开始当律师。1915年3月参与成立国际派，1915年4月被强征入伍，经绝食抗议后于1916年退役，随后参加齐美尔瓦尔德运动。十月革命后返回德国，1918年底参与创立德共，被选为中央局委员。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牺牲后，担任德共中央领导。1921年3月行动失败后，被开除出党。随后成立了共产主义社，1922年春季随共产主义社参加独立党，同年随独立党返回社民党。1930年在病中自杀。——校对者注

^④ 安吉尔·佩斯塔尼亚·努涅斯 (Ángel Pestaña Nuñez, 1886-1937)，青年时投身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运动。在工人运动中表现积极，1916年担任《工人团结报》编辑。1920年参加共产国际二大。1922年被政府收买的杀手刺杀，身负重伤。1929年曾短暂担任全劳联总书记，1930年至1932年再次担任总书记。1931年发表《三十人声明》，因此被开除出全劳联。同年年底创建工团主义党，1936年参加人民阵线。1937年12月11日因病去世。——校对者注

^⑤ 华金·毛林·胡利亚 (Joaquín Maurín Juliá, 1896-1973)，早年参加西班牙劳工联合会。1921年赴苏参加红色工会国际代表大会，回国后当选为全国劳工联合会总书记，随后被捕，获释后在全劳联内组建革命工会委员会。1924年参加西班牙共产党。1925年再次被捕，1927年获释后流亡巴黎。1930年返回巴塞罗那，后因意见分歧脱离西共。1933年组建伊比利亚共产主义者联盟。1935年9月组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任总书记。1936年参与人民阵线，当选为国会议员。内战爆发时，被叛军逮捕，1944年获释后流亡美国，1973年于纽约逝世。——校对者注

^⑥ 安德烈乌·宁 (Andreu Nin Perez, 1892-?)，早年参加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运动。1917年加入工人社会党，后来又加入全国劳工联合会。1921年赴苏参加红色工会国际代表大会。回国后参与组建西班牙共产党。1926年参加“左派反对派”活动，被西共开除党籍。1931年回国，组建左派反对派组织“共产主义左派”，但最后与托洛茨基决裂。1935年9月组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担任政治书记。内战爆发后，参加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任司法部长。1937年6月被苏联秘密警察逮捕，从此下落不明。——校对者注

^⑦ 沃伊斯拉夫·武约·武约维奇 (Vojislav Voja Vujović, 1897-1936)，1912年参加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1919年参与成立青年共产国际，当选为总书记。1928年参加“联合反对派”，被开除党籍，并被流放西伯利亚。1928年悔过，之后再次被捕。1936年11月3日被杀害。——校对者注

着一套白制服的托洛茨基，他四处奔波偶然于此出现；有狡猾的伶俐的猴子相的拉狄克，这是最能使人颠倒的辩论家；有精力充沛、长发蓬乱的主席季诺维也夫；有布哈林，在他的身上理论变得妙趣横生。

初期的第三国际得到人们拥戴，人们为了它而斗争，而坐牢，而死；它事实上成了一种精神的和政治的伟大的力量，不仅因为战后全欧工人革命潮流高涨起来，几乎在好多个国家得到胜利，而且因为它集合了热忱、诚实和忠贞，集合一群人，愿与共产主义同生死。在这群人中，那些江湖骗子，那些冒险家，是没有地位的。这群人今天哪里去了呢？

拉扎里、塞拉蒂、洛里奥，是死了。保罗·列维被开除了，后来在精神错乱发作时自杀了。列斐伏尔、贝托和维尔盖特，溺海死了^①。拉西尼关在意大利牢内多年了。罗易已被开除，现关在印度牢内^②。巴拉巴诺娃已被开除，现在国际社会主义队伍中奋斗。博尔迪加已被开除，在意大利享受一种极端受限制的自由。始终忠实于自己信念的，有苏瓦林、罗斯默（同他们一起，还有皮埃尔·莫纳特^③和雅克·梅斯尼尔^④，都是法国最早的共产主义者）。武约·武约维奇，现关在俄国上乌拉尔斯克监狱中。俄国同志别处再说。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统一工党”的创立者华金·毛林，为官方共产党所开除和诬蔑，业已被西班牙法西斯杀害了；安德烈乌·宁，现在是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司法顾问，被开除并逐出苏联后，天天受西班牙斯大林派报纸所攻击，被诬为“国际法西斯主义代理人”^⑤。西尔维娅·潘克

^① 这里我再驳斥一次那种可恶的传说，意在关于这三个人之死加上一种猜测。我是很知道他们动身时的情形的。他们是他们的伙伴，当他们在俄国最后逗留时候。我知道他们的死只因为他们自己的急躁造成的意外事件。（这三人从法国偷渡俄国，经过黑海回来，在海中失踪了。——译者按）

^② 罗易近年已获释。

^③ 皮埃尔·莫纳特（Pierre Monatte，1881-1960），早年参加法国工团主义运动。当过印刷工人，1904年创办《工人生活》杂志。起初是无政府主义者，后来逐步转向社会主义。一战期间反对战争。十月革命后接受共产主义，1919年4月在法国总工会内部建立革命工会委员会。1923年参加法国共产党，与苏瓦林和罗斯默关系密切。1924年支持托洛茨基主张，被开除党籍。1925年创办《无产阶级革命》杂志。30年代后，因工团主义倾向与托洛茨基决裂。1960年6月27日死于脑溢血。——校对者注

^④ 雅克·梅斯尼尔（Jacques Mesnil，1872-1940），早年参加比利时无政府主义运动。十月革命后接受共产主义，并参加了法国共产党。曾出席共产国际三大，但此后逐渐对布尔什维主义产生怀疑，1924年被开除出党。此后参加莫纳特的工团主义活动。1940年11月14日去世。——校对者注

^⑤ 毛林被佛朗哥所枪决；宁则被西班牙斯大林党捕去杀了。——译者按（毛林于1936年被捕，1944年获释，1973年去世。——校对者注）

赫斯特、纽博尔德，都被开除了；永不倦怠的斯内夫利特也被开除了。

共产国际挥霍着自己的力量，轻视着自己的能力，驱散、追捕、迫害了那些诚意的人，他们从全世界四面八方奔赴而来，为它服务……

新经济政策与反对派

不到几年，新经济政策就使俄国恢复了繁荣的景象，但这景象有时是人所厌见而且使人忧虑的。社会主义政权保持着所有的发号施令的杠杆，而且以革命的工人和知识分子组成的人才很灵巧地运用这些杠杆。至少八分之七的工业生产是收归国有了。全国喘了一口气；人们开始生活得稍微舒适些，自由主义的气息在统治分子当中吹嘘着。作家们享受的自由，在现在看来，是要被人论为奇闻的，所以当时产生了一些真正的杰作。加米涅夫，当时是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又兼任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曾经说过要容许一个无党派的日报出版……普通工资水平稍微超过战前，普通消费水平则稍微不及战前。

在我们共产主义者中发生了一种难以排解的忧虑。我们忍受革命带来的必然事件，连最残暴的和最可痛心的在内；我们自寻烦恼，自加种种最苦痛的限制，因为我们期待能够提高收获。以后，喀琅施塔得的屠杀——我们的最悲惨的回忆——之翌日，列宁发出了退兵的信号，说：“我们必须要向资产阶级学习！我们要学习商业，我们什么东西都要卖，除了酒和神像！”^①此时，我们差不多全体都同意于他，因为原来的办法，如农村征粮，如分配全部由国家办理（这是战争所产生的，而非出于预定计划），显然是行不通了。于是乎，我们当权的城市呈现出一种奇怪的景象；于是乎，我们觉得渐渐被掩盖了，被包围了，被麻痹了，被腐化了……金钱生出油腻来，使得一切轮机都生了锈，如资本主义的旧机器一般。有一百五十万失业工人被救济，在诸大城市中而且救济得很不好。赌场直开到半夜后三点钟，这还是两大首都的中心区呀！赌场里，吃喝嫖赌，做着种种旧时代的齷齪事情。我们知道，在那里耗费的金钱，大部分是从我们偷去的，这样方法或那样方法偷去的；是那些中介人或腐败官僚侵吞的国家公款。涂脂抹粉的女人在浴堂和旅馆附近徘徊，同伦敦、巴黎的妓女没有两样。阶级在我们眼前再生起来了：最低层是每月领二十四卢布的失业者，

^① 这里，他料想错了。他死后不久，政治局除了他的寡妻克鲁普斯卡娅和托洛茨基两人反对以外，都决定恢复那大战初起时尼古拉二世所废除的酒税。伏尔加酒之售卖给苏联预算以一笔可观的进款，但国家因而受了很大的损失。

最高层是每月领八百卢布的工程师，二者中间有每月领二百二十二卢布的党员干部，但后者有好多东西可以免费特供的。少数人的奢靡和多数人的贫困之间，横着一道鸿沟，自杀者的遗骸就是抛弃在这鸿沟里面。有人提出扩大遗产问题，斯大林提议，以差不多没有遮掩的形式，为着富农利益恢复土地私有制。“贫困”是令人愁苦的和肮脏的，它又复兴于我们的新社会上，仿佛人身上的疥疮；“奢靡”则是傲慢的和自满的。我们的社会主义民兵将卖苹果的可怜穷苦妇人拖到局所来，只因为她没有执照；而肥胖的店主则站在旁边很高兴地看着，觉得事情终于是重新走上旧轨道了，他是投机价格贩卖社会主义工业制品而致富的！……青年人喝酒，老年人喝酒，酗酒成了一种社会的瘟疫。最坏的，是我们已经认不出旧日的革命党了。往时的战士，有坐牢经验和注重思想观念的，一千个党员中还有几个人？并且他们占据着足使他们与底层隔离的地位。国内战争时的战士在后来的人群当中，也有沧海一粟之感，在那些要津的人当中，在那些新的循规蹈矩者当中；——工人革命的未来究竟如何，根本上是他们所最不关心的。他们只要求不须历史而舒舒服服地生活着；他们本身目光短浅，而又智力低下，同所有小钻营奸商一样，他们不明白这就要引到最坏的历史。

我们的忧虑是由国家的这种污垢和苏维埃社会资产阶级化这些最初征兆所引起的；这个忧虑？不用说，并不是感情用事，而是经过深深思考，而且有经济统计来证明的。列宁在1924年1月21日死了，死前就抱有这个忧虑，表示于他的最后著作和最后演说里面。他自问道：“国政之舵，是否脱离吾辈之手？”在病中，大脑受了伤，他还使用他的所有的最后的力量来找寻武器以攻击最不好的和最直接的弊病：即党内的官僚主义退化。那时官僚已经代替了党；工人、战士，已经没有一点说话权利了。人们觉得官僚无上威权的时代已将来临。有些人宣布：无产阶级专政已让位于书记处专政了（苏瓦林的话）。死前不久，列宁曾向仇视官僚制度的托洛茨基提议，共同为党的民主化而行动。在总书记处里，格鲁吉亚人斯大林利用他的技术地位遍植私人，因而渐渐得势起来，——在内战时他是不甚知名的。就是他充任了衰病的列宁最后努力的障碍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临终前所口述的几封信里，就包含有与斯大林的绝交书。

用经济学上的话说来，问题是由工业和农业间的关系来表示的。农业

恢复得比工业更快；农民储藏了好多麦子，因为麦价太低不肯出卖；而麦价之低是因为工业制品供不应求因而抬高价格。人们是走向一个没有救药的经济危机，这危机将激起一亿两千万农民反对社会主义政权，迫得社会主义政权去大量输入——是赊账吗？什么条件呢？——外国工业制品，因而受外国资本的支配。应当有先见之明，而且及时补救。那时还是可以补救的时候。

有三个解决方法：

第一，党的民主化，为的使工人和革命者的真实影响能在党内表现出来，并洗清国家机关；这是一切经济设施能有成效的明显条件。

第二，采用一种工业化计划，使得几年之内显见工业发达起来。

第三，为寻求工业化的必需的资源，强迫富农交付麦子于国家。

一般是：限制发财，限制享特权的人，打击投机，缩小官僚的权力。

以上总括起来，应该是党内反对派的纲领。由此生出它的口号：“打倒市侩，打倒富农，打倒官僚！”

自从1923年，反对派就找到一个领袖——托洛茨基；官僚派也开始化身为斯大林了。

自从1923年，就有一种无限强暴的鼓动，反对托洛茨基，随时随地宣布托洛茨基是反对列宁，是党的恶鬼，是布尔什维克传统的敌人，是农民的仇敌。他旧时，从1904年至1915年间同列宁的旧分歧，遂被那些无所不为的论战家利用来创造了一个“托洛茨基主义”，一种莫明其妙的思想系统，以此当作最有毒害的邪教异端。他虽然以光耀的文笔、深刻的思想，写成了一些东西，但是没有用，官方动辄便印行出几百万份的出版物，三番四覆以自造的理由来攻击，遮掩了他的声音。这回攻击的内幕，我们以后知道了，而且明白：无论拿一时误解或感情激昂，都不足以解释那经过商量和上头命令的伪造事实和思想之实际情况。关于伪造“托洛茨基主义”之事，已有好多签名负责的证明文件（不错，签名的人有好多个，最近已被枪毙了）。

红军的创建者，几个月之前尚被《真理报》誉为“胜利的组织者”，

当攻击开始时还是最高军事委员会的主席，在军队中和全国人民中都受拥戴的，他本可以来一个武力政变而必得成功。但如此，则是以军人政制代替官僚政制，而使社会主义革命走上以前资产阶级屡次革命所有的轨道。问题不是在玩拿破仑把戏，即使是出于好意。反是应当阻止拿破仑主义。反对派之施行其内部改革政策，并非依靠武力政变，而是按照常用的社会主义方法，即诉之于劳动群众。托洛茨基离开了军事主席的地位，毫不抵抗地让人免职，而以普通党员的资格继续奋斗。一切事情，最后都是要取决于国际形势的。1923年德国革命失败之后（开姆尼茨会议^①、汉堡暴动、萨克森工人政府被武力镇压，冯·塞克特将军^②的独裁专政），一种退潮漂过俄国，于是官僚政治得意了三个年头。

^① 开姆尼茨会议于1923年10月21日在萨克森召开，参会代表包括工厂委员会、共产党、社民党、独立社民党。会上，共产党代表布兰德勒要求进行总罢工，社民党以退出会议作威胁，迫使共产党代表放弃了总罢工计划，最终使政府军兵不血刃地占领了萨克森和图林根。——校对者注

^② 约翰内斯·弗里德里希·列奥佩德·冯·塞克特（Johannes Friedrich Leopold von Seeckt, 1866-1936），1866年出生于石勒苏益格的贵族家庭，毕业于柏林军事学院。一战期间曾任第三军参谋长、德国陆军参谋总长。战后任国防军总司令，血腥镇压工人运动。1926年失势下台并被退役。1934年受聘为蒋介石政权的军事顾问，参与围剿江西“红军”行动，不久因病回国，1936年病逝于柏林。——校对者注

季诺维也夫

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在这时代是政治局的头号人物；加米涅夫是第二号人物；斯大林是第三号人物。“1907年以来就是列宁的助手，理论家、通俗家、演说家——散乱的头发，光滑的有点柔软的面孔，疏懒的步法，圆滑的手势，时发锐音使人听得清楚的低音，毫不容情的语调”^①，季诺维也夫是彼得格勒苏维埃的主席，就是他的命令将彼得格勒改名为列宁格勒的，他又是共产国际的主席，自从国际成立时候起。正是此时，开始了他主演的舞台剧，出于一种深刻的信念，一种确定的野心，和一种更加确定的庸庸碌碌的性格。

由于他的鼓动家才干，他似乎是为孜孜不倦地辅佐另一个思想上和气魄上比他更伟大的人而生的。所以在二十年不间断的合作中，他成了列宁的传声筒、代理人和通俗家。现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死了，他自以为注定了做他的继承人。在共产国际内，他是耍小手段的人；在俄国内，他是主持压迫的人。他在内部派别斗争中，使用阴谋和诡计，越来越上手；他在党内主持压迫，不错，起初是不敢明目张胆的。共产国际在各国的失败，无疑也是因为指挥无方，从而使他威信扫地。从1923-1925年，他与斯大林密谋将托洛茨基排挤出政权之外，托洛茨基之执政本是因为受人民热情拥戴和受列宁托付的。人们低声传述：列宁留了一个遗嘱，给中央委员会藏匿起来。不久这遗嘱的文本就由这人之手传到那人之手了。列宁在这遗嘱中表现出后来历史完全证实的一种远见。他对于他的那些合作者所作的判断，都已证明完全正确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10月的那件事当然不是偶然的”，他说。布哈林“是党的最宝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但是他的理论观点……其中有某种烦琐哲学的东西”。

“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托洛茨基同志……他个人大概是现在的中央委员会中最有才能的人，但是他又过分自信，过分热中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现时中央两位杰出领袖的这两种特点会出人意料地导致分裂，如果我们党不采取措施防止，那么分裂是会突然来临的。……”

^① 维克多·塞尔日《俄国革命第一年》，第308页。

“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这个人在所有其它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为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这一点看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从防止分裂来看，从我前面所说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关系来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①

列宁写这几行字，是在1923年1月4日，即差不多在他死前一年。在其他的秘密书信中，他也斥责奥尔忠尼启则的粗暴，而且对于苏维埃国家有一种很严厉的判断。这是“资产阶级和沙皇制度的大杂烩”——“不过稍微涂了一点苏维埃色彩罢了”^②。皮达可夫^③，是他认为良好的行政家之一，但政治能力则很有疑问……

从此时代起，斯大林就表现出有一种灵巧手段，善于阴谋和暗中运用指挥棍子。攻击“托洛茨基主义”之斗争，开始时，使全国惊讶。革命本是习惯于刻苦和纯洁的生活的，万想不到会看见诳语、诬蔑、伪证等如此流行，万想不到领导者间如此令人痛心地产派，从前他们好像是非常精诚团结的。党也万想不到它的内部生活会突然被重拳出击。

斯大林放空气说：他是主张温和的，他反对开除办法，反对“流血”，如此就把他的行事所激起的怨望完全移到季诺维也夫身上去。他的存心也是要使国内政策之失败责任推由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两人负责，——这政策结果使得少数农民发了横财，而使国家遭遇粮食恐慌。他将共产国际在各国失败的重担压在季诺维也夫肩上。在克里姆林宫私人谈话中，人们听到他说：共产国际各机关都布满了“一些流氓、败类和雇用的政客，倘

^① 苏瓦林《斯大林传》所引，第287页及以下诸页。

^② 引文出自《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版第43卷第350页。——校对者注

^③ 格奥尔基·列昂尼多维奇·皮达可夫（Георгий Леонидович Пятаков，1890-1937），1910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属布尔什维克。1912年被捕并被判处终身流放，逃脱后流亡瑞士。1915年参加伯尔尼代表会议。二月革命后回国，当选为基辅工人代表苏维埃主席。十月革命后，负责接管国家银行。国内战争期间，任乌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乌克兰临时工农政府主席。1922年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1923年参加“左派反对派”，1927年被开除出党，1928年悔过。此后担任最高经济委员会副主席、重工业人民委员等职，参与制定一五计划。1936年9月被开除党籍，9月12日被捕，1937年1月30日被杀害。——校对者注

若由他来主政，他很快就叫这些人物露出原形，因为这些人物再不能替革命事业做一点事情了……”。

在这中间，斯大林完成了布置私人于党各级书记处的大工作，除了季诺维也夫管下的列宁格勒区书记处。1926年，一切都完结了，他成了党的主人了，——这个党，下层群众一声不响，顺从于各级书记命令的（因为有利可图的）多数党员，通过中央委员会责令通过的那些决议案。忽然，在第十四次大会上，季诺维也夫被打入少数方面去了，孤立了，被指定对于国内外的一切困难负责了……此时他还可以退处于第二等政权地位，保持不失，如其他许多人一样。但他身上的社会主义者的人格究竟是更强过于和更忠诚过于政治家或甚至野心家人格的。辩论涉及了重大的问题。斯大林提出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新政策，这政策除了表示放弃世界革命之外，没有别的什么作用。这一点是没有调和可能的。斯大林同中央委员会右派（李可夫^①、托姆斯基^②、布哈林）联合，在乡村继续一个使富农发财的政策。斯大林终于霸占了党；季诺维也夫则转到反对派方面来，以一种不调和的转变，同不久之前他的政敌托洛茨基携手：他接受了托洛茨基的政纲，即党内（继之，政制）民主化，国家工业化和压迫“富农、市侩和官僚”。不久，中国革命的悲剧加剧了这场斗争。

^① 阿列克塞·伊万诺维奇·李可夫（Алексей Иванович Рыков，1881-1938），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后，属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后，任内政人民委员。1918年后，历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劳动与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23年当选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列宁去世后，接任人民委员会主席。1926年任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1928年反对取消新经济政策，反对加紧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1929年11月悔过，改任邮电人民委员。1937年2月被开除党籍并被捕，1938年3月15日被杀害。——校对者注

^② 米哈伊尔·巴甫洛维奇·托姆斯基（Михаил Павлович Томский，1880-1936），190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属布尔什维克。1905年组建列韦里工人代表苏维埃。1907年任彼得堡委员会委员。在彼得堡开展地下工作，并负责党报的编辑。先后多次被捕流放，二月革命后获释。十月革命后，历任莫斯科工会主席、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主席、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1920年参与创立国际工会委员会，担任总书记。1928年反对取消新经济政策，反对加紧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改任全苏化学工业联合总公司经理，1932年改任国家图书杂志联合出版公司经理。1936年8月22日因不堪迫害自杀身亡。——校对者注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

第三国际在俄国以外有六个大党，在德国，在法国，在意大利，在保加利亚，在南斯拉夫，在捷克斯洛伐克。芬兰、匈牙利、德意志、意大利诸国工人革命（1918-1922年）失败了以后，还能提出德国和保加利亚的政权问题，但这只是为着达到悲惨的失败：在德国没有流血，在保加利亚则遭受了可怕的屠杀。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似乎要在西方沉寂很长时期。而此时，在东方恰好升起了万丈的光芒，中国民众怒吼了起来，一次又一次得到胜利。广东封锁了香港，在南方成立了一个革命的共和国，聘请苏维埃顾问和教官：鲍罗廷^①在政府，加伦（即布柳赫尔^②，旧日乌拉尔游击队领袖）在新成立的军队，伍廷康^③在北京。^④列宁在那里同孙文一样受人欢迎。布柳赫尔率领着蒋介石的军队进行北伐，工会占领了上海和汉口。在黄皮肤大陆的工农革命胜利之后，将造成何等伟大的革命势力呢？欧亚两大洲的命运，也是当代人类的命运，都要改变的。不幸，我们知道了这些胜利的内幕，我们亲眼看见了上海、广州、汉口、南京的劳动者给我们的官僚领入别人设下的圈套里去。

从此以后，当权的官僚们事实上将工人排出苏维埃政权以外了；无产

^① 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鲍罗廷（Михаил Маркович Бородин，1884-1951），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属布尔什维克。1907年被捕，1908年流亡美国，十月革命后回国，在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1923年作为共产国际代表被派赴中国，担任国民党的总政治顾问。在华期间，奉行共产国际右倾政策，压制中共及工农运动，对国民党采取妥协政策。1927年7月回国，曾任劳动人民委员、塔斯社代理负责人。1949年因斯特朗案件被捕，1951年5月29日死于狱中。——校对者注

^② 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柳赫尔（Василий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Блюхер，1890-1938），1914年被征入伍。1916年退役，同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内战期间曾任车里雅宾斯克革命委员会主席、第51步兵师师长。1921年任远东革命委员会主席、远东人民革命军总司令兼战争部长。1924年被派赴中国，担任国民党的首席军事顾问，参与指挥北伐战争。1929年任远东特别集团军司令。193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1938年7月任远东方面军司令员。同年10月22日被捕，11月9日在狱中被谋杀。——校对者注

^③ 格里戈里·纳乌莫维奇·维经斯基（Григорий Наумович Войтинский，1893-1953），中文名伍廷康。早年移居美国，十月革命后回国，加入俄共。国内战争期间，赴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工人苏维埃参加工作，参与反对高尔察克的鄂木斯克起义。1918年被白军逮捕，判处无期徒刑，后在流放地联合犯人举行暴动，推翻了白军统治。之后参加共产国际工作，任东方部副部长。1920年被派赴中国，参与组建中国共产党。后以国际代表身份参加中共工作，奉行共产国际右倾政策，压制工农运动。1927年中国革命失败后回国。此后从事于教学工作，1953年6月11日病逝。——校对者注

^④ 伍廷康常住上海。北方是加拉罕主持的。——译者按

阶级专政只剩下空名罢了。革命者退出指挥地位，而让官僚们接替。政治不再为劳动者一般的——因而是国际的——利益所决定了，而是由“不愿多事”的官僚来操纵，斯大林成了他们的偶像。他们装作期望中国革命的胜利，其实是害怕这个胜利。到了该做的时候，他们总是胆怯了。他们的整个策略就在于迂回曲折避免烦难，结果，大家看见，反而遭遇更糟糕的麻烦，但那时已来不及补救了。我们知道蒋介石正准备着公开对工会及他的共产党盟友举起屠刀。我们知道，他正准备着一个暴力政变，以屠杀上海无产阶级，——这些工人刚完成了当代历史最辉煌的暴动之一，而得着胜利。但人家不许我们说话。斯大林在莫斯科当着几千名战士面前发言，向他们正式担保，一点也无须害怕蒋介石，“从他们身上能榨多少就榨多少，然后将他们像榨干了汁的柠檬一样扔掉”。这个演说还未印出来，到第二周电报就到了，告诉我们以我们所预言的事变，即是说上海工人被屠杀了（1927年）。而斯大林则向《真理报》编辑部索回了他那可伶的演说的原稿和校样，从此再没有人见过。可怜到匿藏自己的文稿！^①

关于这一点，我只引用当时的一份文件，即被派赴中国的俄共党员希塔洛夫^②在党的十五大上所作的报告。斯大林用它来谴责那些在中国忠实执行他命令的人……

“共产党占多数的上海人民政府只存在了二十多天……尽管军事政变随时可能发生，但这个政府表现得十分消极……因为武汉政府不承认它的权力（武汉政府包含两名共产党部长^③）……第一师师长薛岳^④来到同志们面前，告诉他们政变的准备情况……他准备加入我们和他的部下一起对抗军方。中共领导人回答说，他们知道这一阴谋，但不希望

^① 马尔罗在他的小说《人生》中曾投射若干光明于这个事变。他在此书以前著的一本《征服者》在苏联被禁止发行的。《人生》尚未曾译成俄文，如果没有被支离割裂，那就永远不会译成俄文出版的。

^② 拉斐尔·莫西耶维奇·希塔洛夫（Рафаил Моисеевич Хитаров，1901-1938），1917年参加革命活动，参与格鲁吉亚“人民革命”小组。1919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任共青团第比利斯委员会主席。先后两次被捕，1920年被驱逐出格鲁吉亚。1921年被共产国际派赴德国，曾任德国共青团中央委员会组织部部长、鲁尔区团委书记。1925-1928年任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书记，于1927年赴中国参加中国共青团四大。此后曾担任库兹涅茨克冶金厂党委书记、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党委书记、车里雅宾斯克党委书记等职。1937年11月被捕，并被开除党籍，1938年7月28日被杀害。——校对者注

^③ 指农政部长谭平山（1886-1956），劳工部长苏兆征（1885-1929）。——校对者注

^④ 薛岳（1896-1998），广东韶关乐昌人，一级上将。早年参加同盟会。北伐战争时期，任第一师师长。1933年任第五军军长，参加镇压围剿江西“红军”行动。抗日战争时期，任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第九战区司令长官等职。1946年内战爆发时，大举进攻苏北、安徽、山东各解放区。1950年逃往台湾。——校对者注

过早地与蒋介石决裂；他们建议薛岳上前线或辞职，以证明他对蒋介石的忠诚。于是，第一师便调出了这座城市；第二师取代了它；两天后上海的工人便被集体屠杀。”

克里姆林宫的政策结出了丰硕的恶果。而这仅仅是开始。

“在革命力量达到最高潮时，中国共产党不断作着有系统的退却。它同意交出其所有的组织、工会、农会等。对国民党，它放弃一切未经国民党授权的计划；它命令汉口工人自愿解除武装；事实上同意暴力解散所有农民组织……

“在湖南，反革命在难以置信的情况下于1927年5月21日和22日取得了胜利。在省会里只有一千七百名士兵，而在周边地区则有两万名有组织的武装农民。然而，军官们成功地夺取了权力，枪杀农民领袖，建立起他们的独裁政权……农民们正要占领这座城市，这本是轻而易举地，但这时他们收到了中共中央的一份电文，命令他们避免武装冲突，并通过官方渠道提出问题。省委给赤色支队下达了撤退的命令。其中，有两个支队没有收到命令；他们发起了攻击，被包围并被消灭了……”^①

中国工人的流血关斯大林什么事呢！十五次大会开会之前做了这许多失败，又大批开除了这许多人（他借党的名义开除的；他不敢将责任问题提出讨论，就于大会前夕以破坏党纪罪名开除他的两个大敌：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为补救之故，斯大林需要在中国造成一个胜利，即使是一个镜头的胜利也好；即使没有胜利，但有几千个新的英勇牺牲者也是好的。有了这个以后，只消引起对于牺牲者的敬意和提醒“不要做反动派的工具”，便可以堵塞一切批评之口了。他于是派了他的表弟罗明纳兹^②和一个青年德国人，勇敢而又鲁莽的海因茨·诺伊曼^③到广东去，挑动一个新的革命风潮……

^① 俄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正式记录。

^② 维萨里昂·维萨里奥诺维奇·罗明纳兹（Виссарион Виссарионович Ломинадзе，1897-1935），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1926年以少共国际代表的身份进入共产国际主席团。1927年7月被派赴中国接替罗易，出任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鼓吹“不间断革命论”（主张中国革命已达到高潮，社会主义革命时刻已来到），强令中共在各地发动暴动，造成巨大损失。1927年11月回国，担任外高加索边疆区委第一书记。1930年被指控组织反党集团，1935年不堪迫害自杀。——校对者注

^③ 海因茨·诺伊曼（Heinz Neumann，1902-1937），1920年参加德共（斯），1922年进入《红旗报》编辑部工作。1923年任梅克伦堡地委书记，汉堡起义失败后流亡苏联，1925年任德共驻莫斯科代表。1927年任共产国际驻华代表，执行共产国际的左倾盲动政策，对中国革命造成巨大损失。1928年返回德国，任《红旗报》主编，推行共产国际左倾盲动政策。1932年开始同斯大林和台尔曼产生分歧，1932年10月被解除职务。纳粹党上台后流亡苏联，不久被捕，1937年11月26日被杀害。——校对者注

“于是在12月10日至11日夜间接与大会同时，广州爆发了一场起义。毫无疑问，这是斯大林的部下发动的，为的是给他们的领袖投一个胜利之票，作为论据来抵制‘反对派的悲观主义’。后卫方的革命运动，既孤立又勉强，是注定要失败的。被国民党军队包围的广州公社只维持了四十八小时；它的失败伴随着一场可怕的大屠杀，——有超过两千名共产党人或被视为左倾分子的人被当场杀害，抑或是遭受折磨。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在中国的一名使者宣称，约有三万名中国工人被捕杀；1927年4月到8月，在这短短五个月间，在极不明智的广州暴动和血腥镇压持续了数周之后，死者最保守估量一共有十万人，这都是‘莫斯科’商标下矛盾政策底下的牺牲者。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差不多被消灭了，幸存者有一部分，连以前的书记陈独秀在内，转到反对派来，因而被开除。^①一连串的错误和冒险便如此结束了。从此以十万人生命为代价，取消了斯大林为革命理论家和战略家的资格。”^②

这是历史学家的观点。事实上，经过这几次可耻的失败之后，斯大林更有势力，更加伟大了。亚洲革命的失败，保障了他在苏联国内的胜利。俄国内部革命精神也以此受了重大的打击。“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更加得势了，因为革命在其他各地都遭受到失败。历史太多了！那些暴发户要休息，要停止冒险……这个格鲁吉亚人有何等的手腕！手腕万岁！^③

执行他的命令的人，则没有他那样幸运。罗明纳兹，他的表弟，得了这些经验遂变成反对派，最后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自杀了，于1935年快要被捕的时候。海因茨·诺伊曼失踪了，大概是监禁在苏联；他敢于批评，而且知道太多的事情。好多不知名的青年人，在莫斯科与季诺维也夫同时枪毙的，是他的同政见的朋友。

从巴黎，从柏林，从伦敦，从危地马拉，从其他各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他所任命的，而且是他所雇用的，——都打电报来赞成，来赞成一切：与敌人联盟，开除同志，不合时宜的暴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永不错误

^① 这一派人中，有几个在苏联坐牢。陈独秀两个儿子都在上海被砍头了。

^② 苏瓦林《斯大林传》第434页。

^③ 不久以前，1934-1935年，直至1936年开头几个月，苏维埃出版物以及全世界共产党出版物，都大吹特吹中国苏维埃的胜利。这些苏维埃如今怎么样呢？或者宁可说：人们把它们弄成什么东西了呢？

的政策、大纲，等等，等等。台尔曼^①（他不断地宣告必然夺得德国政权）、多里奥^②、巴比塞、马塞尔·加香，以及其他好多人，都是赞成，赞成，赞成，赞成，热烈地赞成一切——一切。

^① 恩斯特·台尔曼 (Ernst Thälmann, 1886-1944)，1903年参加德国社民党，在党内属于左翼，反对工会官僚。1915年至1918年被强征入伍，1918年参加独立党，成为汉堡的独立党左派领袖。1920年参加德国统一共产党，1921年3月发动失业者罢工。在共产国际三大上反对列宁和托洛茨基，为进攻理论辩护。后当选为德共中央委员会委员，成为左派的旗手。在1923年10月的汉堡起义中承担重要工作。1924年入选中央政治局，在费舍和马斯洛夫被开除后担任党主席，支持斯大林。1933年3月被纳粹党政权逮捕，1944年8月被杀害。——校对者注

^② 雅克·多里奥 (Jacques Doriot, 1898-1945)，早年加入法国社会党。1917年至1920年应征在法国军队中服役。1921年赴苏，负责青年共产国际中央工作，任青年共产国际执委。1923年任法国共产主义青年组织总书记。1924年当选法共中央委员、共产国际执委、法国议员。1927年赴中国，参加中共五大。1934年在党内斗争中失势，被开除党籍。二战爆发后，鼓吹法西斯主义，为德国占领军与维希政府服务。1945年2月被击毙。——校对者注

中央委员会的激烈争论

反对派领袖被开除之前夕（1927年10月底），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最后几次会议，真像狂风暴雨一般，使人想起了法国大革命时罗伯斯庇尔在国民公会中发言被阻的情形。现在我们摘录官方出版的公报中最足表现当时情形的几段于下，——不用说，其中谩骂的话是减轻了分量的：

托洛茨基：……在现在的机关底下，在现在的制度底下，工人前卫正遭受压迫……（会场声音愈吵愈高，差不多听不到演说者的话……）被暴发户官僚，连工人官僚在内，所压迫（骚乱，吹唢哨……），被管理者，被小老板，被新业主，被都市和乡村的特权知识分子……

伏罗希洛夫^①：季诺维也夫，你听着，这些侮辱的话！

斯克雷普尼克^②：中央委员会演说不许说这混蛋话！^③

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④：这是孟什维克唐恩在说话！

托洛茨基：……被所有这些分子所压迫，他们举起拳头对着无产阶级说道：“现在不是1918年啊！”这不是打击左派所能决定的，这是整个的政治问题。这是干部的选择，群众的拥护问题。一面压迫工人支部，一面就不能对付富农。这两种办法是不能并立的……（声音愈高起来，吹唢哨）

^① 克利缅特·叶夫列莫维奇·伏罗希洛夫（Климент Ефремович Ворошилов，1881-1969），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后，属布尔什维克。国内战争期间，在乌克兰组织游击队。1919年任乌克兰内务人民委员。1921年至1924年任北高加索军区司令，1923年任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5年11月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26年至1960年当选为政治局委员。1934年任国防人民委员，1935年被授予苏联元帅军衔。1940年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53年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后在与赫鲁晓夫的党内斗争中失利。——校对者注

^② 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斯克雷普尼克（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еевич Скрипник，1872-1933），189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次被捕和流放。1914年是《真理报》编辑部成员。十月革命期间是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1918年任乌克兰苏维埃主席兼外交人民委员。1918年7月任乌克兰契卡主席。1921年任内政人民委员。1923年任乌克兰苏维埃总检察长。1933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兼乌克兰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反对提高粮食征购量，对“镇压”持否定态度。1933年7月7日乌克兰政治局开会要求其悔过，在离开会场后自杀身亡。——校对者注。

^③ 斯克雷普尼克是革命初年著名的战士之一，一开始便忠实于斯大林，他于1933年在乌克兰自杀，当他的在乌克兰的朋友受大规模压迫的时候。

^④ 伊万·伊万诺维奇·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Иван Иванович Скворцов-Степанов，1870-1928），1896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后，属布尔什维克。二月革命后任莫斯科苏维埃委员兼莫斯科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十月革命后任财政人民委员。1918年是“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签署《布列斯特和约》。1918-1924年任《真理报》编委会委员。1921-1925年任俄共（布）中央审计委员会委员。1925-1928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8年10月8日逝世。——校对者注

台下声音：革命的掘坟者！无耻！滚蛋！滚蛋，流氓！打倒叛徒！

托洛茨基：打击左派，要遭遇大多数人抵抗。今天，“你们发财吧！”但明天……

（吵闹，咒骂）从富农得不到一点东西……在官僚们背后兴起了再生的资产阶级……

（吵闹，咒骂，叫喊：滚蛋！）

伏罗希洛夫：够了，无耻！（唢呐，咒骂，愈加骚乱。什么都听不见。主席摇铃。吹唢呐。一些人叫喊：滚下台来！主席停会。托洛茨基同志还在说话，但没有人听清楚一个字。中央委员离开座位，开始分散）

季诺维也夫的演说也没有更受欢迎。

季诺维也夫：最近几年的教训谁也没有忘记。我们所提议的，总之，就是回到列宁的政制去。

台下声音：不要拿来同你的政制混为一谈！

季诺维也夫：没有人要求一个理想的或十全的民主制。时代是困难的，我们明白……

台下声音：滚蛋！滚蛋！

季诺维也夫：再等一刻。（吵闹。主席摇铃）

台下声音：下来！滚蛋！

季诺维也夫：只有两句话。我们现在党内的斗争，总而言之，就是提出两条岔路：或者你们给我们机会能够向党公判并在党内发言，或者你们把我们通通监禁起来。

台下声音：够了！下台来！滚出门去！（在咒骂，叫喊，愈加骚乱之中，季诺维也夫走下演说台来）^①

我这里添加一段插话，为的表示在这样一个政制中，人们为了伪造过去的事实能至何种程度，而这些伪造证据又能达到何种愚蠢。差不多相距十年，在1936年11月21日新西伯利亚审判案中，证人舒宾作证说：

“托洛茨基派和被告施蒂克林（现在是德国盖世太保密探）之同盟，订于1927年，目的在使苏联复辟资本主义，建立一个法西斯政制。这个决议是由一次秘密会议通过的，在莫斯科郊外一个林子中开会，由托洛茨基当主席。”

法庭判决书就是以此为确切不移之证据，来判定这九个人死刑的，其

^① 《真理报》1927年11月2日。

中一个是德国人。六个糊涂虫枪毙了，他们以这样承认了人们叫他们承认的一切的话。

中央委员会会议情形也复演于下层组织，甚至演到街上来。我也曾在受激昂空气震撼的大厅内说话，确切点说，是企图说话。人家攻讦了我们三个钟头以后，只许我们答辩五分钟；而且当我们每个人说话时候，人家又放出五、六、十个“活动分子”来吵闹，他们都是急欲取悦于书记的，到会的群众只是旁观着，消极着，带着某种忧虑；他们常常同情于我们，但是害怕。与我同支部的排字工人对我说：“你懂得，第一，这一行里有人失业；第二，我有几个小孩子。倘使我跟着你们走，而你们不是最有势力的，那我怎么办呢，我，还有这些小孩子？”我们曾经尝试，11月7日庆祝十月革命时候，在党的队伍中示威，喊出我们自己的口号。我几乎在列宁格勒被人撕成碎块，那里，在艾尔米塔什博物馆面前，三百个反对派同民兵打架三个钟头长久，这三百人中有一个前陆军司令拉舍维奇^①和一个前“契卡”主任巴卡耶夫^②。在莫斯科，斯米尔加，他也是前陆军司令，而且是共和国的创立人之一，他在阳台上挂出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肖像，他的住宅立刻被人攻进去，捣毁了。人家在街上对托洛茨基开枪。有两个我们的人企图在红场上展开一面旗帜，立刻被人打倒。党的各级委员会，为了对付我们，组织了几队打手，携带警笛，可以重重打人；他们用大卡车装载着，每逢支部开会，我们发言的时候，就开来援助那些“忠实同志”。在莫斯科，这类法西斯手段是地方委员会书记柳亭^③发起的，这个人虽然

^① 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拉舍维奇（Михаил Михайлович Лашевич，1884-1928），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后，属布尔什维克。先后四次被捕。二月革命后返回莫斯科，之后派赴彼得格勒，在卫戍部队中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十月革命期间，参与彼得格勒武装起义，亲率部队攻占电报局、国家银行等机关。国内战争期间，先后参与了抗击高尔察克、科穆奇、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战斗，历任彼得格勒苏维埃副主席、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西伯利亚军区司令员、陆海军副人民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等职。1925年参加“新反对派”。1927年被开除党籍。1928年悔过。1928年8月31日因病逝世。——校对者注

^② 伊万·彼得罗维奇·巴卡耶夫（Иван Петрович Бакаев，1887-1936），1905年参加革命活动。1906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属布尔什维克。1906年卡梅申武装起义的参与者和组织者之一。起义失败后，转入地下工作，在巴库、阿斯特拉罕、彼得堡工作。多次被捕、流放。十月革命后，曾任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执行委员会委员。国内战争期间，第三师、第二师政委。1919年任彼得格勒契卡主席。1925年参加“新反对派”，1926年参加“联合反对派”。1927年被开除党籍，1928年悔过。1935年1月被捕，判处八年徒刑。1936年8月25日被杀害。——校对者注

^③ 马尔特米扬·尼基京·柳亭（Мартемьян Никитич Рюгин，1890-1937），191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属布尔什维克。国内战争期间，任伊尔库茨克军区司令员，参与了剿灭高尔察克、日本干涉军的战斗。1924年被派往莫斯科，担任地区党委书记。反对斯大林的农业政策，反对党内官僚主义。1930年9月被开除党籍，不久被捕，1931年1月获释。1932年夏发表《斯大林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危机》（即柳亭纲领），指责斯大林已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和列宁主义，是

盲目，却是出于真诚的……

后来得到事实教训，这个柳亭 1932 年自己转到反对派方面来，而且在一个政纲草案中给斯大林——“这个大挑唆家，党的破坏者”——以一些严厉的批语，以至“格伯乌”认为是号召谋杀，而判他死刑，但不敢执行。他现在怎么样呢？没有人知道。

“革命的掘墓人”。1932 年被捕，判处十年徒刑。1937 年 1 月 10 日被杀害。——校对者注

失败，放逐，悔过

我们被打败了，我们的失败丝毫没有打动全国的淡漠。是“热月”吗？不是“热月”吗？^①辩论自然而然地引到这个历史的类比问题；历史进行着自己的道路。

第三国际改变了面目。机会凑巧，集合在国际首脑部的，无例外地，都是负有重大失败责任的人：“想得稳”和“站得稳”的人，他们以消极的服从来避免处罚。好多人现在还是共产国际的指导人物，这种位置此时是养老的位置。最显著的是：库恩·贝拉，匈牙利失败的负责人物，他还做了几件从道德观点看来更加愁惨的事情；库西宁^②，1918年芬兰工人的失败，他负有很大责任，后来曾在一个很有趣味的政治自白中承认过；科拉罗夫^③和季米特洛夫^④，他们两人一连三次在保加利亚领导他们的党走到难以形容的惨败；海因茨·诺伊曼，他在德国失败中达到成熟，为的在广州暴动中显示他的一切手段……

政权和舆论也改变了面目。在格鲁吉亚，投降的孟什维克迫害老布尔什维克。1917年的战士，被驱逐了，被开除了，就要被放逐充军了，此时那些不久之前新转变的人物却扶摇直上，他们在内战时代都是些反革命者，现在则表示热心拥戴新领袖。一个诬蔑列宁是“德国密探”的人——

^①“特尔米多”（热月）是法兰西大革命中革命后退反动抬头的政变。——译者按

^② 奥托·威廉·库西宁（Otto Wilhelm Kuusinen，1884-1964），1904年加入芬兰社会民主党。1908年当选议会议员。1911年任芬兰社会民主党执委主席。参与领导1918年芬兰革命，任教育委员。芬兰苏维埃被颠覆后流亡苏联，此后负责共产国际组织工作。1939年苏芬战争爆发后，被扶持为芬兰民主共和国政府主席。1940年被扶持为卡累利阿-芬兰最高苏维埃主席。1956年卡累利阿-芬兰共和国被苏俄吞并后，任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1964年5月病死于莫斯科。——校对者注

^③ 瓦西里·彼得罗夫·科拉罗夫（Васил Петров Коларов，1877-1950），早年加入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紧密派）。1919年5月参与组建保加利亚共产党，后任保共中央委员会书记。1922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1923年九月暴动失败后流亡苏联。1945年回国，当选保加利亚国民议会主席。1946年任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临时主席。1949年任保共总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校对者注

^④ 格奥尔基·米哈伊洛维奇·季米特洛夫（Георгий Димитров Михайлов，1882-1949），1902年加入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属紧密派。1905年任全国工会同盟中央书记。1919年5月参与组建保加利亚共产党。1923年九月暴动失败后流亡苏联。1933年因“国会纵火案”被捕，1934年被引渡回苏联。1934年4月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书记。1945年回国，任保加利亚共和国总理。1948年任保共中央总书记。1949年7月2日死于苏联。——校对者注

扎斯拉夫斯基^①，现在是《真理报》的一个权威；一个右派社会党人、曾在1918年乌克兰粮食供给中参与怠工的——维辛斯基^②，现在成了最高法院的检察官；萨马拉反革命政府的前委员——迈斯基^③，如今成了外交家，他现今在伦敦；另一个旧时仇敌——欣丘克^④也成了外交家，他现今在柏林。还有那些小人物，很多的，说不尽；在党内旧时碌碌无能的人物现在成了要人，如基洛夫^⑤、古比雪夫^⑥、米高扬^⑦；或者是在伟大的几年中不

^① 大卫·约瑟夫维奇·扎斯拉夫斯基（Давид Иосифович Заславский，1880-1965），1900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属孟什维克。1917年担任孟什维克机关报编辑，宣称列宁“与秘密警察和德国政府有联系，从事间谍活动，意图瓦解军队，破坏国家生产力，愚弄人民，并出卖俄国利益”“列宁和托洛茨基像好战的印度佬那样手舞足蹈”。十月革命后，参加邓尼金白卫军反革命活动，之后宣布退出政治活动。1926年担任《消息报》编辑，1928年担任《真理报》编辑。多次请求入党，为《真理报》党委所拒，后在斯大林的干涉下始于1934年入党。1936年发起反对肖斯塔科维奇的运动，谴责其以“混乱代替音乐”。弗·列宁称其为“卑鄙的扎斯拉夫斯基之流”、“向布尔什维克进攻的好汉”、“进行讹诈的无赖”、“资本家的奴才”。——校对者注

^② 安德烈·亚努阿列维奇·维辛斯基（Андрей Януарьевич Вышинский，1883-1954），1902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属孟什维克。二月革命后，负责追捕布尔什维克党，签发逮捕“德国间谍”列宁的通缉令。十月革命后被捕，不久获释。1920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1935年任总检察长，协助斯大林开展“镇压”行动。1949年任苏联外交部长。斯大林死后，他的法学理论受到批判。1954年死于美国纽约。——校对者注

^③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迈斯基（Иван Михайлович Майский，1884-1975），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属孟什维克。十月革命后反对苏维埃政权，参加制宪会议成员委员会，担任劳工部长。之后又参加西伯利亚临时政府，高尔察克政变后逃往蒙古。1920年回国，1921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1955年因贝利亚案件被判处6年徒刑，不久被赦免。——校对者注

^④ 列夫·米哈伊洛维奇·欣丘克（Лев Михайлович Хинчук，1868-1939），1890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属孟什维克。二月革命后，任莫斯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在1917年11月第二届全俄苏维埃大会上代表孟什维克党发表声明，抗议“布尔什维克政变”，反对十月革命。1920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此后从事外贸工作。1937年任内贸人民委员。1938年10月被捕，1939年3月7日被杀害。弗·列宁在1918年曾评价他说：“欣丘克作为一个思想家是浸透了资产阶级偏见的，……但同时他们也有实际知识……在实际建设方面，他们的知识更多，本事更大，应该向他们学习。”——校对者注

^⑤ 谢尔盖·米罗诺维奇·基洛夫（Сергей Миронович Киров，1886-1934），190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月革命后任弗拉基高加索苏维埃委员，期间靠近孟什维克，支持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转向布尔什维克。国内战争期间，先后担任捷列克苏维埃委员、边疆区临时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第11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南方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等职。1921年任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26年任联共（布）列宁格勒执行委员会主席。1927年任联共（布）列宁格勒省委第一书记。1934年12月1日遇刺身亡，凶手动机成谜。——校对者注

^⑥ 瓦列里安·弗拉基米罗维奇·古比雪夫（Валериан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Куйбышев，1888-1935），190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属布尔什维克。先后七次被捕。二月革命后获释，此后担任萨马拉苏维埃主席。国内战争期间，参加了中亚地区的战斗。1922年当选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1923年当选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苏俄工农检查人民委员。1930年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负责制定了一五计划和二五计划。1935年1月25日去世，死后其家属遭到镇压。——校对者注

^⑦ 阿纳斯塔斯·伊凡诺维奇·米高扬（Анастас Иванович Микоян，1895-1978），1915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属布尔什维克。1918年参与组织巴库公社，公社被颠覆后赴莫斯科。1926年任内外贸人民委员。苏德战争期间任苏联国防委员会委员等职，战后历任部长会议副主席、第一副主席、最高苏维埃主席等职。——校对者注

见经传的人物，如卡冈诺维奇^①。

1928年初，塔斯通讯社向全世界辟谣，说那些认为莫斯科政府放逐被开除的反对派分子的消息，是“诬蔑人的谣言”。这个辟谣之后三天或四天，放逐就开始了。是些什么人呢？最初的囚车装走的：托洛茨基、拉狄克、旧时中央委员会书记普列奥布拉任斯基^②和谢列布里亚科夫^③、伊万·斯米尔诺夫、别洛博罗多夫^④（乌拉尔区真正的革命领袖之一，尼古拉二世一家的死刑命令就是他签字的）、穆拉洛夫、弗拉基米尔·斯米尔诺夫和季莫菲·萨普洛诺夫^⑤（莫斯科暴动的三个英雄）、斯米尔加（内战时最勇敢的一个军长）、拉柯夫斯基^⑥（他在最艰苦的几年支撑着乌克兰）。

^① 拉扎尔·莫伊谢耶维奇·卡冈诺维奇（Лазарь Моисеевич Каганович，1893-1991），191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属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期间任下诺夫哥罗德省苏维埃执委会主席。1922年任中央书记处组织部部长。1925年任乌克兰中央第一书记，1930年任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1935年任运输人民委员。斯大林死后，在与赫鲁晓夫的党内斗争中失势。——校对者注

^② 叶夫根尼·阿列克谢耶维奇·普列奥布拉任斯基（Евгений Алексеевич Преображенский，1886-1937），1902年起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90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属布尔什维克。1905年12月参与莫斯科武装起义，其后多次被捕和流放。1917年3月任赤塔工兵代表苏维埃副主席。1918年是“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签署布列斯特和约。1920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1921年任苏俄财政人民委员。1921年任《共产国际》杂志主编、财政人民委员。1924年任主要特许权委员会副主席。1923年参加“左派反对派”，1927年被开除党籍，1928年被流放，1929年悔过，1930年恢复党籍。1931年与伊万·斯米尔诺夫组织左派反对派地下组织。1933年被开除党籍，后重新入党。1936年被开除党籍。1937年1月被捕，7月13日被杀害。——校对者注

^③ 列昂尼德·彼得罗维奇·谢列布里亚科夫（Леонид Петрович Серебряков，1888-1937），1905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属布尔什维克。二月革命后任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团成员。十月革命期间，参与指挥莫斯科武装起义。国内战争期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书记、南方阵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俄共（布）中央组织部委员、红军政治局局长、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兼组织部委员。1923年参加“左派反对派”，1927年被开除党籍，1928年被流放，1929年悔过，1930年恢复党籍。1936年被开除党籍并被捕，1937年2月1日被杀害。——校对者注

^④ 亚历山大·格奥尔基耶维奇·别洛博罗多夫（Александр Георгиевич Белобородов，1891-1938），190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属布尔什维克。1918年任乌拉尔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参与处决尼古拉二世及其一家，1923年任苏俄内务人民委员。1923年参加“左派反对派”，1927年被开除党籍，1928年被流放，1929年悔过，1930年恢复党籍。1936年被开除党籍并被捕，1938年2月9日被杀害。——校对者注

^⑤ 季莫菲·弗拉基米洛维奇·萨普洛诺夫（Тимофей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Сапронов，1887-1939），1905年参加革命活动，1912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属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期间，任莫斯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参与指挥莫斯科武装起义。国内战争期间，任哈尔科夫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及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参与打击邓尼金的战斗。1921年任苏维埃小人民委员会主席，1923年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1923年参加“左派反对派”，1927年被开除党籍，1928年悔过，1932年被捕，1937年9月28日被杀害。——校对者注

^⑥ 克里斯蒂安·格奥尔基耶维奇·拉柯夫斯基（Христиан Георгиевич Раковский，1873-1941），早年参加保加利亚民族革命活动。1890年前往瑞士，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活动，并和罗莎·卢森堡一起领导马克思主义自学小组。1903年发起成立罗马尼亚社会党，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巴尔干社会民主联盟。一战爆发后，积极参加齐美尔瓦尔德运动。1916年8月被捕，二月革命后获释，赴俄参加布尔什维克党活动。十月革命后，被派赴乌克兰建立苏维埃政权，1919年1月任乌克兰临时工农政府主席，此后任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兼外交人民委员。1923年参加“左派反对派”。1927

在国家高于一切的国度里，失败的革命者的事业，是一个很困难的事业。好多人眼见失败了，就离弃了你。其他的人，威武不能屈和富贵不能移的精神是有的，但认为应当从权，应当适应环境。皮达可夫背弃昨日的信念和昨日的友谊。在那些大使中间，克利斯廷斯基^①、索柯里尼柯夫、安东诺夫-奥弗申柯，也是这样做的。别的人怎么样呢？是到哈萨克斯坦偏僻的小村落居住去呢，还是留着，仍旧奉公，等待机会呢？外交家，即使是革命国家的外交家吧，也是很少能殉道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两人之“悔过”，则是最有影响的。他们谴责自己作反对派时的行为和思想，乞求赦罪，人家要他们如何污辱自己，他们就如何做。

是贪图富贵吗？哪里话！这两个老布尔什维克在他们的政治活动以外没有私人的生活，他们并不重视资产阶级世界所称为地位、幸福的等等东西。是懦夫吗？以后将近十年中他们忍受一种恐怖的生活，而达到一种最令人惶惑的最悲惨的结果。他们的态度杂有一种很大的勇气，一种绝对的忠诚，没有说话也没有动作，一种勇敢不惜蒙受懦夫的丑名，一种忠诚不惜蒙受被耻辱，智力和道德完全堕落的耻辱。他们太爱党了，以致害怕看见真正的现实——党已经完结了。他们在最后的检验之前退怯。他们没有觉得，污辱自己就是污辱革命；没有觉得，即使是骄傲并坚持错误，也无疑比为了好意而给人这样一种坏榜样好些……他们要运用计谋，以为要紧的事情是留在党内，直至决定成败的斗争自己爆发时候，那时受了事变的影响可以改造党。拉狄克当时在流放地斥责这两人的投降说：

“季诺维也夫是整个计策就在这里：党内一定会爆发一个新的浪潮；当爆发之时我们都将被充军了，而他是自由的。但是，将来的结果，却是季诺维也夫自己骗自己。决定问题的，须靠政治观点的正确和应该享有的信任。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罪过，就是在于不明白我们是不能解除武装的，即使是

年被开除党籍并被流放，1935年宣布悔过，恢复党籍。1936年1月被开除党籍并被捕，1938年3月被判20年徒刑，1941年9月11日在狱中被杀害。——校对者注

^①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克利斯廷斯基（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Крестинский，1883-1938），1901年参加革命活动。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属布尔什维克。先后八次被捕，多次流放。二月革命后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叶卡捷琳堡省委主席，1917年6月在领导布尔什维克占多数的叶卡捷琳堡苏维埃完全夺取政权后，任叶卡捷琳堡革命委员会主席。十月革命后，负责财政工作，任财政人民委员。1919年任中央书记处书记。1921年任驻德大使。1923年参加“左派反对派”，1927年参加“联合反对派”。1937年5月被开除党籍并被捕，1938年3月15日被杀害。——校对者注

为了留在党内的好处……”

拉狄克说得好，但几个月之后他的所作所为又恰恰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一样。

拉狄克天生具有一种思维的灵活性，从表面上看是聪明而玩世，绝对忠诚于党，即是说忠诚于工人阶级，而党不过是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他在俄、波、奥、德诸国做革命活动，蹲了无数次牢狱，逃脱过无数次危险，未曾同列宁合作以前已经是罗莎·卢森堡的斗争伴侣，在柏林、不来梅及其他地方。斯巴达克党暴动时，他也在柏林，与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在一处；他有远见，劝人家不要过早行动，但没有用，他与那两大革命家同时被捕，但侥幸没有分担他们的命运：人家不知道他的重要。一个子弹擦过他的身边，在莫阿比特监狱的一个庭院里，他的朋友列奥·梯什科（约吉希斯）^①在那儿被杀害。

这个拉狄克，现在仍是一个囚犯，这次是在苏联，在他悔过以后，——在西伯利亚一个小车站伊沁，遇到了几个比他更坚决的反对派。格伯乌的人包围着他们，是押解他们到各自的流放地去的。我们了得到这次政治谈话的报告。下面就是：

“拉狄克：‘国家的形势是异常危险的。中央委员会更有立即塌台之可能。右派准备叫中派坐牢，中派也准备叫右派坐牢。右派势力很大，他们的十六票能增加两倍或三倍。莫斯科没有面包吃。工人群众的不满有转过来反对苏维埃政制的危险。我们又在农民暴动的前夕了。这一切迫得我们不惜任何代价来恢复党的统一。’

“‘那么你对于列夫·达维多维奇^②是什么态度呢？’

“拉狄克：‘我同他完全绝交。他修正列宁的学说。’

“‘你要求废除第五十八条^③吗？’

^① 列奥·约吉希斯（Leo Jogiches, 1867-1919），1867年出生于立陶宛维尔纽斯。青年时期投身革命，因反对沙皇专制遭迫害，流亡瑞士苏黎世，结识罗莎·卢森堡，成为革命伙伴与恋人。1893年参与组建波·立社会民主党。1905年返回华沙参与俄国革命，组织工人罢工，后被沙皇政府逮捕，但成功逃脱。一战爆发后持国际主义立场，参与组建斯巴达克斯同盟，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号召无产阶级革命。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后，参与创建德国共产党。1919年1月，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在柏林起义失败后被杀害，继续秘密领导德共，同年3月被捕并被杀害。——校对者注

^② 即托洛茨基。

^③ 放逐反对派，就是根据这一条刑法。

“拉狄克：‘绝不！对于跟我们一路走的人，那是当然的。对于那些激动群众怨望的人，则我们仍保留第五十八条。流放和坐牢都是我们自作孽。加入反对派的青年人，与布尔什维克毫无共同之点，他们是反苏维埃的。’

“拉狄克还说：‘反对派的政纲已经成了党的政纲，五年计划就是证据。’格伯乌人员打断了我们的辩论。他们把拉狄克推进一个车箱，一面责备他鼓动别人反对驱逐托洛茨基出国。拉狄克在车箱走廊里还叫喊说：

“‘我吗？我鼓动反对驱逐托洛茨基出国吗？哈，哈，哈，我是向这些同志解释，教他们应该回到党来。’

“他于是恳求格伯乌人员说：

“‘不要再骚扰他们了！让他们有时间反省一下吧！不要刺激他们了！’

“格伯乌人员一声不响地把他直推到车箱尽头。列车就开动了。”

格伯乌人员便是如此这般一声不响地把拉狄克推了九年，一直推到他现在的监房里，地窖刑场上面第几层楼的房里。

……与此同时，我也被参加了八年的党开除了。人家既然寻不出我违犯党纪的罪名，监察委员会便传我去，问我是不是赞成第十五次大会开除反对派的决议案。我声明，在这点上，同在其他各点上一样，我是服从党的纪律的，但并不赞成这个决议案，而且认为这个决议案是一种可痛心的错误，将来难于补救的。

委员会约有十个人，大家都显出惊愕的形色；一个女工模样的委员站起来，有点怀疑没有听清楚，用严重的声音问我说：

“你说什么，同志，你说党代会做错了吗？你以为党代会能够做错事吗？”

我解释说：“凡是人都是会做错事的，大家都看过诸多工人政党犯下了许多的错误以至于没有好结果。”我每说一句话，便加重一分我的邪魔歪道。我当场被开除党籍。

几天之后，某晚，将近半夜，两个汉子来敲我的门，一个穿制服，一个穿便衣。他们搜去了我和巴比塞的来往信札，还有一篇列宁的文章，他们认为这是可疑的，叫我跟他们去。我在列宁格勒旧监狱的监房里度过了六个星期，同房的是一个工程师，被控告盗卖涅瓦河中几个立方公尺的冰，

此外还有一个神秘的疯人，有密探嫌疑，因为他本是波兰人。这是一个穷光蛋，脏得可怕，常常几个钟头跪在水泥地上祈祷；他是在一个公墓附近卖小十字架时被人发现的，这事被人认为很严重。那个每天早晨分发淡茶给我们的小伙子，某夜不见了，被枪毙了。隔壁监房的一个人，从第五层楼走廊跳下地面石板，自杀了，他是个商人，被告走私，显然是一个精神脆弱的人。实在说，我们那时还是比较温和的时代。我的外国朋友救我出狱。但以后我就没有好日子过了。被党开除，等于被宣布为“人民公敌”。

那么，大家明白：一个“人民公敌”是无法发表著作或论文的；他的一举一动，他的通信，他的说话，他的关系，受人监视；没有人帮助他谋生，人们甚至还妨害他谋生，他做工时候，工钱尽可能给的少点，若是环境允许时甚至不给工钱；那些加入协会的作家在食物缺乏分配口粮时，可以分得奶酪、杏饼、香肠，以及党委员会秘密储备的其他食品，至于这个危险的非附和主义者，则人家不肯给的或给的尽可能地少。你明白，他的女人，他的姨妹，他的妻子，他的岳父，他的堂兄弟和表兄弟，以及从兄弟再从兄弟，稍微同他有来往，就要惹起种种的麻烦，甚至于很重大的麻烦。这样一年又一年，对于这个极权社会的结构我也获得了一种深刻的认识。直到有一天，——这次是在街上了，——两个行路很特别的公民，请我随他们去。这时代没有以前那般温和了，我没有上次那般容易出来了，但这是另一段历史，而且更无趣味得多了。

从列宁到斯大林

一切都变了。

目的：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到一国建成社会主义。

政治制度：从革命初年所肯定的苏维埃工人民主制，到总书记—官僚—格伯乌专政。

党：从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有思想能活动的自由纪律组织，到利害结合的和消极服从的官僚等级制。

第三国际：从伟大的几年宣传和斗争的机关，到各国中央委员会的奴颜婢膝，——这些委员会是任命来赞成一切的，而且毫不逆心，毫不羞耻。

失败：从德国和匈牙利失败时英勇就义的古斯塔夫·兰道尔^①、欧根·列维涅、卡尔·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列奥·约吉希斯、奥托·科尔文，到广州公社悲惨的屠杀。

领导者：十月时最伟大的战斗员都充军或坐牢了。从列宁到斯大林。

思想：列宁说过：“我们将看见国家的逐步消亡；苏维埃国家并非一个国家，像其他国家一样，而是劳动者的一个广大的公社……”斯大林则宣告说：“高度发展国家政权是为了给国家政权的消灭准备条件。”

劳动者的生活条件：苏维埃社会从平等制走到形成享受特权的少数人，他们的特权一天比一天增加，同时群众一天比一天丧失权利。

道德：从当时布尔什维主义的严肃到过于苛刻的诚实，到现在渐渐走到一种无以为名的伪诈。

一切都改变了，一切都在改变，但我们需要从时间上倒退回去，只为

^① 古斯塔夫·兰道尔（Gustav Landauer, 1870-1919），1870年出生于德国卡尔斯鲁厄。早年受尼采、普鲁东、克鲁泡特金影响，形成反权威、反国家的无政府主义倾向，之后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一战中坚持和平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立场。1919年4月参加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任公众教育和启蒙人民委员。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被颠覆后被捕入狱，1919年5月2日就义。——校对者注

的理解现实。对于制度太多关心，对于人类太多幻想，对于土地、国家和逝者太多爱恋，对于既往大事太多纪念，以致我们所有的人都看不清楚现实，或多或少迷失了双眼。

这里表明出：道德上的表现往往比那建立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判断更有真实的价值。政治和经济是无限复杂的，容许统计和口号来扯谎。这方面，人们常常看不清楚，即使借助于好多的科学也不容易看清楚。他方面，卑鄙、偏私、倾陷、侮辱人格和在党内讨论时采用下流手段，——这些则直接显露原形。有些人说：“政治第一！让它把我们关到牢里吧，只要它实行的是正确的政策！”说这话的人犯了重大的错误。

说什么为了目的不择手段，——这话不是正确的，这话是百倍的错误。人们不能以不义来行义，不能以枷锁，以欺人大话，以金钱雇用的愚民机关来改变世界和人类。每种目的都有其适应的手段，只有用这种手段才能达到这种目的。社会主义革命，即使在危险的时候可以使用资产阶级社会遗留下来的旧武器，那在此之后它也有独属它自己的方法。它只能在贫苦群众物质的和精神的条件之下，向前进步。加多点舒适生活，加多点自由，减少点说谎，加多点人格。社会主义若不是这样做，便要让位于国内的反革命，便要丧失信用而至于自杀。

1928年使我们急转直下走入到那种社会主义中。在这个转变基础上的经济因素，显然具有着决定的作用。但这个转变并非是必然不可避免的；恰好相反，苏维埃制度几年的实验有一个宝贵之点，即是它表明：人支配经济。但又表明：人逃不脱一种政治的影响。试将事实的因果的相互关系整理一下吧。

党的机关，从政治局说起吧——那是一个真正的最高政权机关——虚耗了许多年头不肯去实行工业化。在许多年头中让富农坐大起来。为的不肯对反对派让步并为的保持政权，党的机关竟拒绝那些赞成加速工业化的人的提议，并放逐那些主张对富农强募公债的人（这个办法其实有显然的利益）。

他们砍下了旧党的头，但第二天，政府就没有粮食了。在如此不利的条件之下，农民为什么要卖小麦给政府呢？城市快没有面包了。军队亦然。斯大林在一条断头巷里徘徊。（莫斯科人很幽默地互相问道：你知道城里

有条斯大林断头巷吗？——不知道，在哪里呢？——看呀，克里姆林宫就是！)

从农民那买不到麦子，必须用武力去夺来，政治局出人意外地根据刑法第一百零七条关于私囤货品之条文下命令到农村征粮。

被征发的麦子藏起来了。农民播种得少些。既然收获的东西，人家要强夺去，那还播什么种呢？

为的使农民工作，人们便强迫农民加入那由国家监督的一种合作社——集体农庄。不肯加入的怎么样呢？

不肯加入的，便要宣布为富农或富农走狗，所有东西都要被没收而且连家眷一起要被人押往北方去。

好多人不肯加入。当部分的集体化成功时，人们看出独立农民显然比加入集体农场的农民更加有利。此时只好宣布全盘集体化——这正是巴比塞和其他好多人所热烈赞美的——和没收并流放成群的富农了。这样一来，农民中有几百万人被没收财产。

为着紧急救济农业中这种破产，必须实行最快速度的工业化。五年计划修改又修改使得产生出六个月以前不敢梦想的效果，这计划如今是热烈地执行了。

这计划一定要执行的。但农村恐慌——有些地方竟转变为显然的内战——最初受其害的就是城市挨饿。人们慌忙印出粮票。人们不久就要分给工人以有名无实的口粮了。根据张贴在莫斯科的布告，加入合作社的劳动者，1929年11月每月最高口粮规定如下：

糖	1500 克
茶叶	50 克
植物油	500 克
精制麦粉	3000 克
通心粉	750 克
鲑鱼	500 克
家用肥皂	500 克

首都享特权的无产阶级每人的口粮也不过如此。

劳动者口粮不足减低了劳动的效率。配给制、强制汇率及通货膨胀，减低了纸卢布——发工资的就是这种卢布！——的购买力至1926年的四十分之一。工人逃离工厂，或只形式上在工厂内，他们依靠做小贩为生。卖出一双旧袜，所得的比做三天工还多些。那时须得颁布严厉的法律强制工人作工。为使工人固定于产业中心起见，人们发行国内护照制，剥夺了人民自由迁徙的权利，而且可以随心所欲地将人充军，不必宣布什么理由。

农民未加入集体农庄之前，就屠杀自己的牲畜。一生至少有这一次吃饱了肉，而且暗中可以卖去兽皮，这比将牲畜送给国家要好些，国家的好办法大家都领教过的。牲畜消失了。

这几年好比一场噩梦。在乌克兰，在黑土带，在西伯利亚，在其他产麦最多的地方，都发生了饥荒。成千成万的农民偷越国境，到波兰、罗马尼亚、波斯和中国去。他们逃亡了。其中一些人在试图偷渡国境时被杀死，其他的逃亡更多。

城市和乡村不断地执行死刑。偷了集体农场一捆麦子：死刑。根据1932年8月7日的政府命令，社会主义财产是神圣的，偷盗者应处以死刑。在这乱世，五年计划能给出什么呢？人家要求人民努力和牺牲，答应付予人民以一种丰饶的时代。可是计划实行的第五年正是大饥荒之年！什么人负责呢？把负责的人找出来，枪毙他！

在这几年内，斯大林，这个万能的人，一声不响了（直至1933年底）。

至于负责的人，那只须用电话命令格伯乌去寻找就够了。格伯乌当晚就捕到人了，这些人明天就供认了，后天就可以枪毙了。然后呢？然后就是等待世界各国打来的电报，表示热烈拥护、钦佩信任和庆贺社会主义建设成功。

没有罐头和腊肉吗？那就把卡拉蒂金教授^①及他的四十七个同案被告枪毙得了。他们供认了，以反革命的精神破坏了罐头和腊肉的制造（1930

^① 叶夫根尼·谢尔盖耶维奇·卡拉蒂金（Евгений Сергеевич Каратыгин，1872-1930），1872年毕业于圣彼得堡理工学院，后就职于农业贸易部、财政部，编辑《乳制品经济》、《乡村》、《农民经济》等杂志。十月革命后，曾任苏联最高经济委员会农业部主席、农村工业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席。1930年8月被捕，9月24日被杀害。——校对者注

年)。

计划失败了吗？这是因为有个秘密的“工业党”在怠工，这党与法国参谋部合作。拉姆辛教授^①（一个密探）供认了。他被判死刑，旋即被赦免，恢复权利并得到酬报（1930年）。

人民不相信吗？九个老社会主义者自承奉行社会主义国际的训令准备法国对苏联的军事干涉。这训令是莫须有的，而被告是分明的说谎，——但这有什么相干呢？他们承认了。十年的徒刑（1931年）。

列宁格勒有一年夏天没有水果和蔬菜……于是乎，五个合作社经理被枪毙了。但以后几年夏天仍旧是没有水果和蔬菜……

这种政制显然是没有人愿意拥护的，除非是奉了命令，或者是造成这政制的人员，他们若是失了政权，一定会给人撕碎成块。罪责的重大使得官僚们铁面无情，倒行逆施。他们是在自卫。他们的整个政策，自从篡夺了政权以来，不过是保守的和受一种慌乱的恐惧所支配的。

斯大林的官僚政制不再实行工人阶级的政治了，而是实行自己的政治。这便是既成事实之根本的解释。

从此，谁敢发一言反对这个官僚政制，谁就有祸了。每年在纪念节或什么会议之前夕，总要逮捕几千反对派。真正的反对派，几千人，自从1928年，就已关在监牢内了，这是不待言的。谁一声不响的，谁也有祸了！一声不响，这就是逃避与推卸那重压的罪责。不，无论如何，每个公民都应该高声赞成一切，一切，一切，一切。无论什么决议都是一致通过的，死刑判决书亦然。诗人们用诗句在报纸上说明他们投赞成票的理由。

对于外国社会主义者是没有期望的。他们了解得太透彻了。人家而且只能以一种半是真正盲目半是假装盲目的革命热情来替那正在成就的事情做辩护，共产国际在1928年宣告说：“德国、法国和波兰，已经进入革命暴动的时代……。”多里奥号召农民准备“以枪杆子夺取土地”。阶级

^① 列昂尼德·康斯坦丁诺维奇·拉姆辛（Леонид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Рамзин，1887-1948），20年代曾在苏联国家电气化委员会、国家计划委员会、最高经济委员会任职。1930年被捕，被判处死刑，后改判10年徒刑。1936年获赦出狱。1948年6月28日逝世。——校对者注

对抗阶级！在纳粹狂潮涌起的德国，共产国际的正式理论是说：只能越过社会民主党的尸体去同法西斯作战。1932年，当纳粹党求得普鲁士全民投票以推翻社会民主党奥托·布劳恩^①内阁的政权时，德国共产党奉行斯大林个人建议，竟与纳粹党联合，因之《红旗报》宣称这次选举为“红色的全民投票”。

我所叙述的，都是我所亲历的。但我宁愿引用一些未刊的或罕见的文件，我能确证其绝对真实。^②而且没有一个人能否认其中的一行字。

^① 奥托·布劳恩 (Otto Braun, 1872-1955), 1872年出生于东普鲁士柯尼斯堡。早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属党内温和改良派，反对革命社会主义。1913年当选为普鲁士众议院议员。一战期间鼓吹“国内和平政策”，要求暂停阶级斗争以支持战争。1919年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1920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920-1932年间三次出任普鲁士邦总理，1932年7月普鲁士政变后下台。纳粹党上台后流亡瑞士，1955年死于瑞士。——校对者注

^② 读者如果要深究这些问题，请参考不久要出版的我的一本书《一个革命的命运》。

工业化和集体化

一个集体农庄的生活：

“集体农庄的成员已经两个月没领到他们的劳动报酬了，他们的工作包括运输木材和草料。收入的50%归入集体农庄的公库，50%用于缴纳税费和偿还贷款。剩下的部分归劳动者所有吗？没有人知道。主任每月自领好多张面粉票，但一点体力劳动都不肯做。人家告诉我们：‘头几个月，集体农庄的成员必须靠自己过活。’可是穷人并没有储蓄金。他们的衣服因为做工破损了，没有得到赔偿。这一切都使得富农的话有人相信，富农说人们在创立一种‘新农奴制’。

“在邻近一个乡村中，四十名妇女强行夺回了她们的奶牛，把它们藏在屋子内，回答村苏维埃当权人说：‘你们可以开枪打死我，但那些牲畜我们不肯再给你们的。’然而，牲畜还是被偷走了……很难相信这些暴行是以社会主义的名义进行的。传闻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流放到外省去了……”（M.R.来信，1930年4月）

1930年3月，斯大林允许一定数目的农民退出集体农庄。他在讲话中责备地方当局“被胜利冲昏了头脑”……

“集体农庄的人都走空了。某村八十个农民今天来向检察官控诉，说他们是被暴力强迫加入集体农庄的。一些集体农庄主任在附近被人暗杀了。女人们到处来索取并拿回牲畜……城市没有黄油、肉类、鸡蛋和马铃薯，连首都也只能发极微少的口粮。长久以来，我们就没有看见肉和鱼了。最近几天，合作社总算拿到了一些马肉香肠。”（Q.N.来信，1930年4月）

在工厂，一个工人写信来说：

“他们拧紧了螺旋来压榨我们！如何压榨的呢？他们把劳动生产率提高25%，而工资却只增加1.9%。并且已经有三年工资未曾改变了。虽然生产量增加了好多，——五人一队代替六人一队，设备却没有更新。储金制度实行到如此程度，即每月只发20%至30%的工资，其余的作为储金半年发一次。事实上这是没有领取的希望了的。我们每月只能靠着五十个卢布过活……”（M.来信，1930年3月23日）

关于中亚地区的集体化：

“‘农民们只能预支少数，利益的分配须待年底。集体农庄若是赚钱的，则一般须待

添加于集体资金的数目超过工资总数后方才发给工资。否则庄员工资须照定额折扣发给。’（见乌兹别克斯坦集体农庄中央机关章程）农民如此被强迫加入集体农庄，自然没有什么劳动积极性。

“……农民们以出卖财产、怠工和反抗，来回答这种强迫手段。一种规模颇大的反抗运动，爆发于锡尔河流域，三个星期之后才被压平……”

“……农民们很聪明地说：‘军队吃得好，穿得好，是不会赞助我们的……’”（LL. 来信，1930年3月27日）

另一个同志写信来说：两百匹没有人要的马，在他的流放地的乡村周围游荡着。农村中所见的，只有反抗、暗杀、愤怒和失望的表现，成群的放逐和迁移。高加索南部的阿布哈兹人写一张呈文给政府，把所有财产献给政府，以东方式的礼节感谢政府赐予他们的恩典，他们只要求一件事：即准许他们移居土耳其。

“一个美国通信员，很忠诚于斯大林，曾估量1929-1930年间被充军和流放者约有两百万人（见纽约《泰晤士报》）。但若知道消灭富农运动，以后几年还不停地继续着，而官厅计算富农数目在五百万到一千万之间，那便可知事实上还不止如美国通信员所估计的哩（第一次五年计划完成之后不久，罗斯托夫地方报纸无意中泄露出库班三个哥萨克区共被流放了五万人；可是同一地域已有十万人比他们先走上北方不幸的道路了）。所以我们可以断定，至少有五百万农村居民，连男女老少都算在内，离家背井去过那难堪的贫困生活，好多人因此死亡。”（苏瓦林《斯大林传》第480页）

一个被流放西伯利亚的人写信来说：

“我要叙述我在一区所见的‘消灭富农’的情形。我们看见三千个被流放的富农到来。其中有好多是贫农或中农。有些人因在内战中的勇敢而领有勋章，此时当然被人剥夺了。照计划规定，他们应当做伐木工作。但这里却什么都没有准备好。大家挤住在木板屋中很快就引起了伤寒传染病。住在森林中的还更坏些。我不晓得，为什么在严寒冬天，没有御寒衣服，派他们连同妻子都到那里去……他们准备了一个大暴动，在老兵的带领下。我们求得当局取消了派遣他们进森林去的命令，以此阻止了这个新的灾难……”

“这一切很像一种绝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怠工……”

“有一个朋友到过好几个集体农庄，他对我说：不久以前的农村现在全然改观了，若没有极大的骚乱变动是无法回到个人私产制去的。大约有15%的农民是热心于集体农

庄。他们是青年共产党人，他们什么都做，他们的劳动超出人类力量以上。其他的农民则是不得不加入集体农庄的，他们故意弄得两手空空然后加入。他们说：‘从此以后就是国家的农民了，同工人一样……’”（X来信，1931年8月5日）

贫农也被人视为仇敌：

“人家进行清除贫农团体的工作。邻近一个苏维埃刚开除了二十个贫农，指斥其为‘富农走狗’，其中好多人是诚心忠实于苏维埃政权的。他们的罪过就是不肯缄口，就是时常爱说他们的地位一天比一天不好，爱发问：还有一个五年计划吗？（报告者说，提出这个问题，就是替富农说话）”^①

关于这种俄国农村悲剧，现有一个文学的文件，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一个替官僚歌功颂德的人的著作，肖洛霍夫著的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有法文译本。

为使官僚政治的错误和罪过不归社会主义负责起见，这里必须略微谈一点理论。社会主义并不主张如此待遇农民，恰好相反，是反对这种待遇的。社会主义对于农民应采取其他的态度；未来的无产阶级政党将从俄国的经验中吸取教训不至跟随着做的。（反之，替金融资本服务的法西斯官僚政治，为势所迫，当粮食恐慌时对于农村小业主亦能采取斯大林方法……）

列宁三番五次地说：“不要强迫农民……”，布尔什维克建立的国家自称为“工农国”：这是它的正式的名称。列宁一面主张反对农村资产阶级，同反对其他一切资产阶级一样，一面又使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决议不立即于夺得政权之后没收他们财产。^②他说：“恩格斯曾强调过，社会主义者并不想剥夺小农的财产，而是试图通过事实教训让他们明白社会主义机械化农业的优势。”^③此外，在他的关于新经济政策诸重要演说之一篇中，也将新经济政策看作一种与农民相协调的政策，他说：“专政的最高原则就是维护无产阶级同农民的联盟，使无产阶级能够保持领导作用和国家政

^① 在巴黎用俄文出版的《反对派公报》发表过很多这一类的来信。

^② 见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农民问题大纲。

^③ 恩格斯的原语为：见

权。”^①

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又名《苏联的现状及其前途》)中,曾指出,由于主观或客观的无能,集体化之中有手忙脚乱的动作。在宣告全盘集体化之前几个月,政治局还认为集体化是遥远的工程哩!托洛茨基在君士坦丁堡放逐地不断地对于他认为一种“不祥的经济冒险”提出严厉的抗议。他用挖苦的口吻说:人家用几百只甚至几千只小渔船不能合成一只横渡大西洋的轮船,同样,人家也不能强迫小农们将他们的犁、牛、鸡等临时合成一个大农业经济。真正的社会主义集体化应当以机械耕种和合理农学之明显的利益昭示农民使之心服。

可是,你要当心,切勿在苏联提起马克思主义这些基本真理,否则人们要把你烹食了。

我们再呼吸一点俄国空气吧。1933年4月一封莫斯科的来信,其中有一段说:

“一个有五六百工人的印刷厂刚发生罢工。原因:当因缺乏纸料而强迫停止工作时,工人只领到75%的工资;而且合作社供给的食物又是很坏的。共产党员也停止了工作;监察委员会将审判他们的。好多职员立刻被免职了,工人的要求得到了满足;三个‘煽动者’则被捉去坐牢。

“……因为实行国内护照制,发生了大恐慌。大约30%的居民领不到居留莫斯科的护照,且有命令限定他们于5月1日离开莫斯科。其中有好多是以前的反对派。

“……去年冬季同1919年冬季一样艰苦。伤寒病猖狂得很。在那些小车站,病人被抛弃的,在那里喂虱子。某些地方被宣布为伤寒病区,铁路上不肯卖车票。高加索北部和中亚地区就是这样,那里不仅有伤寒,还有骚乱,且发生地方性的内战。”

“……一个共产党作家这几天对我说:‘我为什么不再写作了呢?现在要我写什么呢?我正等待着机会被派送到帕米尔去或坐破冰船到北极去。这个时代能做的顶多如此。’”

在同一时期乌克兰的景象:

“哈尔科夫城显然扩大了,好多的新工业和好多的新合作社房屋。却有几万人晚上没有亮光,而且差不多没有柴火。城内好几区没有电气。电影院关门了,住宅是漆黑的。

^① 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的演说,1921年7月。

如此有几个星期长久。没有火油，没有蜡烛，是绝对的黑暗。那些官僚是唯一备有拙劣火油灯的。没有火油，虽然巴库油井的产量是增加了。没有电气，虽然第聂伯河水电站已经完工了。这是很令人不快的。其他城市也是这个情形。人们生活得同牲畜一般。生产和消费差异太大了。用的机器愈多，人们的生活不仅没有更好，而且更坏。

“我见过第聂伯水电站。说实话，这是人类智慧和力量造成的一个伟大工程。像玩具一样，庞大，整洁，光耀而美观。已完工的四大部分，有三大部分是没有活动的，因为依赖它们供给电力的工厂，此时尚未存在。依照计划，你此时已算得到电气享用了！而且即使电气工厂是整齐而雅洁的，但工人住宅则不是这个样子。报纸屡次说过，那里一个乡村已经变成一个七万人口的城市了。报上描写这座城市的俱乐部，并印出工人住宅的照片。是说谎吗？不是，这一切都是有的。不过人们没有说到的，就是只有极少数的人能生活在可忍受的环境内。其他的人则拥挤在木板屋中，黑暗、污秽、寒冷和营养不足。他们皱起了面孔，看见的人觉得他们有许多不满和许多失望。这是不会支持长久的……”

“……列宁曾宣战过的那些虱子，又成群地回来了。一群群生虱子的人塞满了车站，男人、女人、小孩子，一堆一堆的等待了好几周，天知道在等待什么火车。人家赶走他们，他们又回来了，没有钱，没有车票。他们坐上无论到哪里去的火车，他们旅行，直到被驱逐下车为止。他们是默不出声，毫不动情的。他们到哪里去呢？去找面包、马铃薯，或者比较能吃得饱的工厂工作……面包是这些群众的最大动力。他们什么都偷，什么地方都偷……”

“当权的人要求乐观主义。他们提出来的动议总是一致通过的。十个共产党员中有八个满存疑惑，但仍旧投票赞成。若有人责问他们，他们就回答说：‘要我瘐死于西伯利亚，有什么用处呢？’”

“一个投降者又被捕了，他的女人对我说她问侦查官的话：‘你为什么陷害他呢？他好久就已放弃一切反对派的活动了，他极努力的做工……’格伯乌人员不回答她，只劝她离婚……”

一封 1933 年 2 月的来信，关于压迫的，节录几段如下：

“基洛夫在列宁格勒对党内积极分子说：‘我们是铁面无情的，不仅对于做反革命事业的共产党员（即反对派）如此，对于在工厂及农村内做事缺乏毅力不能执行计划的共产党员亦然。已经有四百个党员被放逐到索洛维茨基群岛上了。’”

“……右派分子继续被捕。人们刚逮捕了一大批的农业委员会的官吏，控告其怠工

破坏。好多人是政府大员。农业副人民委员康纳尔^①及委员沃尔夫^②和科瓦爾斯基^③，据说这是这一阴谋的主谋。人家控告他们私通在波兰的乌克兰国家主义者。农业委员会里有叛徒存在，这是可能的，但这个罪状似乎是随意杂凑的故事。康纳尔本是加利西亚人，大战时就加入布尔什维克派，参加国内战争，好像几年以前曾同情于左派反对派……没有人会相信这些控告的罪状。所有人都清楚：领袖需要一场‘农业破坏分子公审’来杀鸡儆猴……”

并没有什么大狱。康纳尔、科瓦爾斯基、沃尔夫和三十二个农业干部和农学家，都于1933年3月初在莫斯科枪毙了，没有经过审判。

^①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康纳尔（Фёдор Михайлович Конар, 1895-1933），1912年加入乌克兰社会民主党，1913年担任加利西亚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1920年作为乌克兰社会革命党左翼代表，加入乌克兰共产党，任加利西亚组织委员会委员。1930年任苏联农业副人民委员。1933年1月被捕，同年3月12日被杀害。——校对者注

^② 莫伊塞·米哈伊洛维奇·沃尔夫（Моисей Михайлович Вольф, 1880-1933），早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属孟什维克派，多次被捕。1901年毕业于高尔基农业学校。1909-1919年任职于哈尔科夫农业站。1920年加入乌克兰共产党，任乌克兰苏维埃农业副人民委员。1928年任苏联国营农场副人民委员、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29年任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副院长。1930年被捕，不久获释。1933年1月再次被捕，同年3月12日被杀害。——校对者注

^③ 米哈伊尔·叶菲莫维奇·科瓦爾斯基（Михаил Ефимович Коварский, 1899-1933），1922年毕业于哈尔科夫技术学院，曾任莫斯科拖拉机技术中心副主任。1932年加入联共（布）党，同年12月被捕。1933年3月12日被杀害。——校对者注

被放逐者的生活

我们现在来到大压迫时代了。自从执政者的选举须依赖格伯乌帮助那一起，政制便完全建立在压迫手段上面了。从此以后关于思想或言论自由，便没有什么话可说。各党各派的社会主义者，毫无例外地都在牢内或在流放之中。一切工团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亦然。各派反对派的共产主义者亦然。御用的思想不容许丝毫的非难。我们是在1930年。从这时就开始流放嫌疑分子了。那些老人离开了一切政治活动已有十多年了，只因曾是社会主义者，或无政府主义者，或反对派的共产主义者，便于晚上突然失踪，经过好几个月之后，人家才打听到他们已经押解到伯朝拉集中营里或流放到叶尼塞河大荒原。

政治异端的嫌疑，党内特别的多。一句不巧的话，一句吞吞吐吐的话，一个迟疑不决的行动（即使是好多年以前的，但只要被告发者想起来了），或者一个不做声，——就够资格了。人失踪了。监狱充满了嫌疑分子。四千至五千反对派于1928-1929年被捕。嫌疑的则更多些。1934年以及基洛夫被列宁格勒一个青年党员暗杀之后，嫌疑分子（共产党员或其他人）则有几万或甚至几十万人成了囚徒。有了这些享受不到劳动法保护的囚犯劳动力，人们可以去开凿几条运河，兴筑几条战略上重要的道路！几十万犯人在沟通波罗的海和白海的运河上工作。死了多少呢？御用的作家们永不肯告诉我们的。

苏联有着世界上最大的集中营，占据整个地区，譬如：索洛维茨基集中营（白海）、卡拉干达集中营（中亚）、伯朝拉河口集中营，到处都有。苦役、无期监、荒地开垦场、矿山、地洞、模范工厂，以及好看的反省院。（为夸示外国游客而设的，——事实上，使刑事罪犯悔过有什么用呢？你若能给无家可归的窃贼和徘徊马路的妓女以充足报偿的工作，以良好的住所和有益的游戏，则你十次有九次可以得到预期的效果，很简单地，他们倘若永远能生活于可满意的条件，他们当初就不会偷窃了）但政治犯，则是人们所见不到的。那些反抗的，并以绝食手段来保卫自己人格（这是他们在人间所仅有的东西）以至于死的，则是人们永远看不见的。

读者若想更确切知道苏维埃社会生活这一重大的方面，则请阅读我即

将出版的另一部著作《一个革命的命运》。我在此仅摘录几份真实档案，管窥残酷现实的一角：

“中央委员会更加恐慌了，他们的应付手段就是迫害我们。字典上找不到适当的字来形容压迫的程度……成群的逮捕。只因说一句话就被人解释为同情于反对派，就被捕了；在工厂开自我批评会时说了几句话，也被捕了。数百名非党工人被指控参与反对派活动，关押在布蒂尔卡监狱中；好多人流放了，新的人又到来。挑衅的手段去年本很发展，如今更发展到登峰造极。监狱中有派来的密探，流放地也有，到处都有。在流放地的，所奉的特别使命就是使流放的人精神堕落，教某些人投降，同时又密告某些人于当局，说他们是怙恶不悛的，必须移送别地方去，或禁闭起来……流放者不断受检查、逮捕、移送，等等……没有止境的，没有穷止的。”（莫斯科来信，1930年5月5日）

自然，这“占世界六分之一”的地方到处是如此。

“哈尔科夫，1930年8月3日。在我们这里，一切同过去一样：逮捕、监禁、流放，对于我们；一致赞成的大会，对于官僚们……人们刚捉了不少的人去。机器工厂的波格丹诺夫无论党如何干涉，终被工人选为工厂委员会主席；于是，格伯乌带着第五十八条条来了，问题就此解决了。”

摘自一封来自中亚地区的信，1930年8月：

“我们的教父（按指格伯乌）正在为第十六次党大会做准备：这不过是夜间拜访、搜查、逮捕、移送。阿沃扬，流放在布哈拉，现在被送往上乌拉尔斯克去了；反之，玛利亚·越飞^①则移到布哈拉了。在卢布佐夫地方，十个朋友有五个被关起来；三个人于7月中旬在流放于克孜勒奥尔达时被捕；六个流放者被关在卡札林斯克。从比斯克、坎斯克、希姆肯特、奥伦堡、阿拉木图、鄂木斯克、托木斯克、斯拉夫戈罗德等处来的消息，也与此相类。每一步都有特派的密探。谁也没有工作做。每个月生活费只有格伯乌给的十五个卢布，但最低限度的生活需要六十卢布。但我们依然坚韧。

“当局欲除之而后快的流放者，被不停辗转于各个穷乡僻壤之间，剥夺工作权利，经年累月遭受折磨。

^① 玛利亚·米哈伊洛夫娜·越飞（Мария Михайловна Иоффе，1896-1989），1917年为布尔什维克报纸《工兵报》的记者，曾任人民委员会新闻局秘书和列·托洛茨基的速记员，参加国家出版社工作。1918年与阿道夫·越飞结婚。1929年因抗议驱逐托洛茨基，于同年4月29日被捕，此后在集中营度过了28年，1957年获释。1975年离开苏联，此后定居于以色列。——校对者注

“大会前夕，被认为太过坚决的反对派，好多人被移送到最龌龊的角落去。尼娜·斯特恩从乌拉尔斯克被移到卡拉图贝，在那里她有饿死的危险，而且是瘟疫流行的地方。我们中的一个，到了土里库尔，看见好多的朋友。其中有几个人刚投降了，因为他们的肉体已衰惫到再不能抵抗下去。我们现在好像是些耗子给猫在玩弄着一样。但这绝非认输的理由，更不该愚蠢地推论说：猫是世界上最有力量的……”

“T同志过了两年的流放生活，终于屈服了。这是无可奈何的，——他说。他写信给我说：‘我是一个残疾人，我的神经是有病的，我胃中溃脓，又有败血病（牢里得到的），——这便是我的投降的主要原因，虽然我的悲观情绪也有所推波助澜。’这里的工人是很懊恼的：物价昂贵了，生活品匮乏。银币之消失是有很大意义的……”

屈服，投降，这就是说：放弃思想，依照人们给你的格式发表宣言，拥护并颂赞“天才领袖的总路线”……这就是说：把自己交给当局去监督，去摆布，去差遣做侦探，去告发他人，——尚在反抗的更坚决的同志。屈服之后还相当保持人格，这不是容易的事，那时要被人列入于双重的嫌疑人物之内……一个屈服的人写信来说：

“人家容许我在工厂做工，但我每月只赚五十个卢布。委员会两次拒绝恢复我的党籍。理由是：不信任，人家怀疑我的诚意。以前的反对派同志逃避我好像逃避瘟疫一般。正式的党员则侧目视我。倘使我提出一个批评，他们就说：‘你故态复萌了！’倘使我说某事做得好，那就是‘为着遮掩我的思想’。我曾决定什么话都不说，但人家又控告我‘以沉默表示怨望’并‘企图推卸责任’。说实话，我现在好像生麻风病的人一般……”

这是无疑的。但反抗者的命运则常常比这更坏。

“我们的流放者什么东西都没有：他们确实确实是挨饿受冷的。昨天V同志写信给我：‘人家要以饥寒来压服我们。我们绝不投降的。我们有大义。我们宁愿饿死，绝不肯放弃自己的主张。’”

“我们设法捐款，但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1932年11月）。

“卡加雅曾在察德尔，带着一周岁的婴孩。人家不给她工作，她的丈夫关在牢内。他到处写信请求同志们不要让她的孩子饿死。她流放三年满后，人家移送她到中亚去，和一群刑事犯一同去，一天只给她五十戈比维持生活。我应该告诉你，此地一磅面包要卖两个至三个卢布。其他地方也是一样。流放者的生活有时是很可骇人的。”

“好多人生了病。索恩采夫^①在牢内得了败血病。他的刑期满了，但是就人家不放他。她的女人教他请求流放，但他坚决拒绝了。”

埃利亚扎尔·索恩采夫，是我们的最能干的青年战士之一。1936年1月，他因某次绝食死于新西伯利亚医院中。

“三个同志做了一次绝食，从监狱放出来了，但其中死了一个。穆西雅·玛吉已经放出狱来，改为流放，被人同普通罪犯一起送往米努辛斯克去，——她在牢内六个星期不能起床。她又病得不能起床了。她是勇敢的，她写信给父母说：今生再也见不到父母的面了。加耶夫从上乌拉尔斯克监牢回到莫斯科来，他因一次危险的贫血病而失明。弗拉基米尔·科西奥尔^{②③}在米努辛斯克……”（1932年11月来信）

一些人在牢狱内“失踪”了。

“两百五十个我们的人，关在上乌拉尔斯克隔离监内。某次犯人抗议之后，雅罗舍夫斯基以‘蛊惑者’罪名被押解到莫斯科，关在内部监狱中，据传说已判决十年集中营监禁。集体的抗议是不容许的，那次是这样做：一个同志提出一个抗议，其他的同志以个人名义表示附议。雅罗舍夫斯基做的不过如此。以后，几个月过去了，没有人知道他的消息。斯瓦尔巴赫兄弟，也是这样在莫斯科格伯乌内部监狱中关了好久而找不到踪迹的，其中一个已经害了很严重的肺病。”

在城市内，也是常常有人“失踪”的，而且更多些，总是为着一样理由……

请读者不要以为我是挑选些特殊的证件，关于罕见的事实。我是差不

^① 埃利亚扎尔·鲍里索维奇·索恩采夫（Солнцев Элизар Борисович，1897-1936），苏共党员，国内战争参与者，苏联左派反对派成员。国内战争后就读于红色教授学院，研读历史学和经济学。毕业后被派赴驻德、美的苏联贸易公司工作。在美期间，与伊斯特曼合作编辑托洛茨基及左派反对派著作。1928年回国，旋即被捕，1929年被判5年流放。流放期满后，于1935年5月再次被捕，被判5年徒刑。在流放地领导绝食斗争，因长期营养不良，于1936年1月逝世。托洛茨基称其为：“新生代中最杰出的代表之一。”——校对者注

^② 穆西雅·玛吉和弗拉基米尔·科西奥尔现在还在流放之中。

^③ 弗拉基米尔·维肯季耶维奇·科西奥尔（Владимир Викентьевич Косиор，1891-1938），190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党，属布尔什维克。积极参加1905年革命，组织领导了多起罢工，多次被捕并被流放。二月革命后，任布尔什维克党彼得格勒委员会成员，参与了十月彼得格勒武装起义。国内战争爆发后，任第十二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第十四军政治部副主任。1921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参加“民主集中派”，不久退出。1922-1924年任《劳动报》主编。1923年参加“左派反对派”组织。1928年被捕并被开除党籍，被判处五年流放，之后再判五年流放，期满后再次被判五年劳改。因领导监狱政治犯绝食斗争，于1938年3月30日被杀害。——校对者注

多在一大堆文书中随手拿几张出来的，从中摘取我认为平淡无奇而有代表性的几行字。凡是稍微知道俄国生活的人，都会认同。我所征引的信件，都是好几年以前的。因为近几年来就收不到这类的信了。制度改善了，什么东西都通不过来；但情形只有更坏得多。我们读了这些报告，可见还须加添一种残忍的即使不是野蛮的印象。压迫手段一年比一年更厉害，更加无人道。

关于牢狱内的生活：

“我们的一个朋友时常爱说：我们将作为肥料，浇沃土地，使得新的一辈革命人才幼芽容易生长起来。如今精神状态已好转许多，我们期盼转机。所有人都在钻研学问、学习语言（尤重德语），无休止地辩论宇宙论、时空观、力学原理、马克思主义与右倾危机。但审查制度扼杀了思想火花的传播，连狱中交流都受严格限制。我们进行过几次绝食。第一次绝食之后，我们每个月能收得十二封信，以前只允许收得四封。这次绝食时间很长，解决后有许多同志病得很厉害。第二次绝食发生于虐待之后；我们也拒绝不与外间通任何消息。神经是紧张的，差不多无力支持了……毫无疑问，从沙皇监狱放出来的社会主义者，要比从斯大林监狱放出来的我们，身体好得多。（1930年6月来信）

1931年夏末，上乌拉尔斯克隔离监内虐待手段达到最高点，人家企图谋杀一个坐牢的同志，埃萨扬，他胸前中了一枪。三十个反对派绝食了十八天。人家想强迫喂饭。三十个人都害了败血病。当局要十二个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犯人组成代表团去谈判。然后，他们就被武力绑架走了，送到不知什么地方去。

1933年，一阵绝食潮爆发于诸监狱中，得到相当成功，——为着反对“自动加倍刑期”。格伯乌（今天叫作国家政治保卫局，但名称虽然改了，实际是没有变的），不经审判，也不用说明理由，可以以行政手段判人三年徒刑。倘若刑期满后，反对派还不明白政制的好处，则人家再补判他两年……他们的五年坐满了，最早的几十个共产党人以全体饿死相威胁，才蒙放出监狱而改为流刑……他们是绝食过的。

几个月之后，他们在流放地又通通被捕了，而且以行政手段又被判五

年徒刑。这便是我的诸友：格里戈里·雅科文^①、费奥多尔·丁格尔斯泰特^②、瓦西里·邦克拉托夫^③、查纳安·佩夫兹涅尔^④及其他许多人的命运。今天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没有更能比他们坚忍不拔的英雄了。

再指出一个景象：

“在格伯乌内部同在其他地方一样，也是被恐怖和纷乱统治着。谁也不信任谁。稍微有点嫌疑，而且时常是莫须有的嫌疑，譬如对于一个被捕的反对派表示客气，或者在搜查住宅时‘手软’，就要被开除。稍微有点错误，就要被逮捕。稍微对反对派表示殷勤，就要被枪毙。我刚刚证实了我告诉了你的那个事实：托木斯克监狱看守私传一封信给索斯诺夫斯基，然后被枪毙了；我从可靠的来源知道此事。”

关于自杀、谋杀和秘密枪毙的事情，我没有说起。那将说得太多了。我说得少些，但我能证明这一切。

^① 格里戈里·雅科夫列维奇·雅科文（Григорий Яковлевич Яковин，1899-1938），1917年毕业于教德萨国立大学。1918年12月加入联共（布）党，参加红军。曾任顿巴斯区党委书记，参与指挥打击马赫诺的行动。1924年毕业于红色教授学院，参加“左派反对派”组织，领导列宁格勒“左派反对派”团体。1927年被开除党籍，1928年被捕，被判流放三年。1929年被判处三年徒刑。1932年刑期延长二年。1934年再次被流放，在流放地逃亡。1935年在莫斯科被捕，被判处劳改五年。1936年10月在狱中领导政治犯组织绝食斗争，1937年3月1日被杀害。——校对者注

^② 费奥多尔·尼古拉耶维奇·丁格尔斯泰特（Федор Николаевич Дингельштедт，1890-1938），1910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属布尔什维克。二月革命后，任布尔什维克党彼得格勒委员会委员，从事喀琅施塔得水手的鼓动宣传工作，参与彼得格勒武装起义。国内战争后，入学于红色教授学院，毕业后任林业学校校长。1923年参加“左派反对派”组织。1927年被开除党籍并被捕，判处流放。1934年12月在狱中领导政治犯组织绝食斗争，为上乌拉尔政治集中营“绝食委员会”领导人之一。1935年被流放阿拉木图。1938年11月1日被杀害，全家无一幸免。——校对者注

^③ 瓦西里·费多罗维奇·邦克拉托夫（Василий Федорович Панкратов，1891-1937），苏联左派反对派成员。1917年作为喀琅施塔得苏维埃代表，参与彼得格勒武装起义。之后参加国内战争，任职于契卡，曾任外高加索地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主席。1923年参加左派反对派。1927年被开除党籍，1928年被捕，被判三年徒刑，后刑期延长2年，其妻（无党派）亦遭流放。1933年获释，1934年被捕，被判五年徒刑。1937年2月10日被杀害。——校对者注

^④ 查纳安·马尔科维奇·佩夫兹涅尔（Ханаан Маркович Певзнер），莫斯科工人，国内战争的参与者。1927年参加左派反对派组织。1928年被流放2年。1930年被捕，判刑4年。1935年再次被捕，判刑5年。下落不明。（人物生平来源于1936年7月《反对派公报》第51号）——校对者注

回忆

我从格伯乌内监狱一个监房里，现在被送到两千公里的远处了。在那监房里，我关了八十五天，没有书读，没有任何事做，没有亲人的消息。这八十五天中，有七十天是绝对的寂寞，甚至到灰色的院子里换换空气都不许，那里本是较能讨好的犯人散步的地方。现在在流放地，我们几乎要饿死了：一个好朋友和我，我们两人是在萨马拉监狱地窖中相遇的。

他——右派共产党员，曾任某地区委员会书记，参加过内战。

我——左派共产党员，等等，等等。

出了监狱之后，天是异常朗耀。

我住在高岗上一所破损的旧屋子，这屋背对着无垠的平原。草原和我心爱的风景。无限的空间，直扩展至喀喇昆仑山，至阿尔泰山，至堪察加！地平线上有着海一般的美丽。屋子对面是一个穷苦市郊的一些破烂房屋。头上是永难忘记的纯净的天。周围则是挨饿的、喝酒的、水肿的人们。穷困而心善。只五分钟路，就是那城和它的三个电影院。若不是这个政制、严密的监视以及其他，那城将是适宜居住的，将有它的可爱之处，同俄国国土所有的角落一样。

在流放地中，这里算是一个清静的部分。没有迫害。好多同志有工作做。我没有工作做。我写作着，写作着。创作，劳动，免得变成疯子，而且可以在这世界中尽自己的责任，有益于人，为以后留下一点感情和思想。这还是在反抗。一切作品都有一个灵魂。

“你知道吗”，一个朋友来对我说，他刚从监狱出来（而且还有监狱等待他，但监狱不是也在等待我们所有的人吗？），“你知道，1850年左右，塔拉斯·谢甫琴科^①也曾流放在这里，在奥伦堡，而且不许他作诗和写文。他常常独自到大草原中去，为着偷写他的诗，写好藏在他的鞋里……”

^① 谢甫琴科，诗人和画家，乌克兰的民族骄傲。不久之前，人们在基辅城给他竖立了一个很威严的纪念像。

你把你的著作藏在哪儿呢？”

的确不错……最难忍受的，是这个慢性绞杀的感觉。在十八个月内，我没有收到一封信。我知道有人写信给我，而且是挂号的。我自己发出的挂号信，照例地“失落”，到了法定时间邮局赔我钱，因为邮局还是守法的。国际邮政协定保障通信秘密。我向格伯乌领袖们申述，他们一听到“黑局”两字便怒吼起来，夹杂着愤怒……^①

朋友们和其他的人们，都以为我们不得恢复自由的，因为我们决不会投降。我们永不放弃我们的共产主义者的思想，永不肯去崇拜那个葬送革命的人，永不会拥护劳动者这样无限贫困的生活，永不会赞成特权的如此再生，永不会同意如此窒塞活的语言。该我们倒霉。他们将不惜枪毙我们。不用枪毙，他们还能发明什么更好的方法来消灭我们吗？试想想看……但一定的，他们一定能够找到这类方法。不过已经无须乎怎样安排，这个人就害肺结核死了，那个人就送往集中营去了，另有些人则失踪了……

瓦西里·邦克拉托夫失踪了。一个人。平衡的，结实的，时常微笑着的。三年徒刑。两年附加徒刑，为他的性格坚决。的确再没有比这更坚决了。以前，国内战争，自始至终他都参加。喀琅施塔得舰队运动，反对临时政府的暴动，红军，——都有他的份。外高加索格伯乌的副主任，左派共产党员。他的妻子等了他五年。几个月前被释放，他们夫妻重会，一同被流放，而且快有一个孩子了。人们又逮捕他，在他出狱流放之后不到六个月时候，为什么呢？无人知道。他失踪了。在上乌拉尔斯克监狱，五年。小孩子生出来了，在我们中间，没有父亲。——人们将发明什么手段在监狱内将邦克拉托夫谋杀呢，或者逼迫得他自己绝食死呢？我自问着。因为这种具有确信的、不可腐化的、不可屈挠的人，本身就是以革命之名定了那政制之死罪；显然那个政制是不肯让他们活着的……

查纳安·佩夫兹涅尔失踪了。同样的信念，同样的气魄，同样的监狱，但只判了四年（在被放逐两年之后），因为他生病。以前，他在远东打过

^① 自从我离出苏联之后，我就完全不能收到丢在那边的亲爱的人的一点消息，我也不能把我的消息告知他们。“黑局”以一种可佩服的无耻和严密，扣去了一切。至于我的书稿，三部著作，三年工作的果实，也被苏维埃检查机关非法的拒绝放行，而且不说明理由。我的一切纪念物和文书亦然。以打击感情和焚书的手段来残害人，这种可鄙的用意，应当加以什么名称才好呢？

一次仗，身体留了十几个子弹碎片，一条手臂折了，骨头断了；这个断臂挂着，像块破布一样。他也是微笑着过着一生，他有一种无情的洞察力。这话是他说的：“首先，对那等待着我们的命运，我们不要存什么幻想！”基洛夫事件之后，人家在医院门口逮捕了他，他刚医好了猩红热出来……他还活着吗？在哪个监狱？

我少说一点，我告诉你们了。我只举出这两个人，我的同志，我的兄弟。“偶然”使得我来替他们的信念，他们的坚贞，他们的失踪，来作证。我也曾交付于同一的命运。我的重大的责任，就是控告那杀死他们的刽子手。

现在，人们要铲除与列宁同时代人的时候，这些坚决的反对派，这些革命者，他们的状况是很特别的。他们已经很长久做了俘虏了——约有八年——人们不能告他们参与什么阴谋。人们也很明白，从他们嘴里得不到谄媚的供词，而且无论如何不能给他们以公开审判的机会……那么人家将发明什么手段来消灭他们呢？

我由亲身的经验知道，那些供词是怎样授意的，怎样伪作的。当那滥用名词称为“侦查”的时候，人家就是要我伪造口供。起初我不知道，要我說什麼；我有点好奇心，要知道人们如何使我知道人们要我亲供的话。当人们以为我已成熟了，即已被隔离、无聊和威吓而充分颓丧了，于是来了一个侦查官，冷然地对我说：我无论如何要判长期徒刑的，若要减轻刑罚，就必须证实我的姨妹安妮塔·卢莎科娃的供词，他就要念这供词给我听……

他果然高声读起一个奇怪的文件，其中没有一句话是真实的，里面有许多人名和地址，我完全不认识。我立刻明白：小安妮塔将没命了，——无论人家教她签字于这个虚构的故事，或者不用她签名，而就算这故事是她说的，她都不会恢复自由了。我明白我自己也将没命了，——既然将我牵涉在伪造供词里面，自然非消灭我不可。一个地址，不认识的地址，也许是一个军人的；这使得我想到人们要控告我叛国罪而把我枪毙。可见，我再没有什么可以丧失的了。我于是干脆打断那个流氓的执行职务……

“你是要倒霉的，”他对我说。“差不多得了，”我回答他：“这就够了，我不想和你的谎言有任何关系。”我得救了。安妮塔也被放出来了。

我要求对质，而得不到允许。但讼事突然转变：从此没有伪造供词这类事情。去年4月间，我准备离开俄国，在经过莫斯科时候，我希望再见安妮塔一面。我打听出，她不久之前又被捕了。又被捕吗？为什么呢？这个少年女子从来未曾加入任何政治党派。凡是认识她的人，都知道她是毫无瑕疵的。而且是很腼腆的。无论什么理由都不能够辩护当初她被人以行政的手段判决无道理的五年流刑，流放于维亚特卡。你们明白吗？

这类事情从来未曾登报过。没有人为我们辩护。没有人来救济我们。我们在黑暗中被生生地勒杀。

被迫害的女性

我还记得，1920年，在彼得格勒季诺维也夫办公室内遇见一个少妇：柔弱的，头发带金黄色的，惊人的优雅和一种贵族式的美丽，夹在当时那些粗暴面孔当中有点不大相称。她主持情报科一部分事务。在她背后时常出现她的丈夫的亚述式的胡子：越飞大使，——人家叫他做阿道夫·阿布拉莫维奇，年纪未老，就已经是一个老革命家了，他一生经过多次被捕、逃亡、战斗，1918年德国革命他也有份。与爱沙尼亚和波兰所订的和约，就是他签字的。列宁派他去中国和日本；去中国，为着游说孙文，去日本，为着确立和平。我在维也纳再见到他，他在那里很客气地躲避巴尔干那些阴谋家，他们来找他商量政变的事情……他和玛利亚·米哈伊洛夫娜生养有一个儿子……他于1927年11月16日饮弹自尽了，在他的写字台前，列宁的肖像之下，——他生着重病，而且被一种暗中的迫害压得喘不过气来，因为他始终是属于党内革命的左派。他留了一封遗书给托洛茨基。在隔壁居室，玛利亚·米哈伊洛夫娜咬紧了嘴唇，旁边许许多多同志，在零乱的玩具中间走来走去……

自杀前一日，越飞写道：

“三十多年以来，我就抱持这个哲学，认为人的生命只在它替一种‘无限’服务时候才有意义，对于我们，这个‘无限’就是人类……我过去的生活就是依照这个人生意义：为人类利益而工作。关在监狱和炮垒那几年也是如此……”

今天再不能斗争下去了，为了这病而不得不自杀。

“我的死乃是一种抗议，反对那些人，他们将党领到这个田地，使党毫无办法拒抗耻辱……”

几个月之后，这位大革命家的寡妻，——她自己在国家出版局儿童文学部服务，——参加党的一个会议，人家当着她的面污辱她所敬仰的与她同思想的一切的人。她起来发言。第三天她就被捕了，被放逐于阿拉木图，后来又移送至布哈拉。三年期满，再放逐三年。不可屈挠的，她具有战士的骄傲性格，忠实于往昔。第二次三年期满，她又被关起来了，为的企图组织一种同情行动——在那里被称为反革命的行动——援助那些陷入于极

度贫困的同志。结果她被再次流放。这期间，她的小孩子因为营养不足已经死去了。

季诺维也夫案之翌日，各通讯社传出玛利亚·越飞自杀的消息。我不肯相信，但这是有可能的；不是一种失望的行为，而是反抗反动的一种最后行为。如何能够知道玛利亚·越飞的下落呢？

再提起一个女人：伊娃·布罗多^①，社会民主党人（孟什维克）。她1927年为了她的党秘密回苏联去。为密探所卖，被判三年徒刑，关在苏兹达尔监狱。期满又流放于塔什干五年。此五年满后再流放五年，这次是送到蒙古边界的乌拉拉去，那里离最近的火车站也有几百公里道路……伊娃·布罗多将近六十岁了。她从1890年以来就是社会主义战士，她熟悉旧制度下的监狱生活，1890年她参加雅库茨克诸流放者的斗争，以致被判几年苦役刑……

社会主义的妇女团体以及其他的妇女团体，为和平的，为各种崇高事业的，差不多各国都有……这些团体，难道不知道：玛利亚·越飞、伊娃·布罗多、伊琳娜·卡霍夫斯卡娅^②、玛利亚·斯皮里多诺娃^③、多拉·扎克^④、亚历山德拉·勃朗施坦^⑤、泽因勒·米萨姆^⑥等人的遭遇吗？若是知道的，

^① 伊娃·利沃芙娜·布罗多（Ева Львовна Бройдо，1876-1941），早年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工作。1899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属孟什维克。一战期间，属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1918年任孟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书记。1920年，她移居国外。1927年非法越境苏联，1928年被捕，此后在流放与被捕中度过，1941年9月15日被杀害。——校对者注

^② 伊琳娜·卡霍夫斯卡娅（Ирина Каховская，1887-1960），1887年出生于乌克兰基辅。1905年革命期间加入社会革命党战斗组织，被捕后判处二十年苦役。二月革命后获释，参加赤塔社会革命党工作。十月革命后支持布尔什维克，但反对《布列斯特和约》。1919年加入乌克兰社会革命党的战斗小组，反抗德国占领军，被捕后判处死刑，后获释。1921年被捕，被流放于中亚。1930年被捕，被流放于乌发。1937年被捕，判处十年苦役。1956年获释。1960年3月1日去世。——校对者注

^③ 玛利亚·亚历山德罗芙娜·斯皮里多诺娃（Мария Александровна Спиридонова，1884-1941），1902年加入社会革命党，1906年刺杀坦波夫州长卢热诺夫斯基，被捕并被判处死刑，后改判为无期徒刑。二月革命后获释，组建左派社会革命党。十月革命后率领左派社会革命党参加人民委员会。1918年7月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叛乱后，全体左派社会革命党成员被捕，此后在流放与被捕中度过。1941年9月11日被杀害。——校对者注

^④ 多拉·扎克（Дора Зак），1905年起参加工人运动。1918年加入联共（布）党，被派赴邓尼金后方从事地下工作，被白卫军逮捕。遭受酷刑，造成终身残疾。国内战争后，参与全苏工会工作。1928年参加“左派反对派”组织，不久被捕并被流放。下落不明。（人物生平来源于1936年7月《反对派公报》第51号）——校对者注

^⑤ 亚历山德拉·洛沃芙娜·索柯洛夫斯卡娅（Александра Львовна Соколовская，1872-1938），早年受父亲影响参加革命运动。1896年组织尼古拉耶夫马克思主义团体，期间结识托洛茨基，并引导其成为马克思主义者。1897年参与组建南俄工人协会，在工人中进行鼓动宣传。1898年被捕，此后和托洛茨基一同被流放，途中与托洛茨基结婚。二月革命

那又如何解释它们的缄默呢？

后获释，参与组建彼得格勒共青团组织。十月革命后，参加教育人民委员会工作。1923年参加“左派反对派”，1929年被开除党籍，此后被流放。1938年4月29日被杀害。——校对者注

^⑥ 不错，是自由派诗人埃里希·米萨姆的配偶，他在德国一个集中营里给纳粹党谋杀了，但他的妻子现在被监禁在苏联一个监狱里。

恐怖与经济复兴

这有什么奇怪呢？在如此满含火药气味的空气中，在政府贱视人命的这个广大国土中，听到单独一声枪响，这有什么奇怪的呢？基洛夫，政治局委员，斯大林在列宁格勒的代表，1934年12月1日被一个青年党员列昂尼德·尼古拉耶夫暗杀了。这个恐怖主义者，在手写的宣言中，说明他暗杀的动机，而这些宣言是绝不会发表的，也不会列入于任何公开审判的卷宗内的。十四个青年党员，他的朋友，经过秘密审判之后，枪毙了。一百一十六个人，完全与此事无关而且是事前被捕的，也枪毙了。全世界一声不响地眼看着这许多无辜的人受屠杀。那些所谓“苏联友人”的知识分子，要么拍掌赞成要么默不作声，他们没有想到，如此，他们就一同分担这罪恶的责任了。那些公认的伟大“良心”，那些文化的捍卫者，都默不作声。他们扪心自问一下，此事之后，对于埃德加·安德烈^①或台尔曼的生命，将减轻多少斤两呢？

当局拙劣地试图将托洛茨基与这起个人恐怖行为挂钩。列宁格勒格伯乌诸负责人被重重处刑，因为他们预先知道这个暗杀准备而不去阻止。这就是正式承认：伪造的圈套。忽然，斯大林控告党内他的一切沉默的政敌以精神上同谋的罪名。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巴卡耶夫、费奥多罗夫^②、叶夫多基莫夫^③，都被判很重的徒刑，还要没收私产，即没收他们的私人

^① 埃德加·安德烈 (Edgar André, 1894-1936), 1894年出生于德国亚琛。青年时代在比利时投身社会主义青年团运动。1914年应征入伍，后被法军俘虏。作为汉堡码头工人，他先加入德国社民党，1922年转入德共并成为领导成员。1932年曾旅居法国。1933年3月5日在德国被捕，同年7月10日被判死刑，1936年11月4日就义。——校对者注

^② 格里高利·费奥多罗维奇·费奥多罗夫 (Григорий Фёдорович Фёдоров, 1891-1936), 1891年出生于俄国圣彼得堡。190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属布尔什维克。作为五金工会代表，开展地下宣传工作，多次被捕。二月革命后，当选为彼得格勒党委会、苏维埃执委会委员。十月期间，任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参与彼得格勒武装起义。国内战争期间，任第十三、十四集团军政治部主任，参与镇压喀琅施塔得叛乱。1923年参加“左派反对派”组织，不久悔过。1934年被开除党籍，1936年9月被捕，同年10月5日被杀害。——校对者注

^③ 叶菲姆·格奥尔基耶维奇·叶夫多基莫夫 (Ефим Георгиевич Евдокимов, 1891-1940), 1891年出生于俄国彼尔姆省的农民家庭。早年参加俄国无政府主义武装小组活动，多次被捕。十月革命期间，加入赤卫队并参与莫斯科武装起义。1918年加入红军，同年入党。1919年任职于全俄肃反委员会，历任莫斯科契卡特别处处长、西南及南方战线特别处副处长、右岸乌克兰全权代表、北高加索全权代表，曾策划了沙赫特案件。1934年转入党务系统，历任北高加索边疆区委第一书记、亚速海-黑海边疆区委第一书记、罗斯托夫州委第一书记。1934年当选中央委员，1937年成为最高苏维埃代表。1938年调任苏联水运人民委员部副委员，同年11月被捕。1940年2月2日被杀害。——校对者注

文件，如他们与列宁来往信札及政治文件等，——这是本案确定的目的之一。他们的政治朋友，有好几千人进入集中营内……从前曾经发表过革命意见的人，也有几千人被流放了。早被流放的托洛茨基派，又重新被捕了。列宁格勒居民被清洗的，——被流放或苦役，——约在八万至十万人。

1935年的恐怖情形大概就是这样。这一年恰是经济复兴之年。倘若官僚集团不自知民心尽失，倘若对人民无愧于心，本应在此等年份放松警察统治。然而恐惧已主宰了一切。

牲畜至少有一半被屠杀了，马匹也灭绝了一大半；在此事实之前，斯大林醒悟了，不得不改变论调。先是允许集体农庄自主交易，继而逐步恢复农庄内的小农财产（包括小块土地、奶牛和马匹），甚至许诺了集体农庄的“致富权”……粮食终于重现市场了。

1935年初，粮票取消了，改由国家自由售卖，规定一公斤灰面包卖一个卢布。工资无论如何低微，从此遂有一种真实的价值，因为有一种商品作为等价物。工人每月赚一百个卢布，实际上就是赚一百公斤灰面包。他可以生活了。几百万男女工人并没有比这更多的工资。平均工资在一百五十至一百七十卢布之间，视地区而定；但最普通的工资不用说是在平均工资以下。整个国家如释重负，终于从深渊中爬出，形势开始好转，人们脸上重现笑容。

苏联加入了国际联盟，它不久之前才斥责国际联盟的帝国主义虚伪性和不断的破产。它如今是武力最强的国家之一了。在航空方面也许是世界第一。我们了解到：五年计划特别是一个扩充军备的计划。人们愁惨地明白了：苏维埃国家从民穷财尽中榨取资源，将全部财力倾注于坦克、五引擎轰炸机、旋翼机、自行火炮、元帅肩章和军事贵族阶层的缔造。而这是糊涂的，因为从此苏联的弱处大于强处了。最强大的军队，配上最贫困的和最怨望的后方。

一切是互为因果的。而恐惧乃是根本原因。当饥荒和农业危机的那几年（1930-1935年），苏联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当权者们于是试图以军备扩张掩盖内在虚弱。

“天才领袖的伟大”

饥荒完结了。战争避免了。苏联赢得了法国的友谊。苏维埃政权正为国际联盟注入新的力量。“世界资本主义的危机已经缓和了”，斯大林宣告说。

他频繁发表演说，现身在热情的群众前面（这些群众自然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他和赖伐尔先生共进午餐，通知这位法国内阁总理以法国共产党终止反军国主义运动的嘉音；他与艾登先生餐叙，向这位英国外交大臣保证以后不在印度鼓动；他又同罗曼·罗兰留下合影，——那位禁欲而深邃的作家正凝神思索着写一篇青词，赞美那个刽子手、那个杀人犯、那个行刑队和集中营的英雄雅戈达^{①②}……

斯大林宣告人民的幸福，大把大把地挥洒着勋章、留声机、手表等，在镜头前拥抱亚洲古老民族的少女。人民之父啊！诗人、作家、演说家、拖拉机手、土库曼牧羊人、蒙古牧民、格鲁吉亚飞行员、乌兹别克小学生等等，所有颂扬之词都已为他耗尽。已死的飞行员的寡妻们感谢他。整版的新闻纸不过是一堆歌颂“天才领袖”的文字：——“古往今来最聪明的和最伟大的”、“最亲爱的”、“如长子一般尊贵的”、“像太阳一样光芒万丈”……除此以外，报纸没有登载别的东西。一切都以这种新生的“帝王崇拜”为中心。然而颂圣的狂潮夸张得最甚的，恰是在这位“天才领袖”屠杀了他的最老的斗争战友，屠杀了列宁诸同事之翌日。——极权主义的宣传机器，此刻运转得可真是完美啊！

低矮的额头，粗硬的髭须，永不改变地穿着一套不漂亮的没有徽章的军服，言行举止都好像一个粗暴的军士。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朱加什

^① 苏维埃报纸把这篇颂辞发表出来了。……《约翰·克利斯朵夫》的读者们，读了这篇颂辞，好多人都要懊丧的。度过了漫长的美妙一生，想不到老来还要写下这一页令人痛心的文字。

^② 亨里希·格里戈里耶维奇·雅戈达（Генрих Григорьевич Ягода, 1891-1938），190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属布尔什维克。1911年被捕后被流放到辛比尔斯克。1913年获释。1915年应征入伍。十月革命后，加入契卡。1923年任国家政治保卫局第二副局长，1926年任第一副局长。1934年7月任内务人民委员，1936年9月改任邮电人民委员，1937年4月被捕，1938年3月15日被杀害。——校对者注

维利，格鲁吉亚人，1879年生于第比里斯，一个鞋匠的儿子，幼年就读的学校本造就了许多革命的人才；党成立以来他就成了社会主义者和布尔什维克，从1898年至1917年都在高加索秘密活动，五次流放，四次脱逃；革命初起时，他适在北方的图鲁汉斯克。“斯大林”，俄文是“钢铁”之意；他恰恰像一把钢制的匕首。1905年革命失败后，他成了恐怖分子，在高加索指挥掠夺等行动，做了几件引人注目的事情（这时代他的最好的工作伙伴科捷·钦查泽，后来成了反对派，被他流放而死了）。1917年，他是无名的、忠诚的和诡秘的。国内战争时代，他在察里津（今名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发挥了突出的作用，与伏洛希洛夫和叶戈洛夫并肩作战，这两人如今都成元帅了。列宁非常欣赏他，同时也对他抱以不信任，而且有些害怕。“他连起码的诚实、即做人最普通的诚实都没有……”列宁说。他通过主席团和代表大会上勾心斗角进行阴谋，以此获得权力……起初联合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托姆斯基、布哈林，排斥了托洛茨基；之后又联合李可夫、托姆斯基、布哈林，排斥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再之后联合伏洛希洛夫、加里宁、奥尔忠尼启则，排斥了李可夫、托姆斯基、布哈林；最后消灭和排斥了革命的一切领导者并完全毁灭了主持1917-1923年的党以后，他就成为唯我独尊的人物了。

他的思想产出贫瘠得令人难堪。托洛茨基曾如此评价他：“他是我们党内最杰出的庸才”。他相信他的使命。也许唯有他相信这个；他将自己幽闭在地狱最深处的结界里，虽骁勇却活在惊惧中，虽狡黠却靠猜疑度日。他今天下令杀害同志；明天下令顶礼膜拜；后天呢？

谋杀

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伊万·斯米尔诺夫案中十六个被告，于8月19日在最高军事法庭受审判，于24日判决死刑，于25日执行。他们都供认了，除了斯米尔诺夫，他始终一句话不说；还有哥尔茨曼^①，他只为的使显然伪造的供词更无人信；这就是说，他们都为了党的利益，照领袖所要求的而供认了：他们受人欺骗，可是觉悟得太迟了。^②

俄国执行死刑的经过，向来不为外间知道。这次案件太惊动人了，似乎撕裂了神秘之幕，因为那些大报——自然是外国的——竟登载了一篇纪事，这纪事，由于好多的理由，是非常可信为真实的。我毫不迟疑认它多半是纪实之作……

“……加米涅夫可以会见他的家属。他见了他的妻子（托洛茨基的妹妹）、他的侄女和他的女儿。他的亲人很惊讶，看见他已现出‘死相’。他以微弱而弛缓的声音，对他们说：‘我多半要去做一个遥远的旅行。我身体很不舒服。昨天医生摸我的脉搏：五八至六十下。若是我死了，你们不要怨恨那些判我罪的人，他们知道他们应做的事情……’”

依照命令判断，他们也是替革命服务的，这些被杀的人；而颁发此命令的人，无论这一命令如何罪恶，仍是代表革命的……

“加米涅夫是第一个被枪毙的。他没有反抗，没有发出一句怨言。他静默地从监房出来，仿佛在梦中般走上了刑场。第一响手枪（无疑是在他背后开的）响后，他发出错愕的一声‘啊！’就倒下了，还没有死。监视执行的少尉瓦西乌科夫，用一种歇斯底里的声音大叫道：‘结果他！’并向这将死之人狠踢了一脚。第二颗子弹射进脑壳，就结果了加米涅夫……”

1912年布尔什维克党在杜马的党团领袖，1917年10月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第一任主席，列宁遗物的总继承人，当代俄国最渊博的学者之一，就

^① 爱德华·索洛蒙诺维奇·哥尔茨曼（Эдуард Соломонович Гольцман，1882-1936），波兰社会主义者。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属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后，从事经济工作。1926年参加“联合反对派”。1932年参加斯米尔诺夫左派反对派地下组织，并为《反对派公报》撰稿。1936年被捕，同年8月25日被杀害。——校对者注

^② 在《一个革命的命运》中，关于此案有详细的分析。

这样死了。

“斯米尔诺夫，他拒绝签字于乞赦书，他是唯一能保持镇静和勇武以至于死的人。一出监房，看见护卫队，他就明白了。他要求一张纸头，并说：‘这是我们该得的报应，为着审案中我们的无耻态度。在审案中，我的行为是可鄙的，现在我要以革命者的气概而赴死。’斯米尔诺夫在加米涅夫之后走上了刑场……”

“西伯利亚的列宁”，死了。

“季诺维也夫分开关在格伯乌的第二层楼上。他第一个签了乞赦书后，倒头就睡着了。天虽热，他却发着冷战，穿一件法兰绒毛衣和一双羊毛袜。夜间一点钟，人家唤醒他。他直坐起来，呆住了，身上颤抖着。

“‘季诺维也夫，起来。我们奉命令将你解到另一个地方去。’

“面无人色了，他仍旧坐着，一声不响。

“‘穿起衣服。’

“他躺了下去。一个看守拿鞋子给他。季诺维也夫动也不动，但是汗从他脸上流下来。第二个看守伸手在他背下，扶他起来。季诺维也夫呻吟着，扯着自己的头发。大家以为他疯了。

“‘走吧!’

“季诺维也夫仍旧在呻吟，徐徐摇动他的头。一个看守喷水在他脸上。他清醒了，就站起来。

“‘把你的东西拿走!’

“他于是呆笨地收拾他的东西。半分钟之后，人家把他弄出监房，八个看守组成的护卫队在门口等他。季诺维也夫此时完全明白了，他的双腿软了，几乎要倒下去。人家扶着他，他以嚎哭和叫喊抗拒了一下。

“到了走廊尽头，他真的歇斯底里的发作了，挂在几个看守的臂膀上，他像女人一般叫喊。少尉伊万古洛夫下令打开一个监房的门，看守立刻开了，季诺维也夫被推进去。

“少尉左手拉着他的头发，把他的头压低下来，右手便向他的后脑壳放了一枪。”

这个纪事经过新闻记者之手虽然有点失真，但我在其中认得了季诺维也夫，因之也看到了真实的一面。季诺维也夫有心脏病，向来穿得很暖和，夏日亦然。每逢着急时，他常爱用手按着头发，作一声长长的‘唔~’，一面扮出一种熟悉的鬼脸。提高音调时候，他的声音就变成像女人一样。看见就要给人杀害了，这位鼓动家必定要鼓起最后的力量，向那些刽子手

喊道：想想你们做的什么事！你们现在枪毙的不仅是我，而是革命，而是列宁的党啊！——行刑军官岂容他再多说半句？在死亡的威胁下，这位军官发挥了“主观能动性”。天晓得，他会不会因此得到……“列宁勋章”？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最长久的助手，和其在1917年亡命中的伙伴，内战和红色恐怖时代彼得格勒苏维埃的主席，共产国际的第一任主席，就这样死了。……

他的兄弟，拉多梅斯尔斯基，一个年轻的无政府主义者，1920年在乌克兰被伏罗希洛夫的士兵所杀。

季诺维也夫这一案被告的供词：恐怖主义，阴谋政变，与他们的老政敌托洛茨基同谋等，——只能欺瞒那些不懂俄国内情的西方人士。在熟悉布尔什维克党内情的人，这些供词丝毫没有一点神秘性。这些供词，与最近十年来，好多失败的反对派分子被迫奉命而写的悔过书毫无二致，他们始终是以“党的最高利益”为借口的。这是讨好性质的供词，出于完全的忠诚，也出于利害分析。什么样的分析呢？一个投降了的反对派分子，斯米尔加，从1933年至今还关在牢内，当时他曾说：

“我们应当退守了，这就是说我们现在暂时投降，任人摆布，等将来群众觉醒时候，我们就站在群众的前头……”

季诺维也夫也曾三番五次说过：留在党内，即使要“在污泥中五体投地”我们也干，为着将来工人群众觉醒时候，我们还是党员；此时以前，我们切勿在党外行动，给反革命利用去。在他们的供词中，根本上表现的，正是他们对于“领袖”的怨恨，而这领袖他们在大庭广众中又不得不表示崇拜，因为“他”在世界前面仍旧是代表党的，——代表神圣的党的。

他们的最大错误，就是在于没有看到，仍是因为留恋于过去而没有看到：这个党已经死灭了。劳动群众总有一天会觉醒起来，为着社会主义而继续斗争，则他们并非与这个党在一起，而是离开并反对这个党的。

关于此案，我曾见过一个奇异的文件：罗森马克先生^①的报告，发表

^① 雷蒙德·罗森马克 (Raymond Rosenmark, 1885-1950)，法国律师。曾任苏联驻巴黎大使馆的法律顾问，受邀旁听了1936年8月的莫斯科大审判。——校对者注

于《人权联盟公报》中。这位报告者本质上认为：本案是遵守苏维埃法律手续的，而供词之中没有什么可以非难之点。……为了这个团体的荣誉之故——人权联盟过去曾做过许多有益民众的事情，而且负有一种重大的使命——我们却希望它也能叫舆论听听那些更熟悉内情的人的意见。罗森马克先生事实上不肯去审查那唯一真实的假设，即政治上讨好性质的假设，他不知道这些供词中一部分，其事实错误已被证明了或可以证明的，他不知道本案之主要解释就在挑选被告这个事实之中；他提到苏维埃法律，其实这法律是不存在的，即使存在，在本案也同在其他案件一样，都不断地被践踏在脚底下。

那些有权威的老社会主义者，他们的消息更加灵通，他们提出了一个不同的判断。弗里德里希·阿德勒^①说：这是中古时代的“巫狱”。他很有道理，引证中世纪时那些被烧死在火刑柱上的“女巫”，她们大都供认了曾与魔鬼相来往。……他也引证了1931年俄国十四个老社会主义者（苏汉诺夫、格罗曼^②、金兹堡^③、芬-叶诺塔耶夫斯基^④、舍尔^⑤、伊科夫^⑥等）

^① 弗里德里希·沃尔夫冈·阿德勒 (Friedrich Wolfgang Adler, 187-1960), 1897年加入奥地利社会民主党。1911年任奥地利社民党维也纳组织的书记。1916年10月刺杀了奥地利首相卡尔·冯·施图尔克伯爵，被判死刑，后改判十八年徒刑。1918年革命后获释，革命期间曾任工人苏维埃领导人，后当选为奥地利国会议员。1923年率领第二个半国际回归第二国际，当选为总书记。二战爆发后流亡美国，1960年死于苏黎世。——校对者注

^② 弗拉基米尔·古斯塔罗维奇·格罗曼 (Владимир Густавович Громан, 1874-1940), 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属孟什维克，多次被捕与流放。二月革命后，当选彼得格勒苏维埃粮食委员会主席、全俄中央粮食委员会主席。十月革命后，参加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对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工农业比例失调提出了批评，于1931年被捕，被判处十年徒刑，1940年3月在狱中去世。——校对者注

^③ 阿布拉姆·莫伊塞维奇·金兹堡 (Абрам Моисеевич Гинзбург, 1878-1937), 189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属孟什维克。二月革命后，任孟什维克党基辅委员会委员、基辅副市长。1922年起在国民最高经济委员会任职，任工业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1931年被捕，被判处十年徒刑，1937年12月30日被杀害。——校对者注

^④ 亚历山大·尤里耶维奇·芬-叶诺塔耶夫斯基 (Александр Юльевич Финн-Енотаевский, 1872-1943), 1892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属布尔什维克。一战后沦为护国主义者，转向孟什维克。1920年起担任彼得格勒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1931年被捕，被判处十年徒刑，1943年2月在狱中去世。——校对者注

^⑤ 瓦西里·弗拉基米罗维奇·舍尔 (Василий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Шер, 1883-1940), 1905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属孟什维克。二月革命后，担任莫斯科士兵代表苏维埃书记，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委员。十月革命后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国家银行工作。1928年应梁赞诺夫的邀请，任马克思主义格斯研究所档案馆副馆长。1930年被捕，被判处十年徒刑，1940年在狱中去世。——校对者注

^⑥ 弗拉基米尔·康斯坦丁诺维奇·伊科夫 (Владимир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Иков, 1882-1956), 1902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属孟什维克。反对十月革命，组织“救国和革命委员会”。1924年流亡国外，1928年回国。1931年被捕，判处八年徒刑。出狱后为图书管理员。1951年再次被镇压。1956年病逝。——校对者注

被迫承认的假供词，这些供词已被人无可争辩地证明是不合事实的了，当时就连莱昂·布鲁姆^①也曾为此事写了好几篇文章……

试引一段弗里德里希·阿德勒的话：

“1931年时，我曾专心去研究那个审判‘孟什维克（社会民主党）联盟局’的案件。调查了这一审判之后，我就绝对确定了：莫斯科的政治检察官是有系统地和有意识地迫使被告承认伪造口供的。关于其他案件，我不发表意见。也许有合乎事实的供词。但关于社会民主党的案件，则伪造供词之存在，乃是毫无疑问的事实。我们的同志阿布拉莫维奇^②在俄国旅行的事根本是虚构的，而此事成为重大的事实。被告们确切供认曾在俄国与阿布拉莫维奇相会，而且说出1928年夏天与他相谈的话。我绝对确定他们是胡说。……我们在各方面都证明过了，我们已经发表了一张照片，阿布拉莫维奇就在里面，在布鲁塞尔社会主义国际大会诸代表中间，据某些被告的‘供词’，他那时是在俄国呢。这类案件的导演人，无论如何细心，终要发生错误的；没有注意到这个大会，就是这类错误之中的一件啊……”

“那时我们写过这句话：莫斯科那种由伪造凑成的案件，政治上没有一个重要之点能残存下来的。”

上面我已经讲过，人们怎样要我承认伪造的供词，以陷害我。给我设下这个圈套的侦查官，就是格伯乌中反对派专门科主任卢特科夫斯基^③。这位公民假使是有良心的话，他的良心一定是乌黑的。……我本还可以征引若干个人经验的事实，但最好还是引证凡于1928年以来居住在莫斯科的人所周知的事实。在准备审判以拉姆辛为首的“工业党”案件时，工程

^① 安德烈·莱昂·布鲁姆（André Léon Blum, 1872-1950），早年参加法国社会党。1914年7月饶勒斯被暗杀后，成为社会党的主要领袖。一战后沦为社会沙文主义者。1919年出任社会党全国执行委员会主席。1920年反对参加共产国际。1936年6月至1937年6月、1938年3月至4月两次出任法国总理。二战后，于1946年12月至1947年1月任法国临时政府总理。——校对者注

^② 拉斐尔·阿布拉莫维奇·阿布拉莫维奇（Рафаил Абрамович Абрамович, 1880-1963），1901年加入崩得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崩得退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后，领导崩得与孟什维克派和解，加入孟什维克党，同时为崩得中央委员会委员。一战爆发后，先参加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反对战争。后与孟什维克护国主义派和解，宣布保卫祖国。二月革命后回国，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委员。十月革命后，回归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反对布尔什维克党。1920年离开俄国，定居柏林。纳粹上台后流亡巴黎，1940年流亡美国。——校对者注

^③ 阿纳托利·费奥多罗维奇·卢特科夫斯基（Анатолій Фёдорович Рутковский, 1894-1943），1919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1921年任格伯乌秘密部第六处处长。1922年任国家政治保卫局秘密部第一处处长。1937年7月被捕，不久获释。同年8月被内务人民委员会开除，改任沃罗涅夫面粉厂车间主任。1939年10月再次被捕，1943年12月29日死于狱中。——校对者注

师帕尔钦斯基^①在侦查中就被杀害了或枪毙了，——他在俄国社会中是很有名的，从前曾当克伦斯基的助手，以后是莫斯科克鲁泡特金博物馆的组织人之一，性格是很执拗的。有人说，他打了一个侦查官的耳光。一个与此案联带的案件，有个被告（我不说出他的名字，因为他也许还活着，虽然人家说他自杀了），已经判了罪，接见他的女人，他的女人问道：“但是，我可怜的朋友，对你自己，你为什么要说这许多谎话呢？”他回答道：“不说不行呀！”

社会民主党人勃朗施坦^②、老社会党人巴扎罗夫^③和切列万宁^④，都是俄国工人运动的开路先锋，他们坚决拒绝格伯乌要他们玩的把戏，因之没有审判一直关到现在。对于1931年社会民主党案中那些讨好的被告，人们特别拿战争的危险来压他们。在那迫在眉睫的战争之前，他们，忠诚的社会主义者，难道不肯牺牲他们的良心吗？伊科夫，他是唯一确实加入孟什维克党的人，他为了儿子的被捕而屈服了，人家骗他说：他的儿子已经完了。……历史学家苏汉诺夫就是这种诡计底下的牺牲者，人家要他供什么，他就供什么，但不管他做的这些劳绩，不管人家当初和他如何约定的（是默契的或是明说的，我不清楚），他仍被监禁在上乌拉尔斯克监狱中，他于是气愤起来了，便将这滑稽戏的内幕告诉同监的犯人，并进行了几次

^① 彼得·约阿基莫维奇·帕尔钦斯基（Пётр Иоакимович Пальчинский，1875-1929），俄国经济学家。早年支持无政府主义，曾参与1905年革命。一战期间支持战争，组建俄国工业援助委员会。参加二月革命，曾任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彼得格勒州州长。十月革命后被捕，宣布退出政治活动，此后两次被捕。1918年任俄国技术学会主席。20年代曾任职于苏维埃最高经济委员会、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国家计划委员会。1928年4月被捕，1929年5月29日被杀害。——校对者注

^② 梅契斯拉夫·亨利霍维奇·勃朗施坦（Мечислав Генрихович Бронский，1882-1938），1902年加入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一战期间，接近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参加瑞士社会民主党活动。1917年6月任布尔什维克彼得格勒委员会鼓动员和宣传员。十月革命后，任工商业副人民委员。1924年后任职于财政人民委员会、对外贸易人民委员会。1937年9月9日被捕，1938年9月1日被杀害。——校对者注

^③ 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巴扎罗夫（Владими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Базаров，1874-1939），1896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党，属布尔什维克。1907年退出布尔什维克，宣扬“造神说”和马赫主义。二月革命后为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参与编辑《新生活报》。1921年任职于国家计划委员会。1930年被捕，1931年被判五年徒刑，1932年获释后被流放。1939年9月16日在狱中逝世。——校对者注

^④ 费奥多尔·安德烈耶维奇·切列万宁（Фёдор Андреевич Череванин，1868-1938），1900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0年发表《16人公开信》，鼓吹取消主义。一战期间，沦为社会沙文主义者。二月革命后任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鼓吹革命护国主义。1917年8月任孟什维克中央委员，敌视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后，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大部分措施，但也反对白军。1922年起长期被流放。1930年被捕，1931年被判五年徒刑，1935年5月被流放。1938年3月8日被杀害。——校对者注

绝食，终于被送到无人知的地方去（1934年）。现在他还活着吗？

还是回到季维诺也夫案来吧。没有一点经得起分析的。大家对于哥尔茨曼的供词有什么感想呢？——他镇静而尊严地，在最后关头拒绝签字于乞赦书上，在最后发言机会，只限于表示轻蔑坐在他身边的那些奸细，然而他承认了会同托洛茨基的儿子列夫·谢多夫在哥本哈根会面。很容易证明谢多夫有生以来从未曾到过哥本哈根，尤其未曾到过那里的布里斯托旅馆，这旅馆好多年前就夷为平地了。大家有什么感想呢？除非是认为：这个人没有别的方法，只好用此手段来向世界上的人高声大喊，以牺牲自己性命为代价来高声大喊：“当心呀，一切都是假的！”

他揭破了雅戈，内务人民委员，这整幕戏导演者的假面具，以及雅戈达背后那个低额头独裁者的假面具。

我已经写过了，这案所持的事实论据或一般政治论据，没有一件能经得起批评，没有一件能经得起对审的辩论。一切都建立在被告的谎言上；被告由于留恋党，便加以同意牺牲自己的良心和人格，他们以为过去的事例，苏维埃的法律，以及他们替领袖——也是他们的敌人，但这是在党内说，而不是对世界上的人——所做的劳绩，足以保全他们的生命……

其中有一件事，人们可以相信有德国国家秘密警察局密探活动踪迹的——德国密探替格伯乌一个奸细或格伯乌一个牺牲品即奥尔伯格帮忙购买一张洪都拉斯的护照，——其实，从头到尾，都是苏维埃官厅，在布拉格及其他地方，所弄的玄虚……

整个说来，这手段就是在于：从多数的被告当中，挑选极少数讨好的分子，献给审判官，而这些审判官事实上就是刽子手，是党所任命的，依照党的训令行事的。从正式的文件可以看出：被告事实上有五十三人之多。

(1) 加文；(2) 格尔季克；(3) 加列夫；(4) 康斯坦特；(5) 马丁；(6) 奥尔伯格；(7) 拉金；(8) 萨福诺娃；(9) 费维洛维奇；(10) 斯米特；(11) 埃斯特曼；(12) 库兹米切夫。——以上十二人，被告书上声明“保留”。他们至今，即十六人枪毙了五个月以后，依然“保留”在完全的神秘之内……为什么呢？除非是因为不能让他们到大庭广众中来，否则这些被告将摇身一变而成原告了，——所以必须在法律以外暗中消灭他们。此外，案中提到的人，而至今差不多都监禁在和保持在最悲惨的黑暗之中

的，还有：(1) 历史学家阿尼舍夫^①；(2) 财政部工作人员阿库斯^②；(3) 党的创始人之一沙罗夫^③；(4) 旧时青年共产国际负责人沙茨金^④；(5) 老布尔什维克施略普尼柯夫^⑤；(6) 红军最早的组织者之一施季霍利德；(7) 被枪毙的德莱泽的妹妹；(8) 政府委员，老布尔什维克艾斯蒙特^⑥（1932年就被关起来了）；(9) 费多洛夫或费多托夫；(10) 著名历史学家弗里德兰^⑦；(11) 弗里德曼^⑧；(12) 弗尔蒂舍夫；(13) 内战老战士加

^① 阿纳托利·伊萨耶维奇·阿尼舍夫（Анатолий Исаевич Анишев，1899-1936），苏联历史学家、农业学家。1925年任职于列宁格勒大学，教授文化语言学，参加“左派反对派”组织。1926年作为反对派被调到塔什干共产主义大学。1927年被开除党籍，1928年悔过，1929年恢复党籍。1933年再次被开除党籍，1934年被捕，1935年被判六年徒刑，1936年4月10日被杀害。——校对者注

^② 格里戈里·莫伊塞耶维奇·阿库斯（Григорий Моисеевич Аркус，1896-1936），1918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1922年任财政人民委员会外汇局副局长。1931年任国家银行董事会副主席。1936年7月被捕，同年9月4日被杀害。——校对者注

^③ 雅科夫·瓦西里耶维奇·沙罗夫（Яков Васильевич Шаров，1884-1936），190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属布尔什维克。1905年革命期间，为彼得堡纺织工人工会委员、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堡委员会委员。先后多次被捕，并被流放。二月革命后获释，任察里津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委员。十月革命后，任职于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纺织部、工业人民委员会针织工业部、纺织信托委员会、贸易人民委员会进出口部。1927年参加“左派反对派”活动，被开除党籍，不久悔过。1934年12月被捕，1935年1月被判八年徒刑，1936年10月17日被杀害。——校对者注

^④ 拉扎里·阿布拉莫维奇·沙茨金（Лазарь Абрамович Шацкин，1902-1937），1917年5月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属布尔什维克。1918年当选为共青团中央委员。1919年任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秘书。1921年当选为全俄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主席。1922年任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1927年任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1935年2月被捕，1937年1月10日被杀害。——校对者注

^⑤ 亚历山大·加夫里洛维奇·施略普尼柯夫（Александр Гаврилович Шляпников，1885-1937），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属布尔什维克。二月革命后任彼得格勒工人士兵苏维埃执委会委员，后当选为彼得格勒五金工会和全俄五金工会主席，十月革命后任劳动人民委员、高加索-里海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西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等职务。1921年参与组织工人反对派。1923年支持“左派反对派”组织。1933年被开除党籍，1934年被流放，1935年被判五年徒刑，1937年9月2日被杀害。——校对者注

^⑥ 尼古拉·鲍里索维奇·艾斯蒙特（Николай Борисович Эйсмонт，1891-1935），1904年加入社会民主党，190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2年被捕，被流放西伯利亚。1917年为“区联派”，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十月革命后，任最高国民经济主席团委员、苏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国内战争期间，任红军供应委员会副委员。1924年任北高加索边疆区执行委员会主席。1926年任苏俄商业人民委员。1930年任供应人民委员。1932年11月因发表对农业集体化政策不满的言论，遭人告密而被捕，1933年1月被开除党籍，并被判三年徒刑。1935年2月获释，同年3月22日因车祸去世。——校对者注

^⑦ 格里戈里·萨莫伊洛维奇·弗里德兰（Григорий Самойлович Фридлянд，1897-1937），苏联历史学家。早年加入锡安工人党，曾为该党中央委员，任职于彼得格勒苏维埃。1921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入学于红色教授学院。1922年后任教于莫斯科国立大学、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教授西方历史。1934年出任莫斯科国立大学历史系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法国大革命史。1936年5月被捕，1937年3月8日被杀害。——校对者注

^⑧ 佐罗赫·伊奥希弗维奇·弗里德曼（Зорех Иосифович Фридман，1908-1936），早年参加拉脱维亚共产党，之后参加德国共产党。1933年希特勒夺权后，避往苏联。1935年5月被捕，判处十年徒刑。1936年10月3日被杀害。——校对者注

耶夫斯基；(14) 红军组织者之一，帝制时代曾判苦役刑的格林斯坦^①；
(15) 老党员赫茨贝特；(16) 雅科夫列夫^②；(17) 雅泽克；(18) 列林；
(19) 尤丁；(20) 彼得格勒党和政权的创立人之一库克林^③；(21) 昆特；
(22) 利夫希茨^④；(23) 工人反对派，老布尔什维克梅德韦杰夫^⑤；(24)
穆辛；(25) 格鲁吉亚老战士奥库扎瓦^⑥；(26) 前中央委员会书记乌格拉
诺夫^⑦；(27) 前中央委员会委员和政府委员皮达可夫；(28) 驻伦敦大使

^① 艾布拉姆·利沃维奇·格林斯坦 (Абрам Львович Гринштейн, 1890-1937), 1905 年参加革命活动, 后加入崩得。1912 年出国留学, 期间结识布哈林。1917 年赴摩尔多瓦参加革命活动, 当选为比萨拉比亚工党中央局主席、基希纳乌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1919 年 1 月加入布尔什维克党。1920 年参加红军, 历任军政治部主任、军政委。1924 年 10 月宣布成立摩尔多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 任革命委员会主席。1923 年参加“左派反对派”组织。1928 年被开除党籍。1929 年被判劳改 3 年, 1931 年刑期延长 2 年, 1933 年被判流放 3 年。1935 年 1 月在流放地被捕, 1937 年 9 月 25 日被杀害。——校对者注

^② 雅科夫·阿尔卡季耶维奇·雅科夫列夫 (Яков Аркадьевич Яковлев, 1896-1938), 1913 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属布尔什维克。二月革命后, 参与组织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的工作, 曾任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市委书记。十月革命后, 任莫斯科金属工人联盟书记。国内战争期间, 被派赴乌克兰组织党建工作, 历任基辅省委书记、弗拉基米尔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哈尔科夫省委书记等职。1926 年任工农监察副人民委员。1929 年 12 月任农业人民委员。1937 年 7 月任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 同年 10 月被捕。1938 年 7 月 29 日被杀害。——校对者注

^③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库克林 (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геевич Ку克林, 1876-1936), 1903 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属布尔什维克。在彼得堡开展革命工作, 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堡委员会委员, 多次被捕。十月革命后, 任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国内战争期间, 任第 25 师政委。1925 年参加“新反对派”活动, 1926 年参加“联合反对派”活动。1927 年被开除党籍, 1928 年悔过。1934 年 12 月被捕, 1935 年 1 月判处十年徒刑。1936 年 8 月 25 日被杀害。——校对者注

^④ 雅科夫·阿布拉莫维奇·利夫希茨 (Яков Абрамович Лившиц, 1896-1936), 早年参加社会革命党。1917 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属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后, 任职于契卡, 历任切尔尼义夫契卡主席、哈尔科夫契卡副主席、乌克兰苏维埃契卡负责人。1923 年参加“左派反对派”组织。1927 年被开除党籍, 1929 年悔过。1935 年任副交通人民委员。1936 年 11 月被捕, 1937 年 2 月 1 日被杀害。——校对者注

^⑤ 谢尔盖·帕夫洛维奇·梅德韦杰夫 (Сергей Павлович Медведев, 1885-1937), 1900 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属布尔什维克。先后 8 次被捕, 多次流放。二月革命后获释, 组建阿钦斯克工兵代表苏维埃。1918 年返回彼得格勒, 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革命法庭主席兼政委。1920 年参加“工人反对派”活动, 之后任职于重工业人民委员会。1923 年参加“左派反对派”组织, 1924 年因发表《致巴库工人的公开信》而被开除党籍, 1926 年悔过, 恢复党籍。1933 年再次被开除党籍, 1935 年 1 月被捕, 1937 年 9 月 10 日被杀害。——校对者注

^⑥ 米哈伊尔·斯捷潘诺维奇·奥库扎瓦 (Михаил Степанович Окуджава, 1883-1937), 1903 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属布尔什维克。1921 年任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1922 年任格鲁吉亚苏维埃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23 年参加“左派反对派”组织。1924 年任工农监察人民委员。1927 年被开除党籍, 并被流放浩罕。1936 年 1 月被捕, 1937 年 7 月 10 日被杀害。——校对者注

^⑦ 尼古拉·阿列克谢多洛维奇·乌格拉诺夫 (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Угланов, 1886-1937), 早年参加 1905 年革命, 1907 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属布尔什维克。二月革命后, 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代表。十月革命期间, 任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 参与彼得格勒武装起义。1918 年任彼得格勒工商业工会书记。1920 年任彼得格勒省工会书记。1922 年任下诺夫哥罗德省党委书记。1924 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兼任莫斯科省党委第一书记。1928 年因反对牺牲农村强行推进工业化政策, 参加柳廷反对派。1932 年被开除党籍, 1933 年被捕, 宣布悔过, 1934 年恢复党籍。1936 年再次被开除党籍并被捕, 1937 年 5 月 31 日被杀害。——校对者注

馆武官普特纳^①；(29) 卡尔·拉狄克；(30) 前莫斯科党委书记柳亭；(31) 前中央书记处书记谢列布里亚科夫；(32) 前《真理报》编辑斯列普科夫^②；(33) 1917年十月革命领导者之一斯米尔加；(34) 革命领导者之一索柯里尼柯夫；(35) 从前“斯大林主义左派”领袖扬·斯坦^③；(36) 俄国总工会创立者和领袖托姆斯基（他在案件进行时自杀了）；(37) 历史学家扎伊德尔^④；(38、39) 李可夫和布哈林，这两人后来不起诉；(40、41) 波格丹和罗明纳兹，这两人早已自杀。^⑤

所有这些人，为什么现在还不审判呢？他们将有公开受审的机会吗？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即是在这无耻的伪造阴谋之中，即使用莫斯科黑暗的审判制度，没有辩护人，或只有有名无实的辩护人，又加以完全御用的报纸，也不可能审判那些决定自卫的革命分子的，因为如此辩论之后，这政制一定要大失体面的。

国家政治保卫局（即格伯乌）领袖雅戈达，为着季诺维也夫案导演得不好，被免职了。在这案件审判前不久或在进行时，就有几千人被捕，政府人员尤多。人家发现出好多阴谋，在乌克兰，在高加索，在中亚。革命

^① 维托夫特·卡齐米罗维奇·普特纳（Вітовт Казимірович Пўтна，1893-1937），1917年2月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属布尔什维克。1918年4月加入红军，先后在东线和西线作战，三次荣膺红旗勋章。1923年任莫斯科第2步兵学校校长兼政委。1923年参加“左派反对派”。1927年任驻日本武官，1928年任驻芬兰武官，1929年任驻德国武官，1934年任驻英国武官。1936年被捕，1937年6月12日被杀害。——校对者注

^②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斯列普科夫（Алекса́ндр Никола́евич Слепко́в，1899-1937），1918年中学毕业后，担任教职。同年8月被德国入侵军逮捕，不久获释。1919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任县公共教育局代理局长、拉脱维亚党委委员，不久派赴斯维尔德洛夫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就学。1924年任布哈林的秘书，参与编辑《真理报》、《布尔什维克》刊物。1925年任《共青团真理报》首任主编。1930年10月因发表“保卫布哈林”言论而被开除党籍，1932年被判流放3年。1933年4月被捕，被判五年徒刑。1937年5月26日被杀害。——校对者注

^③ 扬·埃内斯托维奇·斯坦（Ян Эрнэ́стович Стэ́н，1899-1937），191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属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后，任辛比尔斯克省党委执行秘书。1921年入学红色教授学院，1924年毕业于哲学系。此后任教于莫斯科国立大学，任《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革命与文化》刊物编辑。1927年任中央鼓动宣传部副部长，1928年任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副所长。1928年支持布哈林“右派反对派”。1932年10月被捕，1934年悔过，获释。1936年8月被捕，1937年6月20日被杀害。——校对者注

^④ 格里戈里·索洛莫诺维奇·扎伊德尔（Григо́рий Соломо́нович Зайде́ль，1893-1937），苏联历史学家。1916年应征入伍，作为普通士兵参加二月革命。1919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任基辅革命军事法庭人民调查员。1920年任克里米亚革命委员会司法部代理部长、波多利斯克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20年代中期，任教于托尔马乔夫军事政治学院、列宁格勒国立大学历史学院。1936年5月被捕，1937年5月11日被杀害。著有《第二国际历史论文集》、《世界大战前后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运动》等。——校对者注

^⑤ 关于这一切，请参考列夫·谢多夫著的《红皮书》。

初年著名的战士大部分受株连了，被逮捕了。十月革命这一辈人都被株连了。

有一新案，正式宣告要于11月间审判，可是到期没有举行：一定是还没有排演停当。我们从远方只看见新西伯利亚的血腥丑戏。一个德国人斯蒂克林，和八个俄国人，都承认奉了德国盖世太保和那暗中躲藏的托派分子的命令，暗中准备，要使克麦罗沃矿山爆炸，为着败坏“我们亲爱的人民委员奥尔忠尼启则”的信用，并依照托洛茨基的愿望为苏联法西斯政权开辟道路。这种发昏的侦探神话，居然成为证据以此来判决六个可怜人的死刑，并准备摧残好多个早期的革命分子，多造一个事件去向德国挑衅……巴黎俄国白党机关报《最后新闻》，是绝无同情托洛茨基派嫌疑的；它为此事曾发表如下的言论：

“女巫随人所愿，甚至可以供认：她骑在一把扫把上，从空中飞去同魔鬼幽会；冰雹是她撒下的，因为魔鬼命令她这样做。完全明白的，人们所要研究的已经不是这种口供真不真的问题了，而是这种口供究竟用什么方法取得的问题了……”^①

有三个人的名字，在审判时常被提到：皮达可夫、德罗布尼斯^②和穆拉洛夫。这三个人一定要被消灭的。皮达可夫在1917-1918年乌克兰苏维埃埃化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在投降于斯大林后，他当了国家银行的首脑，之后以政府副委员资格指导重工业，他是苏维埃工业中最能干的管理者之一。德罗布尼斯，乌克兰革命者，做过好几次政府大员，他也投降了斯大林，似乎承认了什么口供。穆拉洛夫，这位伟大人物，我在本书中好多次提到过了，1928年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至今，从未“悔过”。1928年6月他从流放地额尔齐斯河畔的塔拉城写信给托洛茨基道：

“我转变吗？我宁死也不转变的。他们可以围剿我，但我不转变。即使孤身一人，我也不转变。从形式上看，我们是无党的人；我们光明正直地履行人们委托给我们的一

^① 《最后新闻》，1936年10月15日。

^② 雅柯夫·纳马莫维奇·德罗布尼斯（Яков Наумович Дробнис，1890-1937），1905年参加革命运动，1906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属布尔什维克。参加波尔塔瓦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地下小组工作，多次被捕与流放。十月革命后被派赴乌克兰，参与组建乌克兰共产党（布），之后作为乌共中央委员组织游击队抗击白军，先后四次被俘惨遭杀害。1922年任乌共中央书记。1923年参加“左派反对派”，1927年被开除党籍，1928年被流放，1930年悔过，1936年8月被捕，1937年2月1日被杀害。——校对者注

切任务，我们尽量利用我们的微弱的认识和丰富的革命经验，暂时指导别人，他们时常是无知的。但他们不能叫我们中立或扯谎，这是办不到的，正如人家办不到叫额尔齐斯河从北冰洋倒流至它的源头一样。”

有人说将要审判一个三十人案，其中约有二十个是德国人，都是德国盖世太保的侦探，他们是会提供完美的口供的，此外加上几个挑选过的老共产党员，得有默契，为着“革命的最高利益”而毁灭自己。彼尔·柏兰先生，《时报》的莫斯科通信员，认为“这次审判多半是不会公开的”，而“被告也多半不会枪毙的”。^①虽如此，他们仍旧是被消失了的。指名的被告有：拉狄克、普特纳（被认为红军最优秀的战术家之一）、普里马科夫^②和施米特^③（都是军事领袖，都是内战中的英雄。后者，施米特乃是一队红色骑兵的著名领袖，他本是一个小犹太工人，自己组织这队骑兵，为着反对那些专门迫害犹太人者）、阿库斯（国家银行经理）、索柯里尼柯夫（列宁的助手，从前驻英大使，被认为是政府当局最优秀的头脑之一）、加林娜·谢列布里亚科娃（有名的作家）、谢列布里亚科夫、乌格拉诺夫（右派反对派，前劳动人民委员）。这是几百个政治犯当中暂时的选择，这些政治犯都是人们所要消灭的。

消灭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伊万·斯米尔诺夫这一批人，在斯大林心中，就是消灭一批替换的人物，他们将有一天，由于出人意外的变化，能够拿到政权。这批人物是他所害怕的，虽然如今全数被他关在牢内。至于其他的人，则我要从一个工团主义杂志上摘录几段我的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

“说到拉狄克、皮达可夫以及好多其他的人，在列宁时代占第一等、第二等和第三

^① 《时报》，1936年11月11日。

^② 维塔利·马尔科维奇·普里马科夫（Виталий Маркович Примаков，1897-1937），191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5年被捕并被判处终身监禁，二月革命后获释。十月革命期间，参加彼得格勒武装起义。内战期间指挥红色哥萨克骑兵师。1925年参加“左派反对派”，1927年任驻阿富汗武官，1930年任驻日本武官。1932年任北高加索军区副司令。1936年任列宁格勒军区副司令。1936年被捕，1937年6月12日被杀害。——校对者注

^③ 德米特里·阿卡德耶维奇·施米特（Дмитрий Аркадьевич Шмидт，1896-1937），1915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属布尔什维克。同年应征入伍，在士兵中进行鼓动宣传，并组织训练赤卫队。1918年加入红军，被派赴乌克兰建立苏维埃政权，被白军俘虏并被执行枪决，受伤而未死。之后领导布尔什维克地下游击队、红色哥萨克师战斗，多次负伤，两次荣膺红旗勋章。1924年任乌克兰骑兵学校院长。1930年任北高加索军区副参谋长。1936年被捕，1937年7月20日被杀害。——校对者注

等位置的，则有一个很简单的政治心理学问题提出来。就他们的过去革命史说，这些人无论如何仍保持着相当信用的；他们已经走进了历史，群众也不能够责备他不是英勇地投身于压榨机的压板之下。8月25日的罪恶（十六人被枪毙）是一声霹雳，对于被谋杀的人则是人莫能名的青天霹雳，最柔软的骨髓也要起一阵冷战的。那些至今对于‘领袖’还存幻想而做着种种卑劣的讨好行为的人，一定突然地明白了……斯大林清楚知道：老一代布尔什维克，虽然为了对党的物神崇拜，为了苏维埃共和国的福利，为了尊崇领袖，而无所不作，无所不说，甚至人家要他们在报纸上和法庭上说最无耻的话，他们也甘心去说，但他们的内心仍然无情地定他的罪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皮达可夫、拉柯夫斯基、克鲁普斯卡娅等人（这些可怜的旧时大革命家，如今受万人唾骂了！）签字的可耻的文件有什么作用呢，这已向全世界表示他们和‘领袖’是同谋共犯？

“但这里，斯大林又一次走到断头巷了。强迫他人承认的同谋共犯关系，可以使供认者丢脸，却不足以使之真成为他的帮凶，大家看见：实际上他们只是牺牲者。而且这些牺牲者，在其灵魂深处还有定人罪的权利，他们还取得了将来报复的权利。团结在列宁周围的老布尔什维克党，本是一个大家族。这家族中几个最重要的成员被人杀害了。凶手能让其他的人活着吗？‘斩草除根！’——那些职业的凶手，此时一定要这样说。”

①

拉柯夫斯基没有被指控……同拉狄克一样，同皮达可夫一样，同所有投降了的反对派一样，在杀害十六人之前夕，他也曾发表奉命写的文字，——他是投降最晚的，于1934年，在流放六年后的巴尔瑙尔地方。他的文字有一段说：

“对于暗杀基洛夫的季诺维也夫派和托洛茨基派是不能留情的，对于企图暗杀我们的亲爱领袖斯大林和党政要人的人是不能留情的，对于替德国盖世太保当侦探的托洛茨基派是不能留情的。他们必须被枪毙！”②

拉柯夫斯基的个人地位只有因此更加难处。倘使被杀的人的供词中有一句真话，则拉柯夫斯基同他们一样有罪。倘使在1932-1934年间，托洛茨基派有一种恐怖主义的活动，为在监牢内的伊万·斯米尔诺夫所知悉并批准的（控诉书上正是这样说），那么这位前驻法大使应负有什么责任呢？

① 《无产阶级革命》，1936年10月25日。

② 《真理报》，1936年8月21日。

——在这期间，他正是大家公认的托洛茨基派领袖呀！

这出悲剧的真实意义，外国人是明白的。意大利法西斯报纸认为这是实践的现实主义对于革命的乌托邦之胜利。

在巴黎，《新世纪》在8月26日写道：

“实在说，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及其同谋者之死刑判决，证明了苏联力能维持国内秩序，无此秩序它便不能进行它的组织工作。俄国民族在经济计划上成就了一个重大的任务……它是决不让这个工作给恐怖主义或极端分子的活动所破坏的。它的繁荣，甚至它的安全，它的存在，都要求它这样做。”

在从前法俄同盟和尼古拉二世和平政策时代——海牙会议，大家记得吗？——舆论界恰好是用这个论调来辩护当时俄国所施的绞刑和流刑的，——其实当时还没有现在这般多。……结果是众所周知的。很难明白人们不能以此类方法来造成一个稳固的和受人爱护的国内秩序吗？不明白如此，多半是准备下可怕的社会骚动的吗？

自然，对于此事，是没有人比亡命的俄国白党更欢欣鼓舞的。《俄罗斯之声》（君主党机关报）9月1日写道：

“在布尔什维克所执行的几百万次死刑中，这一回的死刑是第一次令我们满意的……所杀的将不仅以季诺维也夫和他的朋友们为限，正如法兰西革命不仅以杀丹东为限……”

《复兴报》，也是君主党的机关报，曾于8月29日献了一首诗给斯大林说：

我们感谢您，斯大林！
十六个畜生，
十六个残害祖国的凶手，
如今滚去见他们的先祖去了！

今日的天，我们见着是蔚蓝得可爱，
您补偿了我们多年流下的泪！

但为什么只有十六个呢？
请替我们杀四十个，
请替我们杀几百个，
请替我们杀千万个吧！
请拿苏维埃的尸首，
在莫斯科河上造一座桥，
不用桥柱也不用桥墩，
然后请您自己也死在那！

两份文件

1929年，反对派分子在境外及莫斯科秘密发布了两份文件，这两份文件之公布，不啻在当局衮衮诸公中引爆了一颗炸弹，因为其赤裸裸地暴露了主张的歧异，暴露了表现于政治斗争上的个人仇恨，暴露了“领袖”的受人唾骂。为要离开斯大林警察机器编造的匪帮故事，而呼吸党内斗争的真实空气，并彻底解释近日发生的事变起见，我们必须重提这两份文件。差不多是字真句实的解释；其中所指名的人，现在都被消灭了，或正在被人消灭之中。

那时，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刚于坐了一个时期监牢之后，恢复党籍。季诺维也夫还在伏洛涅兹的谪所，加米涅夫则在莫斯科。这两人代表失败的左派，同时与那些不可屈挠的反对派分子决裂了，这些分子，有的被流放，有的坐牢。布哈林，党内右派的理论家，主张对于富农采取温和政策；他来找加米涅夫，代表他的朋友李可夫（那时还是人民委员会主席）和托姆斯基（那时还是总工会主席）。加米涅夫将这次会谈要点秘密记录下来，寄给季诺维也夫和其他几个亲密的朋友，这个文件终于泄漏出来了。这个记录是很长的，我现在摘录重要的几段。原文是用电报式的笔法写成的：

“布哈林：……我们认为斯大林的路线使整个革命陷于危险。我们要同革命一起灭亡。我们和他中间的主张歧异，比过去我们和你们中间的歧异更无限深刻得多……我已几周没和斯大林说话了。这是一个没有原则的阴谋家，只要能抓到政权，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他随意改换理论，只为了排斥这个人或那个人。在七人团中（按：政治局的七个委员），我们被视为说谎者和骗子。他的让步，只是为的更加扼毙我们……我在那里宣读一篇声明书，而将原稿紧担在手中。（一片字纸都不可以交付他）他现在的工作就是从我们手里夺去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夺去《真理报》，并以卡冈诺维奇代替乌格拉诺夫，因为乌格拉诺夫是完全和我们一致的。至于他的政策，则有如下几点：

“一、资本主义之生长，或是由于剥削殖民地，或是由于借外债，或是由于榨取工人。我们没有殖民地，人家也不肯借钱给我们，所以我们的基础是：向农民征收贡税。

“二、社会主义愈生长，则遭遇的反抗亦将愈厉害。（真是一个白痴，完全是无知蠢货）

“三、向农民征收贡税时，若是反抗力厉害起来，则需要一个坚强的指导机关。自我批评不应施于领袖，只可施于执行分子。

“事实上，自我批评是用来反对托姆斯基和乌格拉诺夫的。问题已不在于寻觅一个替罪羊了，这将使革命的命运陷于危急。照这种理论实施去，一切都会断送了。”

之后，加米涅夫询问道：“你们的力量是些什么呢？”布哈林举出一些人的名字，其中有雅戈达……这事与八年后雅戈达之失宠显然不是无关的。“伏罗希洛夫和加里宁，”布哈林说，“在最后关头出卖了我们。我想斯大林用了什么特别把柄拴住了他们两人。”

“布哈林：……倘若我们出头干涉，他们就要拿企图分裂党的罪名来扼毙我们；倘若我们不出头干涉，他们就要拿些小诡计来扼毙我们，并把10月间小麦歉收的责任推到我们头上。

“加米涅夫：他们究竟依靠什么方法来找到粮食呢？”

“布哈林：问题就在这里：他们又要用那每逢困难时就要用的非常手段。（按：即向农民征收粮食）但这是军事共产主义，这是自杀。

“加米涅夫：……你们呢？”

“布哈林：……也许应当用一种更广大的手段去同中农和解。人们可以随意迫害富农，但必须同中农和解。可是在斯大林和那个蠢才莫洛托夫——这蠢才还要教我马克思主义呢，我们大家都叫他‘石头屁股’——统治底下，是没有办法的。

“不要让人知道我们这回会面，不要打电话给我，因为有人监听。格伯乌正追踪我，你也是被监视的。我来向你请教，但不敢经过秘书和中间人。唯有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知道我同你说过话。”

加米涅夫写给季诺维也夫以他的感想：

“我将你的信交给他。他读后说：‘我害怕写了字的纸头’。他害怕有什么笔迹落在别人手中……他是非常之心惊的。有时情绪激动使他的嘴唇颤抖起来。有时他给人以一个人走投无路者的印象。”（7月11日6时写）

附加的感想（7月11日至12日夜写）：

“一、一般说，是一个走投无路者的印象。他的话，关于我们的整个处境……他说：‘有时我对耶逊（他的秘书）说：我们的地位是无望的。倘若国家断送了，我们都要跟着完蛋。倘若国家得救了，斯大林能适应环境，我们也是没活路的。怎么办呢？遇到这

一类敌人，遇到成吉思汗，中央委员会的这个下等货，我们怎么办才好呢？”

布哈林的议论：

“……（四）如果是我们发动辩论，人家就要以此来扼毙我们。中央委员会害怕辩论。……（七）我们不能发动辩论，因为立刻就要吵起架来……我们说：看呀，这个人将把国家引到饥荒和死亡去！——但他就要说：看呀，这些替富农和市侩担任保镖的人！”

（八）党和国家混合为一了，不幸就在这里！（九）斯大林要独自一个人操持政权。对我们让步时，他仍旧占据上风，以后他就来打击我们。怎么办呢？（十）索柯里尼柯夫说：你们要有一个更积极的政策，你们至少应要求调开莫洛托夫。（十一）斯大林只懂得一个手段：就是报复。他拿匕首刺入人背。我们要记得他的温和报复的理论。（十二）谢尔戈（按：即奥尔忠尼启则）是不可靠的。他走过来向我们痛骂斯大林，但却在紧急关头出卖了我们。”

最后的结论是：

“斯大林的政策将引到国内战争。他必然要以流血压平反抗。”

这一切之中最重大的，就是：布哈林预见得如此正确。第二个文件也是属于这类性质，写于莫斯科，1929年3月20日。其中所引事实，不知内情的读者是不明白的，所以不能征引许多。我只摘录一两段。皮达可夫劝人勿同斯大林斗争，以为这斗争没有好结果。

“皮达可夫十分真诚地认为不可以出来反对斯大林，他说：目前唯有斯大林一个人，我们还可以服从的。布哈林和李可夫想错了，他们以为斯大林之后就轮到他们掌握政权。不是的，继斯大林之后是卡冈诺维奇那班人当政的，可是我不愿意服从卡冈诺维奇那班人，我一定不服从他们。

“加米涅夫：那么你的办法是怎么样呢？”

“皮达可夫：人家把国家银行托付给我了，我只求银行里有钱就够了。”

1928年12月底，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以如下的话表明他们的态度：“要紧紧抓着政府大舵。但要如此，必须依靠斯大林才行。所以我们不可迟疑付给他以他所要求的代价……。”几天之后，听到托洛茨基被驱逐出国的消息，巴卡耶夫提议出来抗议。季诺维也夫跑去征求克鲁普斯卡娅的意见。这位列宁寡妻回答他说：“我们的话有谁会听呢？”

我们好像置身于法国执政府时代的幕后。再没有比读这些文件更痛心了，这些文件表示革命政权如何陷于污泥之中。个人在其中占不到什么位置。政治是人做的，必须指出某人某人的姓名；但大家见得清楚，这些人大部分离开一般人所谓“个人野心”是何等之远。皮达可夫带着厌恶和轻蔑之情说起的“卡冈诺维奇那班人”，就是那些无廉耻无信念的暴发户，就是那些革命起来后投机的分子……皮达可夫同意只要能做一个忠诚尽职的银行经理就够了。他可没有机会来服从卡冈诺维奇那班人，因为他们知道了他对于他们的感想，已经把他关起来而且准备杀掉他了……

继承列宁做人民委员主席的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李可夫，和做《消息报》编辑的布哈林，固然侥幸得到不起诉的处分，但人家是分为三步，一连举行三次审判（其中一次，1935年7月，至今仍是完全秘密的），才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移送给刽子手，丝毫没有力量能阻止对于失势的李可夫和布哈林两人重新开始侦查。这个奇怪的不起诉，使两人的地位更加难处。那些被枪毙的人，控告自己的话以及控告托洛茨基的话既然句句都是真的，非执行死刑不可，那么他们以同样的道理，以同样的言辞，控告李可夫和布哈林的话，为什么句句都是假的呢？右派第三个领袖，托姆斯基，没有等到被捕，没有等到不起诉，就自杀了。那些迫害托姆斯基的人，竟如此看不起世界工人，连托姆斯基是有罪自杀或无罪自杀，都不屑告诉我们。他的朋友之不起诉，似乎明白证明他是无罪自杀的；可是苏维埃法律有一条说：凡以精神或肉体的迫害，致使他人自杀者，应视同刑事犯治罪。为什么还不实施这条法律呢？托姆斯基，党内右派人物，最稳健的布尔什维克派之一，一生行为是很可敬的。死时五十六岁，从前是一个石印工人，1905年革命时成为烈韦里城苏维埃委员。以后蹲了八九年狱，经过了几次流放，几次脱逃，几年的秘密活动生活，终于被判终身流刑。列宁的中央委员会将全俄总工会指导工作托付给他，他于是尽力奋斗，使工会在国家之中得尽保护劳动者的真实职能。

李可夫和布哈林之得以暂时自由，不过为的免得一下消灭列宁时代的政治局罢了。^①

^①果然不错，这两人以及其他好多人，终于在今年春季被斯大林枪毙了。——译者按

在专制的国家里面，上头的把戏，要机械地一层一层演下去，直至于最低层。今年9月7日《真理报》当作滥用职权事例而泄露出来的格罗伯事件，表明我们现在拿1929年的文件来解释1936年的死刑案件，是何等的有道理。我们试略述这一事件。在1927年，少年共产党员格罗伯，在顿河畔罗斯托夫城所属的党支部之内，说了几句话，足以引起反对中央的嫌疑。受了惩戒，他立刻就悔过了，而且成了一个很好的附和主义者。在之后的九年中，他很正直地工作，从不敢提出一点批评或一点意见。今年，“警戒运动”发起了，有命令，要人暴露旧日的托洛茨基派、假悔过者、德国盖世太保侦探等等。一个告密者提起了格罗伯九年前那篇可怜的小演说，而我们这位可怜人立刻就被开除党籍了。他的弟弟（十九岁）和他的妹妹（十七岁），都是青年团员，而且是米高扬工厂的斯达汉诺夫分子——可见是模范的工人——也都被共产主义青年团开除团籍（大约还被逐出工厂；至于格罗伯本人则一定被捕了的）。工厂报纸发表评论说：“人们揭露出了反革命党格罗伯一伙的残余分子。”大家试想想看，这种无理压迫底下的牺牲者，他们在精神上的以及物质上的状况是怎么样呢？他们无论何处都不敢露面了……另外三个青年团员也被开除团籍了，因为他们没有及时揭发这可怜的格罗伯的假面具，格罗伯的另一个弟弟，担任青年团区委委员，被开除了……两个老党员，当初介绍格罗伯入党的，普洛维茨卡娅和哈尔佩林，被开除了……另外两个老党员，沃多莱斯基和杰尼索夫，也受到了同样处分，因为他们在1927年时宽容了格罗伯。这一切人，不用说也是被工会开除了的。逐出了劳动界，准备走上集中营的道路……——然而这一次这些人侥幸得很：这回《真理报》认为是机关大惊小怪，这格罗伯事件，根本上是没有什么事情的，绝对没有什么事情的……

但是，倘若格罗伯在1927年果真多说了几句什么话呢？

顶礼膜拜

克里姆林宫朝贺大殿，殿柱都是镶金的，殿中挤满了代表和来宾。各国使节，伴随着身着辉煌制服的武官，都来观光。有法西斯国家的大使，也有其他国家的大使。代表们是从俄国大陆最僻远的区域来的。其中有爱斯基摩人，有雅库特人，有涅涅茨人，以前叫作萨莫耶德人，他们穿着饰有红黑颜色的白皮衣；中亚民族，塔吉克人、土库曼人、乌兹别克人、萨尔塔人、哈萨克人，都穿着有条纹的长袍子；格鲁吉亚人、阿察人、阿布哈兹人，带着银锋的匕首；蒙古人、布里亚特人、奥萨特人，则代表中国的一角。工人朱红缎带，好像红婴粟花般，分散在这群人当中。蒙赐勋章的飞行员、御用的戏剧作家、老资格的机械师、阿列克谢·斯达汉诺夫、阿列克谢·托尔斯泰伯爵，——一群两千多人的选民，等待着，眼巴巴地对着主席台。主席台上，那些元帅，悬挂着金宝星和勋章，列宁勋章、红旗勋章、红星勋章、中亚红星勋章；还有全能的国家安全局委员，他们也穿着华丽的新制服和金制的条纹袖章。

世界六分之一土地内所有的报纸，第二天都要狂热地合唱道：

“11月24日是不能忘记的一日，是我们生活上最美好的一日，是一百多个民族生活上最美好的一日，是历史上最美好的一日。”

斯大林出现了。

找不到什么词句来形容那种喝彩，那种拍手，那种欢呼，那种雷鸣，那种如狂风暴雨的“万岁”声音。全殿的人都站立起来，感受到一种神圣的昏迷。一个冷静的旁观者曾仔细计算：这一场昏热共经历十三分二十四秒长久。殿内也有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他们跟着向这个独裁者喝彩，——向这个独裁者，他正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政府”的领袖，他把无政府主义以及其他的一切压倒在他的监狱的墙壁底下。这些无政府主义者知道，此时马德里正在流血，而他们的兄弟们正在阿拉贡前线上同叫花子数铜钱那样算着他们的弹药。

工人的加泰罗尼亚呵，自由的加泰罗尼亚呵，这个人可以救你！加泰罗尼亚代表们用火炭一般的眼睛望着他，有几个人也许由于崇拜而陶醉了，

另有几个人也许强忍着他们的愤怒。喝彩有什么关系呢？莫说十三分钟，十三个钟也愿意！只要民兵能有子弹就好了。

这是一个约有五十五岁的人，侧面宽大，头发全成灰白色，穿着一套军服，没有领章，没有袖章，没有任何徽章，脚上穿皮靴。这个大殿内再没有比他更朴素了；他的朴素同那些元帅和那些高级警官的服装成一个奇异的对比，——这些人此时正装着谄媚的笑脸望着他，他们也附和着拍手，在那十三分二十四秒时间内。

他说话将近两个钟之久，关于新宪法，说话时很少做手势。他转身对着西班牙代表团说：“共产主义将要在全世界得到胜利！”拍掌，喝彩。这是良好的暗示，马德里有救了，巴塞罗那有救了，西班牙民众！他说的。……然而第二天，报纸发表的记录上，这句话删去了。一个不好的暗示。他改变观念吗？可虑得很。有人冒犯了他吗？忧心得很……

他宣布说：什么都不会改变。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德国式或意大利式的秘密投票制。他用粗野的嘲笑掩盖国外批评宪法草案的回声。在全苏联领土内没有一个人批评这草案，没有一个人！有一个修正条文，他认为是对的，就写进这根本大法里面。这条文就是保障个人私有权和遗产权。每逢他说话有一停顿的时候，两千人都站起来，拍掌，喝彩。他说完了，又是拍掌，喝彩。涅涅茨人、乌兹别克人、土库曼人、爱斯基摩人、雅库特人、塔吉克人，以及从僻远区域拉来参加这神奇大典的集体农庄分子，都欢喜若狂了，因为他们见到往古来今无与伦比的“领袖”了。

那些代表团将各自的礼物捧到主席台上献给他。其中最好的礼物乃是被拘禁在一个集中营里的工程师和机械师所献的，这是一个大时钟，每逢报时的时候，有三座雕刻的雕像现出来：列宁、斯大林、前任格伯乌领袖雅戈达。比制造者自己想到的还更深刻的象征：列宁时代，斯大林时代，继之以刽子手时代。可惜这些囚犯的艺术和奴性献不得其时：雅戈达已将成为“非人”。斯大林微笑着。或许还有被恩赦的希望？

以后好多日，一些代表依次地走上这主席台，他们说的都是歌颂“他”的话；演说中每逢提到“他”的名字时，总要拍掌喝彩的；每人都吟诵本乡诗人的诗句来赞美“他”，每个人都宣告“他”的力量。凡是成就的事，都是因“他”而成就的。

成就的是些什么呢？布柳赫尔元帅，远东特别集团军总司令，宣布：由囚犯劳动筑成的一条横过东西伯利亚的战略道路，已经通车了。

海军上将奥尔洛夫^①说：

“若是将1935年1月1日我们的海军力量当作100，则至1936年底，增加的比例：潜水艇方面是718%，小型水面舰艇方面是300%，大军舰方面是75%，防空设备方面是100%，水上飞机方面是510%。根据国际形势要求，我们将打造一支令人敬畏的一流海军。”

空军副委员赫里平^②报告说（11月29日）：苏维埃空军共有七千架飞机，其中两千架是上等的，两千架中有一千二百架是轰炸机。

“日本和德国努力扩充空军。以能造成一万八千架飞机来作战为最终目的。我们则能造成十万架，倘有必要时候，——我们的技术能做到这点。不久之后，我们就有几百架飞机，每小时能飞六百公里以上……从今之后，只需五次飞行，我们就能运输上次世界大战时同盟国在协约国领土上所抛落的炸弹总额了……”

拥有着强大的军事势力。日丹诺夫，政治局驻列宁格勒的代表，给波罗的海沿岸诸小国以如下的警告道：

“我们愿与所有的邻国和平共处，但若这些国家甘心给我们的侵略国利用去，则我们的红军将很快地扩大那我们开向欧洲的窗口……”

伏罗希洛夫宣告说：“如果发生战争，我们一定能全胜的。”拍掌，喝彩。我们的第一元帅，我们的常胜将军，万岁！如狂风暴雨般的欢呼。柳布琴科^③宣告说：“大家无须怀疑！德国法西斯如果进攻苏联，则无产阶级

^① 弗拉基米尔·米特罗法诺维奇·奥尔洛夫（Владимир Митрофанович Орлов，1895-1938），1918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在波罗的海舰队服役，曾任波罗的海舰队政治部主任。1921年任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海军助理。1926年任黑海舰队司令。1931年任工农红军海军司令。1937年被捕，1938年7月28日被杀害。——校对者注

^② 瓦西里·弗拉基米罗维奇·赫里平（Василий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Хрипин，1893-1938），1915年毕业于亚历山大步兵学院，任第21军空军中队少尉飞行员。1918年加入红军，任第5战斗机中队指挥官。1919年历任第10集团军空军司令、第9集团军空军司令、东南方面军航空兵司令。1926年任空军战术部部长。1931年任空军情报部部长。1933年任空军参谋长。1937年11月被捕，1938年7月29日被杀害。——校对者注

^③ 帕纳斯·彼得洛维奇·柳布琴科（Панас Петрович Любченко，1897-1937），1913年加入乌克兰社会革命党。二月革命后领导乌克兰左派社会革命党。1918年参与基辅工人起义。1920年加入俄共（布）。1927年任乌共（布）中央

革命的军队，将由我们的第一元帅——伏罗希洛夫同志统率着（暴风雨般经久不息的掌声。全殿的人都站立起来，大家喊：伏罗希洛夫万岁！我们的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同志万岁！），一定会使他们遭受历史上未曾见过的大失败！”于是顿河和库班地区哥萨克人叫喊道：“元帅，只等你一下命令，我们便飞也似地赶到边界去斩杀我们的敌人，在我们自己的领土内杀尽他们！”^①

克雷连柯^②，一个检察官，书蛇添足地声明道：“出版自由是谈不到的，因为阶级斗争还在继续着。”是什么阶级还在反抗呢？谁在反抗呢？是什么无名的蜚蜮还在摇撼这颗大树呢？是托洛茨基主义者，国际法西斯的密探，希特勒、戈林、戈培尔、希姆莱等人所雇佣的，——我们已经证明了，军事法庭已经审出了，本城某处地下埋着的十六具尸首便是证据，新西伯利亚埋着的五具尸首也是证据，明天我们还可以证明的，明天我们还有其他其他的尸首！赫鲁晓夫^③指斥那些“伪装成工人的人民公敌”，他们也是要无情消灭的。柳布琴科继续说：“对于那些直接做法西斯密探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全体一致的民众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消灭其肉体！”一百篇的演说反反复复只是这几句话。

总而言之，翻来覆去不外三个意思，就是：领袖呵，我们感谢您！我们是有力量的，是世界上最有力量的！杀死那些畜生，那些人类渣滓，杀！杀！杀！

《真理报》甚至以人道的名义，屡次号召社会主义祖国的公民当心警

委员会书记兼中央政治局委员。1933年任乌克兰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34年任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1937年被批判为“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8月30日因不堪遭受迫害而自杀身亡。——校对者注

^① 《消息报》，1936年11月27日。

^② 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克雷连柯（Никола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Крыленко，1885-1938），190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属布尔什维克。多次被捕和流放。二月革命后任第11军队委员会主席。十月革命期间，参与彼得格勒武装起义。1918年5月任最高革命法庭主席。1931年任司法人民委员。1938年1月被捕，7月29日被杀害。——校对者注

^③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Никита Сергеевич Хрущёв，1894-1971），1918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1935年任莫斯科州委兼市委书记。1938年任乌共中央委员会书记。1953年斯大林死后，在党内斗争中获胜，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1964年在党内斗争中失败，被解除一切职务。1971年9月死于莫斯科。——校对者注

戒：

“工农社会主义国家是唯一合乎人道的政制。正是由于概括全人类的一种人道感情所鼓动，我们的国家才受全体人民赞助，继续于全国范围之内，从其最后藏身之所，搜索并无情地消灭那些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法西斯主义的恶魔鬼怪！我们将净化他们的带传染病的呼吸气息，我们将彻底净化社会主义祖国的能使人健全发达的空气！”^①

但愿如此！和撒那！奉主之名愿荣光归于古往今来最人道的领袖！小说家阿列克谢·托尔斯泰写道：“全人类还不敢梦想一种宪章能像天才般的斯大林赐予俄国人民那样的无上幸福。”日内瓦有电报来，说瑞士共产党机关报《自由》称这个宪法为“古今万国最伟大的宪法”（11月26日）。斯德哥尔摩的《瑞典日报》写道：“全世界一切国家都要羡慕苏联的。”

《泰晤士报》宣布苏联“强大而繁荣”。《每日快报》刊载了“领袖”的照片，并转载他的名言：“古老的英国也钦佩我们”。巴黎的《信使报》指出大会全体代表一致信任新俄罗斯的领袖……“我们伟大国家的天才领袖万岁！宪法的创作者万岁！伟大的斯大林万岁！”拍掌，山呼万岁，天天都是这样。每期报纸要重复三十次，五十次，一百次，一百五十次……白俄两百万劳动者签字于一篇诗献给亲爱的领袖，有句云：

哦，吾主圣明，天才中之天才！
工人的太阳，农民的太阳，全世界的太阳！
如江河之强力，劳动的荣耀与骄傲！

如此这般密密麻麻地占了《真理报》五大行的篇幅。

彼得·维特乔拉，乌克兰诗人，赞叹道：

星宿在天空低头，
人和工厂，
都因斯大林的伟大而发出光辉。^②

① 《真理报》，1936年12月日。

② 《消息报》，1936年11月27日。

诗人卡巴德说：

黄金色的太阳，斯大林，汝之名
即足以致敌人的死命！

格鲁吉亚诗人加普林达什维利说：

他俯身向着小孩子们，
如同圣哲的园丁向着花卉……

卡拉巴赫地区一百四十八万七千居民用诗句称赞他：

最圣哲的和最受人敬爱的父亲……

土库曼的渔民写给他道：

如同灯塔刺破暴风雨的黑暗，
你的名字便是我们胸膛里不灭的火光……

诸如此类，诸如此类。任凭你去想象吧，你总能明白真相的……

为着荣耀、权力与使命。

恐惧

庆贺胜利之后，他回家去。最稳妥可靠的人保护着他，这些人受了最严密的监视，而且互相监视。他的活动往来是秘密的。他高兴。机器动转得很灵活。欢呼，拍掌，投票，命令，法律，决议，加入共产国际的三十个党中央委员会（不要忘记了哥伦比亚共产党和菲律宾共产党），几百万人签字的祝贺书，外国的电报，诗人的诗章，民众的爱戴，——只需做一个手势，这一切立刻可以得到了，在一种再好没有的形式之下。赞美的界限被超过了。民众的爱戴的界限被超过了。全体一致的界限，热情崇拜的界限，信仰的界限，欢喜的界限，都被超过了。全联盟——全帝国吧？——有全体一致的居民一亿七千万人。不过事前一二日，须他自己命令一切，还须付钱，——不错，一切，以至于瑞士《自由报》的论文……为的是这些欢呼可以掩盖全般的静默。没有命令便听不到一句话的声音，也见不到一个动作，收不到一封电报，仿佛只有他一个人在世界上，而他是自夸自赞的。

他于是忧虑起来。没有命令，就无论何时何处都没有动静。倘若他不发出命令，那么就丝毫没有动静吗？这机器不能自行动转吗？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出来吗？这个没有界限的“服从”，也许是一种“反抗”化妆的呢？他的命令都一字一句地执行了，执行得成了不合理，迫得他非发出相反的命令来补救不可，而此相反的命令也执行得成了不合理。他说：“全盘集体化呀”，——于是三星期之后果然做到了，而牲畜也差不多屠杀完了。此时他不得不叫喊说：“自愿集体化呀”，——于是集体农庄的人都走光了。此时他又不得不叫喊说：“够了！”他说：“学科学不能不先知晓马克思主义”，——于是就连助产学的论文中也处处充斥着从《资本论》中抄的警句。此时他不得不干涉说：“将马克思主义和妇女病理学混合起来是没有用的。”（照抄他的话）他命令新编历史教科书，——于是人家替他编了几本，使得他不得不公开提出来指责。他叫人检查共产党员过去言行，为着揭露暗藏的托洛茨基派，——于是几千个如格罗伯一类人，以及他们的妻子、他们的兄弟、他们的堂表兄、他们的朋友、他们的邻居，都受了迫害……够了，够了！他希望有个证据，表明群众爱护他吗？两百万人的签字，宣布他是“太阳”……难道是人家在讥讽他吗？

所有这些人，谄媚的，柔顺的，在所有这些机关里面，他们究竟要的是什么呢？无非是舒适的生活，社会主义与他们何干。那么应当倚靠什么人呢？假如明天他的铁手不能抓紧政治大舵时候，那么谁能接手呢？除了身旁几个庸庸碌碌的软骨头之外，没有别的人。伏罗希洛夫还是一个忠顺的人，而且是老干部，虽然没有多少见识……奥尔忠尼启则比较聪明些，读过好多的书，但做过好多亏心的事情，也许是由于神经失常所致……报纸得到一个信号，于是替奥氏预备五十岁大寿，加封其“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的头衔。然而这两个人都不行的。所有那些不见经传的人物，长着獠牙、钻营无度、毫无底线、既无历史也无思想的，都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这些人，是他能真正依靠的助手，因为他使他们这滩污泥直升为殿上人，但正因为这个缘故，一到他的手腕松懈的时候，他们一定要背叛他的……孤独的，他是孤僻的。

危险吗？什么人可以信任呢？护卫的人是十分可靠的吗？并不见得。其中有几个人已经枪毙了，其他的人都知道。他们害怕。很好，但由惧而生恨。他们崇拜他。但其中若有一个恨他，那怎么办呢？靠不住，靠不住，克里姆林宫的办事人员，一个个地详细检查过吗？一个醉酒的工人说……于是，替政府机关地板涂蜡的二十五个工人被捕了（1935年），都被控犯恐怖主义之罪。苏俄人民委员会一个主席谢尔盖·塞尔佐夫^①，本是他自己任命的，居然阴谋反对他。他的一个私人秘书巴扎诺夫^②逃出国外去了。他的妻子自杀死了。军队中最优秀的领袖，在其灵魂深处，都是托洛茨基主义者，因为他们天然就是托洛茨基主义者。拉狄克，当他接见时候，曾说……皮达可夫醉酒后曾吐露了些……在舌头制止不住的时候，仇恨就泄露出来。他害怕了。

^①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塞尔佐夫（Сергей Иванович Сырцов，1893-1937），191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属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后，任顿河州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负责组织武装与顿河哥萨克交战。1920年任敖德萨省党委书记。1924年任俄共（布）中央宣传部部长。1926年任西伯利亚边疆区党委书记。1929年任苏俄人民委员会主席，反对农业集体化运动，并要求罢免斯大林。1930年被解职，改任林业出口公司董事局副局长。1937年被捕，9月10日被杀害。——校对者注

^② 鲍里斯·格奥尔基耶维奇·巴扎诺夫（Борис Георгиевич Бажанов，1900-1983）1900年生于乌克兰。1919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曾在党中央组织部等机关工作，后调到中央政治局工作。1923-1927年任斯大林的私人秘书兼政治局秘书。1928年叛逃国外，著有回忆录。1983年死于巴黎。——校对者注

人家将最秘密的报告严封在信封内，要他自己开拆。又是那样的吗？好多年来总是这样！在上乌拉尔斯克隔离监中，人家搜到了一群托洛茨基主义者写的大纲，其中说：斯大林本身是等于零的，他只以保护官僚分子利益而存在；那些暴发户形成了一个新的剥削阶级；种种背叛革命的行为都已做过了……在梅德维杰集中营内，托洛茨基主义者举行绝食。其中一人的牢房里搜出了一封致斯大林的信：“低额头的叛徒啊，我要将我的尸首甩到你的脸上……”在苏兹达尔监狱中，有个老头子安德烈·鲍里索维奇，他只能撑着一根拐杖走路；人家秘密同他谈判要放他自由，给他养老金，让他清清静静过着暮年生活，只需他表示转变就够了。人家问他：你期望“领袖”什么呢？他无礼貌地轻轻笑道：“叫他滚蛋吧，——现在他还能替革命服务的，唯有这件事情罢了。”在莫斯科菜市场上，人家抓到一个做小贩的女人，她说：民众的痛苦是“他”赐予的。列宁格勒的一些学生，称“他”为“掘墓者”。某工厂工人将那印有“T-O-T”字样^①的香烟戏称为“斯大林之墓”（按“拖拉机”和“坟墓”头一个字母都是“T”字）。他们对卖香烟的人说：“请给我一包‘坟墓’，这里是六十个戈比，这货色就只值这个价钱。”^②

还有呢？还有托洛茨基派在毛泽东的军队中散发传单，还有托洛茨基派在里约热内卢出版了一个公报，还有第四国际重新提出第三国际前三次大会的口号，还有托洛茨基在写作……

叛徒，掘墓者，弑兄者，热月党人，党的破坏者——他的额头上已烙下耻辱的金印。他恐惧极了。但他的身上还有一种比恐惧更强烈的，是他心中那股仇恨。

^① “斯大林格勒拖拉机”之简写。

^② 以上所有故事都是真实的。

老人与第四国际

除了仇恨与恐惧，再没有其他理由能解释这些摧毁政权根基的疯狂清洗。他恐惧自身，恐惧体制，恐惧社会主义。这个体制已然失灵（即便引入秘密投票制，这项表示对基层官僚不信任的措施，也是于事无补的）。社会主义的理想已被玷污。而他本人，则沦为百夫长式癫狂的奴隶。

能替换他的一班人，都被他事先预防而一一枪毙了，唯有老人还留在世上。

老人，凡流的血没有一滴不溅在他身上，他仍然存在着，而且更加伟大了。

流放于阿拉木图，放逐于普林基波，软禁于挪威，受过了好多年的辱骂，历史被人有系统地篡改了，词典上抹去关于他的事情，博物馆内除去关于他的东西，他的一切政治上的朋友都关在牢内，也许明天都要被这样或那样杀死的，——但老人，恰如 1903 年同列宁在一起时一样，1905 年当第一次革命的第一个苏维埃主席时一样，1917 年和列宁并肩站在群众前头时一样，1918 年在斯维亚日斯克战役时一样，1919 年在彼得格勒保卫战时一样，整个国内战争时期中领导他所创立的红军时一样，他仍旧是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之领袖，——一个不可屈挠的被迫害者的政党，一个既无金钱又无群众的国际政党，但它守卫着传统，保持并革新理论，而且完全出于忠诚。老人托洛茨基，其实并不十分老，只有五十七岁；全世界人都想着他，因为人家禁止全世界人去想他；他有“领袖”所没有的一切：一个革命者的灵魂，一枝才华横溢的文笔，一些愿与他同生死共患难的人。

老人存在一天，胜利的官僚就没有一天能安枕的。十月革命的一个头脑存留下来，如今是最高的头脑了。群众一经抬头便要倾向于他。三个月之后，困难问题开始出现，苏联全国，不管人们如何诬蔑，都不得不想起这位“胜利的组织者”。至于那些大狱，则每个人都明白是怎样制造出来的，都明白那些御用小丑们的控告书值得了几个钱，大风起来时，只一阵就将这些臭秽之气吹得无影无踪了。

老人一生都是为革命服务的，他坚强而忠贞。他的错误也是出于正直和热情，并不能减他的分毫。从1920年，他就主张新经济政策；从1922年主张工业化；从1923年主张以党内民主制和反对官僚的斗争来改造党；1927年他预见了中国革命的失败；1931年他主张无产阶级政党的统一战线，若能照行，德国可能将免除纳粹主义之祸害；他又攻击强迫集体化和五年计划四年完成之类的“经济冒险”；从1930年起，他就预见斯大林今日所行之事了：即是谋杀列宁的党。

只要他的书能传入苏联去，“天才领袖”的地位便要动摇，而伟大年代的布尔什维主义便要重新觉醒。无疑的，没有一本书能传进去；但谁能担保这万里长城不会有几处缺口呢？

社会主义革命内部的反动势力依靠新特权阶层而得到胜利，使得第三国际又来了一次转变，屈膝跪吻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在最剧烈的一个国内战争中，资本主义财产制基础由于客观演变已经动摇了，西班牙共产党反而宣言说：“我们要尊重私有财产制度，以保卫共和政体。”但共和国大总统阿萨尼亚先生，绝不是共产党人，他小心翼翼地避免使用同一种言语，他还签发命令没收叛乱者及其党徒的私产。第三国际由于支持力量的变更，如今放弃了阶级斗争，转而与中等资产阶级精诚团结了；而这点好像还只是倾向于备战的种种复杂的广泛范围中一个小手段而已……老人则用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全副武器，武装着第四国际的思想，与之对抗，——这思想是初起的，还没有什么力量，但已经起了发酵作用了。

让某些报纸的新闻记者去说什么德国盖世太保的阴谋吧，就像他们的同事在过去也将第三国际说成什么收德国人钱的犹太人和共济会的阴谋。

这些新闻记者，无论如何怎样造谣，将来战争爆发时，或没有战争而阶级斗争活跃起来时，这个思想将要成为一种新布尔什维主义的一个萌芽。

尤其是在俄国。斯大林的恐惧和仇恨（也许夹杂有一丝的良心谴责）是有先见之明的。所以凡是能反对托洛茨基的，什么手段都准许使用。奇怪的，就是他们居然成功侵犯了庇护政治亡命者的公约，以及一般的国际公约。苏联以恐吓的口吻要求挪威软禁和驱逐它的流亡者，而果然达到了。就连沙俄专制皇帝的政府都不敢梦想到此哩！当沙皇躲在宫殿中瑟瑟发抖时，那些恐怖主义者则公然在日内瓦、伦敦、巴黎逍遥快活。……

托洛茨基的文件，寄存在巴黎社会史研究所，竟于去年11月间被劫了，劫盗者是一些灵巧的专家，备有乙炔喷灯和汽车，依照训令行事，一丝一毫不动其他的东西。不要害怕，这些强盗专家是捕不到的。当墨西哥答应为“这颗地球上无签证”的人庇护时，墨西哥共产党便宣告说：它要制造混乱以阻止他的登陆。在巴黎，为尊重庇护政治亡命者公法的国际局，被人请求对挪威软禁托洛茨基事发表意见时，竟客气回答说：这个团体只关心于受法西斯迫害的人……这个团体竟认为，被苏联迫害之后驱逐出国的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没有与德意两国亡命客平等的权利吗？真是奇怪的观点！

设在西班牙的圈套

当今世界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若有人意识不到苏联革命事业——苏联劳动者——遭受的损害将给其他地区的劳动者带来苦难与危机，那此人必定是极端盲目的。我们亲见的和参与的社会革命，无论我们愿意不愿意，决不会限于人造的过时的国家疆界之内。斯大林刚排除他的潜在的敌手，刚枪毙了那十六个人，以为官僚共产主义从此可以安然向右转了，谁知阶级战争在西班牙爆发，将他置于最微妙的境地。

起初他袖手旁观。何必惹麻烦呢！然而西班牙法西斯势力的得势与马德里之危，迫使他钻出头来。佛朗哥在西班牙的胜利，苏联的盟友——法国，便受到了法西斯的包围，此时欧洲的力量平衡将彻底倒向德国。这是出头干涉的第一个理由。

第二个理由是这样：若在处决列宁战友、清洗党内元老的同时，对西班牙工人阶级的屠杀冷眼旁观，便等于撕下伪装了，那时国内托洛茨基派之批评将获得最有力的武器，而他连表面上的革命威望也保持不牢了。反之，若在俄国人民和世界工人阶级面前装作西班牙民主政治的大救星，则有好多罪过可以得人宽恕，而在政治上巩固官僚制度。

经过两个月严格的不干涉之后，斯大林终于下定决心了。罗森伯格^①到了马德里，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到了巴塞罗那。军火运到卡塔赫纳及其他地方。而这并不是违反不干涉协定的……苏联从来未放弃与正式政府通商的权利。事实上这是做得对的，不受法西斯国家所愚弄。

但问题是仅仅在于打败那些叛乱的将军，如人们表面上所说的吗？我们难道不是处在一个工人革命的临界点吗？问题是在于拯救一个共和国吗？——那些将军就是它所孕育的，那个军队就是它所供养的，那个反革命叛乱就是它所准备的？难道不是在于建立另一个共和国，一个完全不同的共

^① 马塞尔·伊兹拉伊列维奇·罗森伯格（Марсель Израилевич Розенберг，1896-1938），1918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任职于外交部门。1936年8月任苏联驻西班牙全权代表。1937年2月被召回国，同年12月被捕。1938年3月5日被杀害。——校对者注

和国吗？

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不是某人或某人所能解决的。问题之解决在客观演变之中。在马德里，在瓦伦西亚，在巴塞罗那，已经必须宣布没收法西斯屠夫的财产以为集体利益了。事实上，伊比利亚半岛的工业中心，即加泰罗尼亚的全部生产，已经由工会来管理了。民兵是工人团体组成的。无政府主义者参加了政府。西班牙工人阶级流了这许多血，难道是为的将来，于获得代价极高的胜利之后，好将政权推让出去吗？

战争延长下去，贫困日益加增。要图复兴只有两种办法：指导经济和定量配给。但谁来指导呢，为谁的利益呢？口粮又是怎样分配呢？难道是劳动者每日分得少许口粮，而辛辛苦苦地，为了轰炸后从巴黎、热那亚、罗马、里斯本等地回国来的少数资本家和地主之利益，而工作，——这样一种指导经济吗？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指导经济，即是为集体的利益，而由受过最大牺牲建了最大功绩的人来指导，一句话：社会主义。二者必居其一：法西斯或社会主义。介于此二者中间的地位，反动派已经失去了，工人、农民及中间阶级则不需要。

我并非空谈理论的教条主义者。我是在发现那受群众力量决定而自成的事变之方向。若自以为反抗潮流，则只有增添斗争和痛苦罢了，即使不是助成了法西斯在这个形式或那个形式之下的胜利。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的国家能发生决定的和良好的作用。斯大林政权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呢？

大的报纸和舆论机关，对于某几点保持一种奇怪的缄默。那些知识分子也是这样：无疑是出于同一理由吧？可是这并不是战略上的秘密，而且敌人早已知道了。这首先是为的对工人阶级隐藏起来。

在西班牙有一个重要的共产主义反对派政党——“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简称P.O.U.M.）。所谓反对派，即是反对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理论、他的国家制度和他的官僚体系。这党的创立者华金·毛林、安德烈乌·宁、戈尔金^①、安德拉德^②，全都被共产国际除名了。毛林已经被叛军枪毙了。

^① 朱利安·戈尔金（Julían Gorkin，1901-1987），早年参加革命活动。1921年参与组建西班牙共产党。1922年被

这党在火线上丧失了好多优秀分子：埃切贝赫^①，第一摩托化纵队指挥官，牺牲在马德里城下；何塞·奥利弗，牺牲在加利西亚；赫尔米纳尔·维达尔^②和佩德罗·维拉罗萨^③，牺牲在阿拉贡。从牺牲的数目来说，这党占据第二位，仅次于全国劳工联合会。

这党于本年10月间在马德里成立青年团，即名为“伊比利亚共产主义青年团”。斯大林派，即正式的共产党，他们在加泰罗尼亚的党自称为“社会党”，在马德里的青年团自称为“社会主义青年团”。他们在自己刊物里面极力反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青年组织的成立，他们称其为“大逆”，是“叛国亲法西斯的阴谋”，扬言要“让叛徒尝尝铁拳的滋味”（原文如此）。他们做的更凶：一群匪徒捣毁了青年团的机关。这是卑鄙手段第一次用于西班牙革命的民主政治之下的。

当保卫马德里的各党派联合会成立时，那唯一未曾离开首都的委员会正是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委员会，可是这党虽然有几千名战士在火线上，却被排拒于此联合会之外了。社会主义者、工团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告知这党执行委员会代表说：他们是受了斯大林党和苏联代表团的双重压迫才违反西班牙大多数战士之意见而决定排拒这党的。这党的中央机

迫流亡，1929年赴苏联，同情于“左派反对派”。1931年返回西班牙，宣布与共产国际决裂，加入西班牙工农联盟。1935年马统工党成立后，任中央委员，负责宣传工作。1937年6月被捕，被判处十五年徒刑。1939年越狱，流亡他国。——校对者注

^② 胡安·安德拉德·罗德里格斯（Juan Andrade Rodríguez, 1898-1981），早年参加革命活动。1921年参与组建西班牙共产党，任中央委员。1927年因支持托洛茨基主张而被开除。1930年参与组建西班牙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组织“共产主义左派党”。1935年与工农联盟合并，成立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任中央委员。1937年6月被捕，1938年底获释。1939年流亡法国，1940年因参加反抗活动而被德国入侵军逮捕，1944年8月被游击队解救。1978年返回西班牙，1981年5月1日去世。——校对者注

^① 伊波利特·埃切贝赫（Hippolyte Etchebéhère, 1900-1936），1924年加入阿根廷共产党，1926年因支持托洛茨基主张而被开除。1931年赴欧洲，参加欧洲各国左派反对派活动。1936年7月赴西班牙，参加马统工党领导下的民兵组织，同年8月16日在战斗中牺牲。——校对者注

^② 赫尔米纳尔·维达尔（Germinal Vidal, 1915-1936），早年参加工会活动。1931年加入西班牙工农联盟，被选为巴塞罗那工会主席，并担任伊比利亚共青团中央委员。1934年被选为伊比利亚共青团总书记。1936年7月19日参与巴塞罗那武装起义，在战斗中牺牲。——校对者注

^③ 佩德罗·维拉罗萨（Pedro Villarosa, ? -1936），西班牙马统工党党员。1936年7月19日参与巴塞罗那武装起义，在战斗中牺牲。——校对者注

关报，巴塞罗那的《斗争报》，以可赞美的温和态度评论这件骇人听闻的事情说：“这是不可忍受的：人家给了我们一点帮助，就要强迫我们接受钦定的政治形式，就要使用否决权和事实上指挥西班牙政治。”

这期间，“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在马德里的机关报被禁了。人家后来知道，政府受了多大压力才做这事情。这是第一次侵犯了西班牙革命的民主政治下的言论自由。

《斗争报》揭露了苏联外交官和第三国际在西班牙工人政治中施行的这种野蛮的干涉，苏联驻巴塞罗那领事馆竟致书各报诬蔑《斗争报》是“国际法西斯收买的报纸”。于是开展一种诬蔑运动，其动机、其动力及其自相矛盾的说话，是一见可知的。“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机关报（这个党加入了第三国际），诬蔑“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战士是“佛朗哥、希特勒、墨索里尼的密探”，又添加一点说：这些是残余的托洛茨基派，因之是德国盖世太保的侦探，“莫斯科和新西伯利亚两案已审出来了……”。果然，一切事情是互相牵连的。你看这些丑恶事情是如何互相为用，又是牵扯到多么远去。可是人家谋杀俄国老革命党人，正是为着更易于扼毙西班牙革命党人的！

无须乎列举一堆的小事件（譬如滥用无线电、出版检查、出版物等），足以表明加泰罗尼亚政府各机关受了一党把持，其目的就是不择一切手段来排斥另一个工人组织。经过多次阴谋之后，疮毒发作了。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要求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排除出政权和反法西斯联合阵线以外，以此引起了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之总辞职（12月中旬）。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代言人科莫雷拉先生^①发表谈话，攻击极端主义，并要求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权，那些“侮辱苏联的人”必须排拒于此政权之外。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有四万党员，其中有六千民兵，是不容易排除的，尤其有“全国劳工联合会”（简称C.N.T.）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联合会”（简称F.A.I.）两个团体的革命的信义来援助它；这两个团体应当

^① 胡安·科莫雷拉·索勒（Juan Comorera i Soler, 1895-1958），西班牙记者。西班牙内战爆发后，为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主义党总书记，参加加泰罗尼亚政府。内战后，流亡他国。二战后，被指控为铁托政策的支持者，开除党籍。为躲避暗杀，于1951年秘密返回西班牙。1954年被捕，1958年在狱中死去。——校对者注

明白，它们也会轮到这个命运；它们也许不会忘记，共产党议员埃尔南德斯先生^①8月8日在马德里宣言：战胜佛朗哥之后，“就是收拾那些无政府主义者之时”。

听到了斯大林派势力，在瓦伦西亚，在卡巴耶洛政府旁边，已经征服了工团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左派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势力，是没有人惊奇的。这是有明白的原因，譬如机械化武器；这而且是很自然的。但这个势力，运用于一种很可怕的方面。“全国劳工联合会”机关报，《工人团结》，暴露了一件很重大的事情。在12月的第二个星期，这报写道：“我们的民兵所以不能在阿拉贡方面发起进攻，乃是因为缺乏必需的弹药，同时毕尔巴鄂的天主教保守政府却是什么都不缺少的。这是很引人深思的事情……”

同一日我又听到了，这个势力又成功的把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排拒于保卫阿拉贡的各党派联合会之外，——尽管这党的部队曾在蒙特阿拉贡和埃斯特雷乔金托立下了赫赫战功！

归根结蒂是由于政治主张重大的分歧。斯大林既不愿看到法西斯统治西班牙，更不愿西班牙出现一个不受他控制的工人民主政权——这样的政权会向世界展示与苏联模式截然不同的范例。向来措辞温和的《战斗报》在12月15日写道：“……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排斥了我们之后还不满足的，它还要干脆地取消工人阶级的所有革命成果，对此我们绝不妥协……”换言之，斯大林主义者要求的，是一个能够压服工人阶级的强权政府。

从列宁到斯大林，这中间已拉开了遥远的距离。

^① 赫苏斯·埃尔南德斯·托马斯 (Jesús Hernández Tomás, 1907-1971)，早年参加西班牙共产党，曾参与针对社会主义工人党领袖普列托的暗杀行动，未遂。1931年赴苏联，入学于莫斯科列宁主义学院。1932年共产国际采用“保卫共和国”政策，被选为西班牙共产党新任领导人之一，1933年返回西班牙。西班牙内战爆发后，参加西班牙资产阶级政府，任教育与美术部部长，后改任教育与卫生部部长。内战后，流亡苏联，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42年在党内斗争中失势，1944年被开除党籍，逃离苏联。1953年出版回忆录《我曾是斯大林的部长》。1971年死于墨西哥。——校对者注

真理有助于社会主义

写下这些文字时，我的心无比沉重。但沉默不言同样令人无法忍受。我喜欢查尔斯·佩吉^①说过的这几句话：“知晓真相却拒绝呐喊之人，终将成为谎言伪造者的同谋。”好多人真有本事，能够从容地保持着沉默，并摆出革命者的优雅姿态！人居然能够出版周刊和书本，而不让真理透露出来。这是很精湛的艺术，同时也是致命的危机。

此刻我们正面临存亡攸关的抉择。现时即使是旧世界还不崩溃的话（这是可以讨论的），它的基础却显然已经衰朽了。不幸，在此危急关头，本应指引我们的清明思想竟遭扭曲。革命好像翻转过来，带着诈伪的杀人的国家的狰狞面目，反对人类，首先反对劳动者。我们的最大力量、我们的最大希望，即国际团结，竟堕落了，而成为国际阴谋、国际迫害，而成为莫斯科、马德里、墨西哥等处的疯狂诬蔑。一切都待我们保卫，一切都待我们救护。而我们最锋利的武器，唯有真相。这武器再不能束之高阁了，伤口已流血太久。至于那些温吞之徒，那些卑劣小人，就让他们自食其果吧。

大多数人，甚至包括我们的敌人在内，现在都明白了，俄国革命乃是一个无可估量的重大事变，它的影响此时才开始给人感觉到，它确实改变了世界的根本结构。就是这种朦胧的认知，使得人们在突然发觉这个革命内部发生反动逆流时，往往带着一种真正的忧虑而迟疑不敢表示意见。1917年至今，俄国民众的磅礴伟力、列宁党坚如磐石的革命意志、那些主宰并指引革命历程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非凡成就，——这一切，现在只剩下一个以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新社会了；在这社会里，甚至人类本能也在经历着重塑，在这社会里，遵循统一计划运行的经济体制，展现出近乎无限的韧性与威力……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在此得到了辉煌印证。

^① 查尔斯·佩吉 (Charles Péguy, 1873-1914)，1873年出生于法国奥尔良。早年倾向于社会主义，曾加入法国社会党。1900年代回归天主教信仰，但保持对教会体制的批判，形成独特的“神秘现实主义”思想。1914年入伍，战死于马恩河战役。——校对者注

法国资产阶级在 1789-1793 年胜利之后，还必须经过好几次反动和好几次危机。但时至今日，无人能否认 1789-1793 年的革命成果。历史有其时间的。历史长河奔流不息——对历史而言，俄国革命才刚刚启程。终有一日，苏维埃共和国的劳动者，回望斯大林时代的梦魇时，将带着我们翻阅历史阴暗篇章时那种掺杂厌恶的猎奇。……

难道真有人相信，官僚集团能用暴力长久压制这个一亿七千万新生民族？他们深深记得那段伟大几年的英雄史诗。这个民族的命运征程尚未抵达终点！

与此同时，我们既无权保持沉默，也不能闭目塞听。我们必须实行一种道义上的干涉，这是我们的责任。叫俄国无产阶级的热月分子小心吧！我们不会用虔诚的谎言帮他们逃避对革命者乃至所有良知之士的责任。他们很快将只能欺骗那些被收买之徒。要让谴责的浪潮如此汹涌，迫使他们出于自保，在国内采取更人道的政策，在国外展现更诚实的姿态。在社会主义和法西斯相肉搏的斗争中，唯有当社会主义能为人类生活带来更多福祉与尊严时，它才能取得胜利。正是在这一方面，苏联官僚主义反动势力正在严重损害这一根本。若能迫使这股反动势力后退一步，若能通过揭露其真面目阻止哪怕一桩罪行，我们就是在为社会主义与革命挽回些许真正的崇高，从而重铸其战无不胜的力量。

维克多·塞尔日

写于 1936 年 12 月

只要存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它们就不能和平共处，最后不是这个胜利，就是那个胜利；不是为苏维埃共和国唱挽歌，就是为世界资本主义唱挽歌。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

